

# 求真雜誌

## 第一卷 第一期

### 要 目

創辦宗旨..... 本社同人

時評：東北問題・印度問題・伊朗問題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陳人白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郭紹虞 李季 胡山源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林漢達 索非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竹雲龍

古史辨的解毒劑

康君譯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李季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歐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冰夷譯

論社會思想

童止齋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唐虞世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碧雲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悲憤的歡笑

謝少翁

出版社 真雜誌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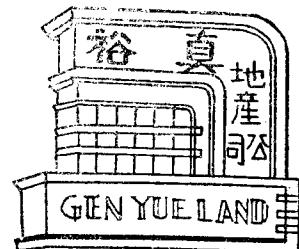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一日

# 真裕地產有限公司

## GEN YU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地產公司  
九四八四一：電話  
六十六路南京：地址



營業範圍

其他有關房  
地產業務

之設計

房地產建築  
房地產經租

代理買賣房  
地產

房地產投資

# 英別發印書館 KELLY & WALSH, LTD.

創於一千八百一十八年

總發行所 南京路六十六號

電話 一〇〇四六

促進世界教育的前茅  
溝通中英文化的先鋒



*Graphic Address:*  
KELLY, SHANGHAI

預告：

經售歐美科學書籍

搜羅各家文學名作

譯印中英文化著作

承接印刷書籍文件

中華民國

新公司法

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歡迎預訂

印刷廠 西康路四〇〇號  
電話 三三三九一

慎安號進出口行

專辦

牛皮藥材雜貨

江西路三和里弄三號

電話一七六三二

光裕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KWONG YUE TRADING CO., LTD.

P.O. Box 1467

SHANGHAI.

地址：京南六六路號四樓

電話：一四八四九

業務範圍

經營進出口貿易  
代客買賣費

電報號掛牌三三三七五



# 創辦宗旨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京內團與印度問題

伊朗問題在安會上的喜劇

中國如何民主化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民主與特權

民主意見

佛拉提米爾論中國的民主主義

林漢達等五人

郭紹虞等六人

李白等六人

孟鶴皋等四人

胡季白等六人

季羣等六人

竹雲龍等三

康君譯等二

歐季等二

李季等二

盧靈著·冰夷譯等

童止齋等一

唐虞世等一

碧雲等一

李毓鏞等一

## 時評

##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古史辨的解毒劑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母系氏族怎樣轉移爲父系氏族  
伊里奇論托爾斯泰思想的矛盾  
論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論社會思想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悲憤的歡笑(小說)

編輯室談話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悲憤的歡笑(小說)

# 創辦宗旨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算是結束了。但，大戰所留下的遺產，真是瘡痍滿目！更壞的是：新的紛爭與混亂，又在各方面開展出來！如果人們不是『勝利』的拜物主義者，就應當看到：人類又將陷入一個最可怕的新戰爭的威脅之前。

整個的人類，今後究竟何處去？我們的國家又往那裏走？這些基本問題，都急待我們探討；並應當從探討中求得正確的結論，以爲今後行動的指針。本誌創辦同人的物力與才力，固甚微薄，但對此有關人類，特別是中國命運的基本問題，希冀有所貢獻。首先，就是貢獻這個學術思想自由討論的園地：竭誠歡迎各思想家各創作家來自由播種，細心栽培，好讓將來解決世界及中國出路問題，及其他各種重要問題的人們，從這兒取得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二 因此，本誌主旨，在進一步介紹高度發展的學術思想（如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文藝等），并予以發揮。隨時客觀地分析國際局勢的動向，研討本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要問題；藉以推動我國思想向前邁進，提高整個文化水準，俾資今後改造中國社會之真實參考。

三 為要達到上述任務，本誌決採取完全公開討論和民主批評的精神。凡國內外各派系的思想或創作，都願容納在本誌內發表，并任其自由討論和相互批評。因爲任何真理，任何有價值的作品，只有經過無限制的討論與批評，才能顯現其真價；同時，任何錯誤思想，任何虛偽作品，也只有在不斷的爭論光耀之下才能暴露原形。

四 但對於任何思想，任何創作的討論與批評，本誌都堅主採取嚴格的科學態度。凡一切無謂的攻擊或漫罵，均須避免，以期不致違背忠於『求真』精神。我們的口號是：『勇敢地追求真理』！『堅定地擁護真理』！但同時也要『勇敢地在真理面前低頭』！

# 評時

舉世矚目的東北問題，經過多月的爭持和調協，不但沒有因停戰協定之公佈而告解決，反之，却由於最近蘇軍之撤離長春，共軍之圍攻政府的接收軍隊，並進而佔領長春等地，遂使東北問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引起每個人的焦慮、惶惑和不安了。

最初，中國政府由於無法及時運送軍隊北上，因而要求蘇軍暫緩撤退，以便國軍獲得時間前往接收；蘇軍也企圖在撤退前經由談判多得一點權益，同時盡量消化日帝十四年所苦心經營下來的遺產（聯合社四月廿五日電：據甫從東北返京之美礦務專家估計，蘇聯已從東北運去機器，至少價值五萬萬美元；而蘇聯在三月初致美國覆文中，也承認搬走這些『戰利品』『並無不合』）；另方面也給共軍以最有利的機會，藉近水樓台的方便，奸暗地裏承受日軍繳出的武器。等到國軍北上時，不但東北主要的機器早已搬走一空，而共軍的羽毛也長得很豐滿了。當國軍出關的前後，相互間的鈎心鬥角已改換了形式，中國政府所要求於蘇聯的，已不是『暫緩』而是『依約』撤兵了。但在談判無完滿解決，『東北特殊化』無切實保證時候，蘇軍自然不願撤退。如此，代英國在戰後一躍而為世界主人的美國，便非出馬不可（貝爾納斯之強硬聲明不惜以武力制止侵略，便是顯例）。再加上中國各地所發生的反蘇示威運動，國際輿論對蘇聯不顧一切的冒險行動之一致抨擊（最露骨的是邱吉爾在美的演辭），使蘇聯軍隊再也無理由戀棧不去；此後的談判，只有拖延到國共間軍事衝突的擴大中來繼續進行了——用共軍佔領了長春和哈爾濱等地的既成事實來討價還價，自然能够得到較有利的條件的。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說，長春的爭奪戰將必然地擴展為全國性的大規模內戰，甚至連美蘇也捲入這一戰爭漩渦中；反之，從目前國內外的一切徵象看來，國共雙方在馬歇爾特使的斡旋下，很有可能暫時妥協下來，南滿將由中國政府接收和統治，北滿的中蘇邊境一帶則成立『自治政府』。這樣一來，軍事衝突可能暫時告一段落。

不過，無論討價還價的結果怎樣，國共間的矛盾依然存在，恍如一根壓縮着的彈簧一樣，遲早總要爆裂開來的。國共兩黨的討價還價，只能把問題

##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暫時延擱起來，醞釀一次新的紛爭而已。過去的國際外交史，特別是不久以前國共間所簽訂的『停戰協定』，都在證明什麼條約或協定，只能具有時緩和衝突的作用，離開真正解決問題是甚為遙遠的。

因此，要澈底解決目前國共間衝突最烈的東北問題，只有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做到。民意是不能被人任意強姦的。我們在此姑不論列國共是非曲直，但站在民衆的立場上說來，全國人民都應該有充分權利起來反對分裂和內戰（特別是長期在日帝漢奸蹂躪下飽經戰禍的東北民衆，再也無忍受那將以東北為主要戰場的內戰所帶給他們的苦痛了）。全國的成年男人都應該有充分權利按照普選的方法去選舉自己的真正代表，以召開一個具充分權力解決一切問題的國民大會，只有這樣的國民大會，才能澈底解決共所爭持不決的東北及其他問題，同時，解決民主民族解放的問題。（康君

## 英內閣訪印團與印度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印度問題，愈來愈趨於緊張和嚴重了！最近孟買暴動（二月廿二至廿五日），便是事實的表徵。現在大英帝國所派的『內訪印代表團』，更是孟買暴動的回響。並且由該『訪印團』以勞倫斯（即印度事務大臣）·克里浦斯（商務大臣）及亞歷山大（海軍大臣）三位大臣代表看來，也證明大英帝國對於印度問題確已十分重視。但『訪印團』能解決印度問題？并怎樣解決印度問題？這先值得我們注意的。

據勞倫斯抵印後第一次向印度新聞記者發言：『吾人僅有一種目標，與印度之領袖及所選出之代表，討論如何從速使印度人達到其希望，及完管制本身事件，俾吾人能光榮移交責任』（合衆社新德里三月廿四日電）。原來該訪問團解決印度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在『與印度之領袖及所選出之表討論』，即與印度上層領袖『協商』。這對於印度的領袖們當然是很歡迎的。因此，首先就博得了甘地的信心，他說：『英三大臣來意誠懇，當不再行欺我』（路透社新德里四月四日電）。阿柴特也認為談判進展情形，對的意見。這樣，訪印團與印度領袖們的『討論』，似乎可以順利進行的。

據聯合社新德里四月十四日電：國民大會黨主張印度教人控制中央政府，以期實現印度的獨立統一；而回教同盟則堅持在英印談判之前，獲得回教徒完全獨立之保證。在這種分歧之下，他們「已無法自行覓得自治方案」，而將由英內閣訪印代表三人「代為覓取」解決之道。這樣一來，那原來與印度領袖處於對立地位來「討論」印度問題的英國訪印團，現在却轉變成印度各黨派間意見衝突的調解人和仲裁者了。這就是說，原來印度與大英帝國間的對立問題，現在却變成爲印度各黨派領袖間內部的對立問題了。不用說，這對於「訪印團」，也就是對於大英帝國，是很有利的！

另一方面，印度羣衆對於上層領袖們所進行的英印談判以及他們相互間的爭吵，却不見有什麼重要的表示——他們好像對此感覺不到興趣。他們採取這種漠不相關的冷漠態度，難道是偶然的嗎？不，會做過兩個半世紀的世襲奴隸的印度人民，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過英國及其領袖們的種種愚弄的印度人民，無論英國這次的訪印團如何說法，也不管甘地怎樣相信英國「當不致再行欺我」的「誠懇」，他們却有一點是會直覺地固執着的：大英帝國絕不會自動地退出印度！——他們寧可迷信宗教上的奇蹟，但對於政治上奇蹟却並不怎樣迷信。最近孟買的暴動，就是新鮮的表示。因爲不大迷信靠談判可以取得印度的獨立，所以一遇有機會，他們即拿起武器來向英人進攻，企圖用這種方法把大英帝國主義者趕出印度。從歷史的經驗看來，印度羣衆的直覺是對的；他們使用的方法（像孟買的暴動）也是唯一可能有效的。他們現在的缺點，就是：還沒有自己堅強的羣衆組織，尤其沒有堅決的領袖來領導他們。也正因爲如此，印度問題的真正解決，還要經過一些時間。

## 伊朗問題在安理會上的喜劇

伊朗問題，最近在聯合國召開的第一安全理事會會議上，曾表演了一幕頗爲緊張的喜劇：開幕時，美英代表根據伊朗政府的控訴，主張在會議上討論『伊朗問題』；而蘇聯代表則堅決要求該問題應由蘇伊兩當事國直接談判

處理。蘇聯代表的要求，因遭到美英及其他代表們的拒絕，致立即退出會議，一時掀起了風波，使得一般神經過敏的人們，又大大地感到惶惑不寧。但跟着，莫斯科與德黑蘭迅速地舉行了談判，其結果是：蘇聯允許了「無條件的」撤兵，以此換取了伊朗北部大半的採油權（即蘇聯佔有「蘇伊煉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并暗地獲得了亞塞爾拜然省的「自治權」……這樣，伊朗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上演出的喜劇，就無聲無臭地閉幕了！

可是，伊朗問題的喜劇雖然是如此諷刺地閉了幕，但它的幕後却是充滿了悲劇的成份和包藏了嚴重的國際矛盾的。而且在中國人看來，更覺得自己本身和伊朗有同病相憐之感。因爲中國的東北問題，不啻是伊朗問題在遠東的一個副本呢！所以，則令在伊朗問題的喜劇閉了幕以後的今天，還值得我們重新提起，值得我們追尋它的根因，以便作爲我們東北問題的『殷鑑』。

伊朗問題，表面上是伊蘇兩國間的問題，實際上却早已成了蘇聯與英美之間的一個最嚴重的矛盾問題。在蘇聯當局看來，伊朗是她的南部邊境安全所繫的要地，所以決心在那裏建立她的『安全圈』，以便防禦英美勢力的進逼。她的方法是：延期撤兵，並在亞塞爾拜然扶植「自治運動」，以此威脅德黑蘭政府遠離英國，並企圖進而控制整個伊朗，取得全部的採油權。但在大英帝國看來，伊朗不但是保衛她在近東和中東全體利益的一個前哨，而且還是她從地中海到印度的『生命線』之安全所繫的一道外圍。此外，何況在那裏還有她所絕對需要的油源！所以，英國無論如何不能讓伊朗離開她而跑向蘇聯的懷抱裏去。因而她便以全力支持那個腐敗無能的德黑蘭政府，鼓勵她去同蘇聯抵抗。她的方法是：倡言要維護伊朗的『獨立和統一』，催迫蘇聯履行撤兵條約，反對亞塞爾拜然省的『分裂運動』。當蘇聯不理睬她而任意在伊朗進行自己的預定計劃時，她就慫恿伊朗政府控訴於聯合國安理會。而美國則爲了伊朗的油田，爲了支持英國抵制蘇聯勢力在歐洲，近東及中東方面的無限擴展，最後爲了給中國的東北問題顯示範例，因而也就挺身而站在英聯這回的英國『內閣訪印團』，將同第一次大戰後的西門訪印代表團一樣，絕不會讓印度獲得真正獨立，至多只能允許印度一個自治領的政府，以期緩和一下印度日趨緊張而嚴重的局勢罷了。但日趨緊迫嚴重的印度局勢，有牠自己的邏輯，縱令能一時被『緩和』，牠的根本趨勢還是要向前發展的——發展到臨界點，就要爆裂開來，到那時，上層的妥協談判，就將被羣衆的劇烈行動所代替了。只有這樣的情勢到來，印度問題的真正解決，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孟元）

正由於美英的聯合壓力，蘇聯當局也只得「知難而退」。她一方面，裝模做勢地命令出席安理會的代表退席，以示對美英表示抗議，而同時則趕緊聲明無條件地撤兵，并以此多少換得了德黑蘭政府的『自動讓予的權利』。在蘇聯這種看風轉舵的態度下，英美方面當然也只好『適可而止』。這也就是安全理事會對於伊朗問題之所以無聲無臭地收場的原因。但最後說來，被犧牲的還是弱小國家的伊朗。伊朗在德黑蘭那個腐敗無能的政府統治之下，她命定地只有將伊朗的人民帶到國際矛盾的漩渦之中，去聽人擺佈。假如伊朗的人民不自動起來主宰自己的命運，則伊朗問題在這次安全理事會上所演出的喜劇絕不是最後一次，而且跟着喜劇之後，將是可怕的悲劇之出台！（鶴臯）

# 論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陳人白

## ——紀念廿七周年的「五四」節——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整整的二十七周年了！但對於這一運動之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對於它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的貢獻，似乎還不會得到應有的認識，科學的評價。雖然也會有人稱這個運動是劃時代的，但它的劃時代的意義究竟何在？更少看到過明確的解釋。有不少的論著談到『五四』運動時，不是陷於機械的評斷，就是流於片面的描寫。而某些沈醉於派別利益，或個人野心的人們，對於這個運動的歷史事實及其領袖人物，也像對於其他的許多歷史事實和領袖人物一樣，甚至不惜任意加以抹殺，歪曲，閹割，修改，乃至偽造，以期將客觀的歷史遷就於其主觀的需求。因此，即令在這個運動已經過去了廿七周年的今天，來對它重新加以檢討，也就不算是多餘的了。

固然，研究歷史，探討過去的事變，難免要滲透主觀的見解，追求『實用』的企圖。但必須忠實地尊重歷史事實，按照歷史事實本身的邏輯，去探求其變化的規律。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理解歷史，從歷史中獲得真正的教訓。也只有到這時，客觀歷史的盲目的必然律，才能轉變成爲我們主觀的自由行動的指南。任意抹殺，歪曲，閹割，修改，乃至偽造歷史，也許能『獲利』於一時，但結果一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的。

作者在本文裏，因限於篇幅，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不擬作全般的探討，也不準備批評別人對於它的誤解和曲解，而只想對於它的劃時代的根本意義，它的對於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完全依照史實略予闡釋，以便青年一代人從這兒獲得對於這一偉大運動的一個較明確而具體的概念，學得一點真實的歷史教訓。

『五四』運動，就它的直接意義說來，是對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內反對安福系專制政府賣國的一個政治運動。當時『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便是這一意義之最明顯的表現。至於北京學生羣衆，在這一運動中自動地勇敢地行動了起來，示威遊行，直接向賣國官僚的窯穴（趙家樓）進

攻，用自己的手來懲罰賣國賊（如焚燬曹汝霖的住宅毆打章宗祥），引起了全國的同情與響應（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及抵制日貨等），以致迫使頑強反動的安福系政府，也不得不能免了幾個賣國專家（曹、陸、章），宣佈了拒簽凡爾塞的分贓和約……這一切都是這一運動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富有歷史意義的事實。然而『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之劃時代的意義，却還不在乎此，反而在它對於思想方面的貢獻。換句話說，五四運動之真正劃時代的意義，是在於它勇敢地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並在運動的進程中替另一個新的階級的啓蒙運動，準備了一點基礎。

以西方急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澈底地否定了中國一切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以平民的白話，堅決地代替了貴族的文言；最後，則以認真的態度，將西方文化最高發展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這三點綜合起來，便形成了五四運動之劃時代意義的具體表現。

## 民主主義反封建傳統思想的鬥爭

中國最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如果專從政治及一般思想上說來，可以稱之爲民主主義與封建傳統的專制主義鬥爭的歷史，也就是一般所謂東西文化衝突的歷史。

中國古典的封建制度，雖早已被秦始皇所破壞，但它的根本傳統，它那貴族的等級的宗法的思想和倫理，却仍然被秦以後的君主專制主義者繼承了下來；並經過歷代專制帝王及其臣僕們（如董仲舒，韓愈及宋儒之類）的增補，修飾和發揮，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起來，因而形成了所謂『綱常名教』，所謂中國固有的精神文化。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這一文化的核心，是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

但自從這一文化的負擔者——官僚貴族（所謂士大夫），一旦與西方資本主義正式接觸，並遭受了幾次猛烈的軍事打擊之後（如鴉片戰爭及英法聯

軍進攻北京之役），他們便逐漸感到了『相形見绌』，以前那種『尊夏攘夷』的『夜郎』態度，逐漸被對西方的恐怖和模倣所代替了。但在一個長時期中，人們所看到的西方，所恐懼和模倣的西方文明，還只限於兵艦槍砲，至多也不過是一些自然科學的技術知識（如所謂格致的聲光電化等），而對於中國幾十年相傳下來的『政教』，還認為是無上的國寶。李鴻章所會進行之洋務革新，便是這時期的『模倣精神之實踐』。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公式，則為這一時期之『理論上的結晶』。但經過甲午戰爭的慘敗以後，一部份代表資本傾向的『士大夫』——受過歐化的知識份子和新官僚們，便已感到中國的弱點不僅在物質方面，即政治上也必須予以『維新』。康梁的戊戌變法，乃是這一傾向的典型表演。康梁比之李張輩，雖然進步了不少。但他們對於中國的舊傳統並沒有能脫離。因為康有為的『維新』，差不多全是在『尊孔』的形式之下進行的。孫中山之主張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比起康梁來更是跨進了一大步。但由他自認『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及提倡固有的『智、仁、勇』看來，也還沒有完全與封建的舊傳統斷絕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將近半世紀以來的歐化運動，民主改革運動，直到辛亥革命為止，還沒有能超越與封建舊傳統思想妥協或遷就的界限。只有『五四』運動，才完全站在近代西方文化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同中國的『固有文化』，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及舊習慣等進行了全盤的，澈底的，堅決的鬥爭。而著名的『新青年』雜誌，便是這一鬥爭之有系統的思想上的表現。

『新青年』，從最初起就在思想上發動，準備，并一直領導了整個『五四運動』的進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新青年』是在思想上從頭至尾領導着五四運動的一個總司令部。而在『新青年』中能够代表幾個主要傾向的人物，則是陳獨秀，胡適之和李大釗。其中，陳獨秀更是這一運動思想上的發動者和主要的指導者。因為陳獨秀不但是『新青年』的創辦者，而且是它的長期的主編者及主要撰稿人。

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卷一號（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發行）『敬告青年』一文中，從『新陳代謝』的進化論的觀點出發，將『新』與『舊』，即整個的西方文化與中國的固有文化（在該誌同期中，汪叔濟解釋『新舊問題』說：『夫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

文化也。』）完全對立起來：以『自主』對『奴隸』，『進步』對『保守』，『進取』對『退隱』，『世界』對『鎖國』，『實利』對『虛文』，『科學』對『想像』。在這種種的『對立』中，陳獨秀熱烈地贊揚了西方的新文化，而嚴厲地斥責了中國的舊文化。例如他在『自主的而非保守的』一節中寫道：『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權，求女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也。』而在『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節中則指出：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因此，他強烈地號召新的青年一代人起來與中國一切舊文化決裂，鼓動他們『自覺奮鬥』，『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隣，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對中國舊文化所表示的這種猛烈的決絕的反對態度，及其對於西方新文化的熱烈贊揚，我們可以說：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對舊時代的宣戰書，而往後整個五四運動的基本路向也就導源於此。

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見上舉『新青年』同期）一文中，更明白地宣稱：『近世文明，東西絕別為二。代表東方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此二種文明雖不無相異之點，而大體相同，其質量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這差不多等於說，所謂東方文明，乃是代表古代封建的專制主義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則是代表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這是對於東西文化第一次較為科學的區別和認識。

但什麼是近代西方文明呢？陳獨秀接着說：『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割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他并指出『此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即皆發源於法蘭西（如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拉馬克的進化思想及巴布夫、聖西蒙和傅里耶的社會主義）。因此，陳獨秀特別推崇法蘭西文明，之認識，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者，《百科辭典家》，深表敬仰，因而譯出了薛紐伯的法國『十八世紀之新思想』一文（見上舉同期所載『現代文明史』），以資介紹。這些都證明陳獨秀對於近代西方文明的基本內容及其起源之認識，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之認識，在中國當時是較為深刻，高人一等的。由此可見，陳獨秀之起而發動并領導了五四運動，也就不是偶

然的了。

陳獨秀指出了東西文化所代表的時代根本不同及西方文化的基本內容之後，於是更進一步從歷史上來檢討中國固有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觸後所發生的衝突及其影響。他在《新青年》一卷六號（發行於民國五年二月十五日）『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寫道：『其足使吾人生活狀態變遷，而日趨覺悟之途者，其歐化之輸入乎？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現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接觸相衝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衝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跟着，陳獨秀即舉明末清初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輸入所引起的種種紛爭，如洋務與反洋務的鬥爭，中學與西學的鬥爭，以及共和政體與君主立憲的鬥爭等。最後，他認為他那時代『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的時代。而他本人即以擔任這一『大激戰』的號角手自居。他高聲叫喚『青年國民』必須作『最後之覺悟』。他要求人民在政治上（所謂政治覺悟）應當覺悟『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由專制政治趨於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於國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趨於自治政治，此所謂立憲制之潮流，世界系之軌道也』。人民『應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應自覺進而建設政府，自定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正當新舊軍閥及官僚們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而老的革命黨人又全陷於軍事冒險及政治投機的時候，陳獨秀起而發表這種『人民應自覺自主』，『應自建設政府』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最能代表民眾利益，是最為進步，最富有民主意義的。

在倫理上（所謂倫理的覺悟），陳獨秀指出『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倘於政治上否認專制，於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之特權，則法律上權利平等，經濟獨立生產之原則，破壞無餘，焉有并行之餘地。自西方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绌，舉

非澈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後覺悟之覺悟。此種將中國舊倫理，『名教』，『禮教』等斷定為『別卑，明貴賤的階級制度』，與現代的共和民主制度絕對地對立起來，而前者加以公開的全盤的否定，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確是第一次。這正如陳獨秀自己隨後所說的，是『倫理道德的革命』。這同時也就是表示陳獨秀在國近代民主思想解放運動上所起的作用，較之他的任何前輩更為深遠的所。而五四運動的主要特點之一，也就在這裏。

陳獨秀既已公開而全盤地否定了舊倫理，舊的『名教』或『禮教』，照他的思想邏輯的發展，便自然而然地要走到完全否定所謂孔教為止。恰這時，康有為及其徒黨們（即『孔教學會』諸人）大肆提倡『孔教』，主張憲法上確定孔教為國教（見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這便給了陳獨秀個反孔的大好機會。

陳獨秀在《憲法與孔教》（《新青年》二卷三號——民國五年十一月一發行）一文中，劈頭就說：『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於憲法不問題』。這幾句話，在現時看來雖然簡單而平常，但對於當時尙承認孔子『大成至聖』，為『萬世師表』的人們（附註），却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接着，陳獨秀指出：『孔教問題，不獨關係憲法，且為吾人實際生活倫理思想之根本問題』。因為『孔教之精華曰禮教，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本』。而『禮教之根本義』實為『三綱』。『三綱之實質』，如『教忠教孝，教從』，則『皆片面之義務，不平等之道德，階級尊卑之制度』，現代『共和政體，西洋文明』，是『絕對相反』的。他的結論是：如『欲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合於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人權之新信仰。於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澈底之覺悟，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正不行』！這段話，我們可以說，直等於篇最激烈最堅決的『討孔檄文』！

而且，陳獨秀在反孔的鬥爭中，其思想也愈來愈進步，愈來愈深刻。

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二卷四號）一文中，便已接近了

附註：當時各學校的禮堂上，差不多都置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或有『萬世師表』的扁額，每於開學及孔子生辰時，學校當局必領導全體學生向

史唯物論的觀點（當然是不自覺的），用『社會之生活狀態』（即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來解釋社會各種『學說』（即上層建築）的『興廢』關係了。例如他說：『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其變遷愈複雜，而期間愈速者，其進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獨尊一說，以爲空間上人人必由之道，時間上萬代不易之宗，此於理論上決爲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實上惟於較長時間不進化之社會見之耳。若夫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恒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爲變遷』。『現代生活，以經濟爲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爲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陳獨秀從這一歷史哲學觀點出發，於是進而抨擊『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爲人子爲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在『孝』的教條之下，爲人子者不得自由『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自由參加政黨及政治生活。在『從』的教條之下，婦女不但絕對談不到『參政』，且其身體亦絕不能自由，甚至夫死還要『守節』，致釀成種種悲劇。此外，陳獨秀并指出『婦順舅姑』，父死守喪等禮教，均與現代的社會生活絕端矛盾。因此，陳獨秀更進而對於『孔教』或孔子的學說，作了一個最接近於現代歷史科學的評斷道：『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正由於陳獨秀對『孔教』的本質有這種歷史的，深刻而正確的認識，於是他的直氣壯地最後向那些盲目地尊孔的人們高呼：『吾願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隨聲附和！試揩爾目，用爾腦，細察孔子之道果爲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態？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惡・進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斷，勿依違附和！依違附和，爲眞理發見之最大障礙！』這種根據時代要求，根據理智判斷的強有力的呼聲，在當時是最足以感動人之說服人的。所以，自從陳獨秀這種呼聲發出之後，『孔教』的命運就判定了一代人頭腦中抹去了它的痕跡！

陳獨秀自開始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反對東方文化，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直到站在歷史哲學的觀

點上反對宗教，就獨秀本人的思想說，可算發揮到了頂點，就他的戰鬥精神說，也算達到了最大的限度。後來（直到五四運動的末期）陳獨秀之一切論著，僅只是依照上面的思想和精神加以開展，加以具體化。至於吳虞之特別反對家族制度（『新青年』二卷六號『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胡適之專門批評婦女的片面貞操（『新青年』五卷一號『貞操問題』），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論文或演說，更不過是圍繞陳獨秀所發揮的基本思想的軸心，在各方面向封建的一切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舊習慣加以掃射，加以攻擊而已。

正由於陳獨秀對東方文化，對封建舊傳統，舊思想，舊倫理，特別是對孔教這種勇敢的尖銳的，深刻的批評，這種無情的澈底的破壞，新一代青年人的頭腦，才能從一切封建舊傳統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也正因爲有這種『解放』，他們才有可能無所顧忌地接受了新的思想，新的學說，新的主義，新的道德觀念，大踏步地跨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於是要求各式各樣的平等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和社交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及離婚自由……像火山溶岩一樣地迸發，向西方八面奔放，最後匯成了一股洪流——這就是『五四運動』。

自然，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相當長期的進程中，他前後所發表的某些主張，某些解釋，不免發生矛盾，甚至混亂。例如他對於哲學，有時贊成進化論，實證論，甚至接近唯物論；但有時又宣揚歐根和伯格森的唯心論，或信仰實驗主義。在宗教問題上，陳獨秀更是矛盾得厲害，例如他在『五四』前期曾主張『必以科學爲正宗，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這便已經達到法國啓蒙哲學家的『無神論』了（見『再論孔教問題』——『新青年』二卷五號）。但到了『五四』後期，他却又宣稱：『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自然不能沒有他。……因爲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七卷五號），這顯然是十足的實驗主義的立場。像與這相類似的矛盾和混亂，乃至幼稚，膚淺和錯誤的地方，還有不少。

但人們絕不應利用陳獨秀這些『弱點』來『抹殺』他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思想上的領導作用（註）。因爲陳獨秀這些『弱點』，差不多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附註：像『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的著者華濤，談到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時，只特別指出李大釗，却根本不提陳獨秀的名字，便是有意抹殺的奇例。

啓蒙運動家，特別是落後國的啓蒙運動家們，所絕難避免的。若就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尤其是在這運動的前期中所表現的基本思想看來，是具有『一貫的系統的，合乎邏輯的，是代表當時最急進的民主主義，最富於反抗精神，最能反映時代要求，並推動時代向前邁進的。這已是歷史的事實，不管人們承認與否，或高興與否，『五四運動』的歷史本身，便是一個公正無私的裁判官。

## 文學革命——白話與文言的鬥爭

新的內容，必須有新的形式相配合。因為『舊酒囊裝不了新酒』。所以一種新的思想內容，須要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它。這對於劃時代的新思想，尤其如此。

『新青年』所發動的運動，從反對一般的東方文化開始，到根本否定舊倫理，否定『孔教』，可以說是已經與一切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完全決裂了，同時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已推到了極端（陳獨秀稱之為『極端歐化』）。在這種情形下，那已經陳舊的，古板的，僵化的文言文，絕不足以表現這種新鮮的、活潑的、自由的新思想和感情，而需要一種同樣新鮮、活潑和自由的文學來代替牠。換言之，那種封建專制主義的舊思想舊情感，既然全被否定了，而裝飾那種思想情感的『貴族式』的死文字，也必須連帶地予以否定；而需要一種能够表達現代民主主義新思想新情感的『平民式』的活文字來代替。胡適之之起而主張文學改革，勇敢地，堅決地提倡以『白話』代替『文言』，恰好是反映了這一傾向，適應了這一時代的這項要求。

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出版於民國六年一月一號）一文，不僅是『五四運動』中提倡文學改革的第一聲，而且是往後文學革命運動的一個綱領草案。該文從現在看來，好像平淡無奇，且覺得態度過於溫和，但在當時不啻是一紙對舊文學，對文言文表示反叛的宣告！這與陳獨秀反對舊倫理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含有同等重要的歷史意義。

『文學改良芻議』，首先提出了『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腐爛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這在表面上雖然不是直接攻擊舊文學

，但實際上却是針對着舊文學的諸弊端而發的。胡適之改革文學的基本觀點，是『文學進化論』。他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與陳獨秀站在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上，主張『時代有一時代之政治倫理，實相符合。』）他斥責那些專事摹倣古文的『文學大家』的文學，『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添幾許膺鼎。』他認為『獨有白話小說，才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因此他特別推崇『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的白話文學，奉之為『文學正宗』。接着，他又歷敍中國白話文學進化的史實，其所得的結論是：『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學，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這不僅是明白地主張『必須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且還預言了白話文定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

陳獨秀看到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後，即立刻表示了熱烈的贊賞和共鳴。尤其對於『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表示了『篤信而渴望』（見『文學改良芻議』附語）。並且緊跟着『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陳獨秀即提出了『文學革命論』（『新青年』二卷六號），激烈地宣稱：『孔教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吾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彌濶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朗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的主要結論是：『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由此可以證明：陳獨秀深深地感到了他當時所倡導的政治的改革，『倫理道德的革命』，迫切地需要進行文學革命來輔助牠們。換句話說，陳獨秀從社會的政治的觀點出發，認為舊文學（文言文）與舊的政治，舊的倫理思想等是不可分離的，必須一並毀棄。新的思想，必須有新的文字作工具來表達牠，傳播牠。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比起胡適之來，不但激烈些，且要深刻些。但在實際上，真正領導文學革命运并完成了這一革命任務的人，還是胡適之。

學及文字演變史的知識，在當時比任何人（連陳獨秀在內）都要高出一頭。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就已約略地指出了歐洲由拉丁文轉變為各國語體的事實，以及中國白話文怎樣發展的過程。隨後，他更專著『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三卷三號），進一步地分析了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不可禁遏』的趨勢，因而更『深信』『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為正宗』。同時他又頗為客觀地分析了歷代文言文發展的趨勢，最後則指出『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之文）代之。此種人可謂真正古文家。』應當加以『攻擊』。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四卷四號——民國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裏，從『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的研究中，指出歐洲意大利和英國怎樣從拉丁文解放出來，創造了自己的『國語』，自己的『白話文』。他特別認為『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因為……在意大利提倡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文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纔可以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由前面所引述的這一切看來，胡適之之起而提倡改革中國文學，絕不是偶然的了。無論在文學的一般理論上，尤其是對於中西文學及文學發展史的知識上，都有了相當充分的準備。胡適之對於中國古文學與白話文學以及西方文學史之了解，與陳獨秀之對於中國舊倫理和孔教以及西方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等的了解，恰好成了個對照。尤其有趣的是：陳獨秀特別推崇法蘭西的文化，以法國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改革家為模範，大膽地向中國的舊思想和舊倫理進攻；而胡適之則以意大利但丁時代的文學革命作典型，來供他在中國進行文學革命的借鏡；——人們也許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偶合，然而這恰好證明了：凡是落後國家一切偉大運動的前驅者們，為了有效地推進運動，不能不從先進國家去尋求和他們所領導的運動相類似的思想和經驗，以為其行動的指南。因為『先進國家是後進國家的榜樣。』凡是先進國家任何一個偉大運動的思想，經驗和教訓，都是含有『國際意義』的，對於落後國家都是極可寶貴，值得學習的。

胡適之在文學革命運動的進程中，也和陳獨秀在倫理革命的進程中一樣，愈是往前進，也就愈加變得激烈而澈底。例如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一文中，對於舊文學的改革，便曰『不像在『文學改良論』中那樣溫和了。他自己說：『中國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的真有生命的「文言文」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學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的，都是白話的，或者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好文學。那些用死文字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的文言。』因此我說：『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這是用了極端煽動的口吻，以『死字』形容文言，以『活』字形容白話，給前者以澈底的破壞，而後者以極力的推崇。而且這種破壞與推崇，確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在當時是最能說服一般青年人的。胡適之在這裏，真不愧為一個急進的文學革命家！

但胡適之對於文學的改革，不只是具有一般的理論，更不僅限於對文言的澈底破壞和對白話文的極力推崇，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建設新文學的方案。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便是他的『方案』的具體表現。在這個方案裏面，他告訴人們須怎樣鍛鍊白話文作為寫做的唯一工具；怎樣從各方面及實際上收集文學作品的材料；怎樣將收集的材料加以『剪裁』，及怎樣對整個作品『布局』；怎樣用生動的寫實方法去『寫人』、『寫景』、『寫物』和『寫事』。最後，他特別主張用白話『趕緊多多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這個方案的內容，假如從現代新文藝的理論看來，是幼稚的、膚淺的；即同現在普通的文學概論比較，也是欠深刻的，至多只能適合於一般高中生的國文教材。但人們絕不要忘記：這方案是在最初提倡白話文學的時候寫的。當人們剛剛從文言文的舊文學的鎊鏟下解脫出來，開始向白話文的新文學前進的時候，有如一個生來就被關在監牢裏長期過活囚犯，剛被釋放出來，一切都得重新學起，一切都得從頭作起。所以胡適之這個粗淺的甚至幼稚的建設新文學的方案，對於那時剛開始用白話文寫做新文學的人們，特別是對於開始學習新文學寫做的青年們，却發生了極大的作用，收到了極大的效果。因為這方案，不只是替新文學指出了應走的方向，而

且還給從事新文學的人們，規定了一個頗為具體的實際準備寫做的步驟和方法——這在那時候是十分需要的。

最後，胡適之不僅是文學革命的號召者，白話文學的首倡者，而且還是最先實行用白話寫做新文學，即創作詩歌的人（他的『嘗試集』，即是最初試用白話寫成的詩集。）姑不論胡適之的白話詩的成就如何，但就他當時在這一方面所表現的那種勇往直前的實踐精神，那種『知行合一』的精神，實在值得贊許的。這對於當時新文學的推進上，無疑地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文學改革，自經胡適之提出而獲得陳獨秀的有力聲援和鼓舞之後，很快地就得到了當時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如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魯迅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的擁護。不久『新青年』本身即實行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從第四期第一號起——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號出版）。從此，『新青年』成了中國完全用白話寫做的破天荒的一個刊物，也就是第一個實踐文學革命的刊物。『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配合起來了。跟着『新青年』之後，凡是贊成『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的雜誌報章，都採用了白話文。於是，純粹白話文體的散文、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外國文字的翻譯，有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在中國文壇上湧現了出來。而且凡是被認為第一流的新作品（如魯迅的小說），都是白話文學的作品。胡適之所『深信』的『今日文學，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現在是完全實現了！這同時也就是宣告：文學革命，已獲了光榮的凱旋！

『文學革命』的勝利，即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成爲『文學正宗』的成功，這不僅是『五四運動』的最偉大的收穫之一，而且是中國全部文化史上的一个真正劃時代的表現。它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意、法、英、德等國以各自『白話文』代替拉丁文，差不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果歐洲各國不澈底從拉丁文的鎔鑄下解放出來，近代的歐洲文化是談不到的。同樣，中國如果不從文言文的鎔鑄下解放出來，也絕不會有最近二十餘年來文化上的新發展。因為在文言文那種舊『形式』的重重束縛下，現代新思想的新『內容』是無法自由生長的。胡適之關於這一點後來說得很明顯：「……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

想有一種新內容或精神，不能不打破那種束縛精神的枷鎖镣銬。（見『談新詩』）正因爲文言文的『枷鎖镣銬被打破』了，『自由的白話文體』被採用了，『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新思想的內容或精神，才獲得了空前普遍的和深入的發展；而多少具有現代新內容和新形式的文藝，也就從此逐漸地被創造了出來。

在文學革命的進程中，胡適之關於反對舊文學和提倡新文學時所發表的許多見解或主張，也像陳獨秀在反對舊倫理和孔教時一樣，會表現了不少的幼稚、粗淺、機械和錯誤。例如胡適之對於現代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從來沒有根據現代文藝的理論去加以檢討，去作過批評的介紹。甚至連現代文藝理論的術語，也不會運用。而他對於白話文學的詩歌，因爲只注意到『自然』或『自由』的需要，以致走到極端，而根本否認了詩歌的『格律』。殊不知詩歌之所以成爲詩歌，正因它具有它的格律或韻律的那種藝術形式。否認『格律』或韻律，就無異於根本否認了詩歌本身之存在。可是，人們絕不應該因此而抹殺胡適之在『五四運動』時代文學革命上的功績（像華崗之對待胡適之，也同對待陳獨秀一樣，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提起，却一味推崇魯迅，便是有意抹殺他的顯例），更不能因此而過分責難他，故意攻擊他（像葉青批評胡適之所幹的。）因爲胡適之的弱點，也是代表資產階級的一般啓蒙運動家，文學改革家所難於避免的。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科學的觀點上，平心靜氣地來考察『五四運動』的史實，那就不管胡適之在文學改革運動中表現了如何的弱點，（甚至連他的哲學上的實驗主義和政治上的改良主義的弱點在內），但把幾千年相襲下來的那種陳腐的、古板的、僵化的，貴族專利的文言文，勇敢地加以澈底的破壞，而堅決地提倡用新鮮的、活潑的和自由的白話文去發表新興階級的新思想，及創造現代的新文學之唯一工具，——這不能不說是胡適之在『五四運動』中，在中國文學革命史上的偉大貢獻，這是堪稱不朽的。至於依據現代最新的文藝理論來批評和檢討現代文學的內容和形式，而指出新文學之更進一步的趨勢，那不是胡適之所能盡的任務，而要期待站在另一新的階級的觀點上的人們來担负的。

## 科學社會主義的輸入

在近代歷史上，凡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民主改革運動，當它依照自己的邏

是如此（例如英國十七世紀的大革命，在其高潮中會產生了『平等主義』的思想；法蘭西十八世紀的大革命，則產生了巴比夫的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末期，特別是在落後國家中，更成了一種規律。俄國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產生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而我們的劃時代的『五四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

『五四運動』，自從『新青年』最初以西方文化來完全對抗中國舊文化開始，根本不認舊倫理，否認孔教，提倡新道德，反對文言文，主張白話文，宣揚各種各式的平等自由……迄至『五四』（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前夕，這一資產階級的急進的民主思想運動，已走到了臨界點。於是，另一更新的思想，民主主義的對立物——社會主義——便開始探出頭來了。『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第六卷五號——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便是這一傾向之最明顯的表現。

關於一般的社會主義（連無政府主義在內），遠在『五四運動』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便已經有過一些介紹和討論。例如『同盟會』在日本所出版的『民報』上，孫中山和胡漢民等就已經談到了社會主義的問題，且會因此引起了和梁啟超的論戰。吳稚暉、李石曾等也會在巴黎辦刊物（如『新世紀』），介紹無政府主義。但那時所介紹或討論的社會主義，既異常雜亂而抽象，且其動機，不是出於『趨時』，就是希圖利用社會主義來裝飾民主的旗幟。辛亥革命後的短期內，談社會主義的人更不少，甚至還組織了什麼社會主義的黨派（如『中國社會黨』），然而事實上全是投機的。自然，孫中山在那時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是高人一等的。例如他推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道：『……有德國麥克司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條理之學說，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見孫氏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演講詞）。他同時對於斯密亞丹的學說却批評道：『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佔一部分，資本家佔一部分，工人佔一部分，遂謂其深合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皆為工人血汗所成。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較資本所得者，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階級愈遠，平民生計，遂為資本家所奪矣。』（同上）。因此，孫氏曾預言：『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

實行。』（民國元年四月，孫氏解臨時總統職後在同盟會會員錢別會演說詞。）但孫氏雖然有這種認識和預言，他本人却只是相信亨利的資本主義式的『土地公有』說，及主張採用畢士馬克的改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見同上兩篇演說詞。）這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距離尚甚遙遠。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第一次認真地，較為系統地，較為詳細地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介紹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還是『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

在這一『專號』中，所收集的文章（計共七篇），從馬克思的生涯到他的全部思想和學說，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都作了一個較有系統的，較為詳細的探討和介紹。雖然，它們的探討和介紹，尚嫌抽象，不免幼稚，尤其是對於馬克思說的許多批評，都是不得當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重複了當時修正主義者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如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一文），或是抄襲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空想主義的歪曲（如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的批評』）。但就一般說來，那些文章，除顧兆熊的兩篇外，都多少採取了認真介紹的態度和客觀研究的精神。其中尤以李大釗，是這一認真態度和研究精神的傾向之最重要的代表。

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上下兩篇，下篇則登載於『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中），對於馬克思主義那種有系統的頗為詳細的研究和介紹，不但在當時是空前的，就是在往後好些年中也還不多見。在這篇文章裏，李大釗開始告訴人們：『自俄國革命（指『十月革命』——作者）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着這世界的大變動，惹起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誤解。我們……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為世界改造運動的學說，在我們的辯論中，有點正確的解釋。』這段話，證明李大釗在當時已經理解馬克思主義，對於『世界大變動』的影響，及其『為世界改造運動的學說』，因而介紹過來，以便國內前進的人們對它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至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及其全部內容，李大釗在他的文章裏，首先作了如下的一個概括的敘述說：

『馬氏社會主義的論理，可分為三部：一為關於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為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於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

主義的經濟論。三爲關於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攻他的社會主義，簡直是不可能。因爲他根據於他的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變化而來的；然後根據這個確定的原理，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爲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預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於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命運。然後根據這個預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後的階級競爭。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部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他的資本論也是首尾一貫的根據『那今日社會組織下的資本階級與工人階級，被放在不得不仇視，不得不衝突的關係上』的思想立論。關於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於最後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

這一段對於『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概述，不但在當時是很扼要的，是十分精確的，就是到了現在看來，除了幾個術語應予以修改外（如『歷史論』應改爲歷史唯物論；『經濟論』應改爲政治經濟學或剩餘價值論；競爭應改爲鬥爭等），我們覺得還是扼要而精確。尤其是他指出了『階級競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部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的那種解釋，更顯得扼要而精確。因爲關於這一點，不但是以前所有第二國際的一切機會主義者所完全忽略了的，就是現在自稱爲馬氏『真正門徒』的人們，也正在熱中於投機取巧，同馬氏的『階級鬥爭說』背道而馳呢。

李氏在往後詳細介紹馬氏社會主義的『三部理論中』（實際上只介紹了前兩部，即唯物史觀和經濟學，就停止了），是盡力地引證馬氏的原文加以解釋，一般可說是忠實的。但他所附加的批評，却不免受了當時一些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的影響，是錯誤的。然而他的『批評』，僅限於一些枝節，在大體上，他差不多是贊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後，會無批評地這樣寫道：『資本主義是這樣發長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到後來滅資本主義的就是他。現今各國經濟的形式，大概都向這一方面走。……凡物發展之極，他的發展的境界，就是他的滅亡的途徑。資本主義趨於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也是不可免之數了。』這段話的意，確實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的最後結論，是早已被寫進了

裏也明白地表現出來。所以就一般說，李大釗在那時不僅是一個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介紹者，而且已是一個信仰者。他的缺點，不過是還沒有完全從那時頗爲流行的『人道主義』（這種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的產物。那時的陳獨秀在『答半農的D——詩』中也表現了這種傾向）的幻想下解脫出來而已。所以他研究馬克思主義所得的結論是：『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獨改造經濟組織，怕也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毋須說，李大釗在這裏所表現的完全是一種二元論的思想。他此種錯誤思想的根源，是由於他那時還沒有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不僅沒有否認改造『人類精神』，而且是極力主張要把『人類精神』從過去及現在的一切束縛下解放出來。人們只要看看馬克思本人及其門徒之特別努力於教育工人及一切勞苦羣衆，特別注重於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及其階級意識，就夠明白了。不過馬克思主義認定：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下，在絕大多數的工人及勞苦羣衆經常陷於生活的重壓底下，所謂『人類精神』的真正改造是談不到的。只有根本改造現存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得全體人類在經濟地位上平等之後，即絕大多數的人民從日常生活重壓下解脫出來之後，『人類精神』才有真正『改造』之可能。換句話說，『人類的精神』或思想，乃是被經濟所決定的。然而關於這一十分重要的見解，李大釗很快就明白了。不久之後，他所發表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新青年』第七卷二號——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出版），就是最好的事實表現。

在這篇文章裏，李大釗已經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發言。所以他劈頭就說：『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然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這不但表明李大釗已放棄了他以前那種『物心』二元論的矛盾立場，而且是完全站在以『經濟』爲社會基礎的觀點，即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來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問題，特別是解釋『五四運動時代思想變動』的問題了。因此，『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不僅對於李大釗個人的思想發展上是一個劃階段的標界，就是對於整個『五四運動』時代思想的發展和轉變上，也是含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所以這篇文章，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

。這已為許多人所認識，特別是陳獨秀對此會有過較清楚的說明（見『吾人之最後覺悟』）。但東西兩種文明的基礎究竟何在？其根本區別點如何？却沒有任何人加以指出。然而理解東西文明的真正鎖鑰正在這裏。而李大釗便恰是從這裏出發。他說：『東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動的文明。』因為前者是以『定住的農業爲本位』，而後者則以『移住的工商爲基礎』。李大釗握住了這一鎖鑰，因而第一次撞進了中國『固有文明』的神秘之宮，將它的真相給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下面所引的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中國以農業立國，……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國特別發達。……中國的大

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法、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看那二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那一樣不是犧牲被治者的個性以事治者？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全是以修身爲本；又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犧牲個性的第一步，就是盡『孝』。君臣的關係的『忠』，完全是父子關係的『孝』的放大體；因爲君主專制主義，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至於夫婦關係，更是把女權浸却……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爲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樣相沿下來，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與靜沉沉的農村生活相照映，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

由此可以異常清楚地看出：所謂東西文明，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所謂綱常、名教、道德、禮義……總而言之，凡二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或『孔教』，全是建立在大家族制度上面的『表層構造』。而大家族制度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是以停滯的、保守的農業經濟爲其基礎的。所以，中國的『固有文明』的發生，發展及其長期存在，絕不是偶然的，實具有它的根深蒂固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它的改變，也只有等到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來動搖它，來打擊它的時候，才有可能。這『力量』便是建立在工商業經濟基礎上的西方文明。所以李大釗接着說：

『時代來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根本動搖了！……中國的農業經濟，既因受了重大的壓

迫而生動搖，那麼首先崩潰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國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爲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爲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潰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就不能不跟着崩潰粉碎了。』

上面這兩段話，不但指出了『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一般原因，而且特別給了『五四運動時代思想變動』（尤其是陳獨秀在這運動中所倡導的『倫理革命』和『反孔運動』）的客觀原因，一個最正確的解釋。根據這種觀點，李大釗接着便把『五四時代』的許多具體問題都提了出來，而加以更詳細地說明：

『試看中國今日種種思潮運動，那一樣不是打破大家族的運動，那一樣不是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

『第一、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運動，乃是推翻父權的君主專制政治之運動，也

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義之運動。……

第二、社會上種種解放的運動，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是打破父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夫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男子專制社會的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義，順夫主義，賤女主義的運動。如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問題，短要問題；社會問題中的私生子問題，兒童公育問題；婦女問題中的貞操問題，節烈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女子職業問題，女子參政問題，法律上男女權利平等問題（如承繼遺產權利問題等）婚姻問題，——自由結婚，離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戀愛，婚姻廢止，——都是屬於這一類的，都是從前大家族制下斷斷不許發生，現在斷斷不能不發生的問題。……現在因爲經濟的壓迫，大家族本身已竟不能維持，而隨着新經濟勢力輸入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又復衝入家庭的領土，他的崩潰破滅，也是不可逃避的運數。不但子弟向親長要求解放，便是親長也漸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婦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漸要解放女子了；因爲經濟上困難的結果，家長也要爲減輕經濟的負擔，聽他們去自由活動，自立生活了。從前農業經濟時代，把他們包容在一個大家族裏，於經濟上很有益處，現在不但無益，抑且視爲重累了。至於婦女，因爲近代工業進步的結果，添出了很多宜於婦女的工作，也是助她們解放運動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勞動運動，也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派的學說，對於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階級的犧牲。……現代的經濟組織，促起勞工階級的覺悟，應合社會的新要求，就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這也是新經濟組織上必然發生的構造。』

李大釗對於『五四時代』這許多問題均有系統的詳細的說明，不但在當時是

最爲特出，最爲深刻，證明他最能理解『五四運動』的特質，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是經得起批判，值得贊許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一文，不只是李氏個人思想發展上之最輝煌的表現，而且是整個『五四時代』思想發展之最高的象徵。因爲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檢討中國自己的歷史；它一方面，清算並解釋了『五四時代』思想運動的本身，而另一方面，又開啓了一個更新的思想運動的時代。所以從這時起，『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和擁護者間即起了深刻的分化：溫和的一派，便停留在原來的民主主義的陣地上，等待着時機去與反動勢力妥協，或把自己轉變成爲新的反動派；而急進的一派，則接受李大釗的觀點（據說：陳獨秀之接受社會主義，最初也是受了李大釗的影響）。而逐漸地踏進了社會主義的運動之中。

如果單就思想的發展方面看來，可以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化身。他最初以一個最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參加了，並幫助領導了『五四運動』；但當這一運動發展到了頂點而無法再前進的，他即轉變到了社會主義，而準備替另一個新的運動去服務了。如果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民主思想鬥爭的勇敢的發動者，和這個鬥爭的領導者；則李大釗便是這同一鬥爭的最堅強的殿軍，並在鬥爭達到高峯時，將它轉移到另一個新的鬥爭，社會主義的鬥爭去的急先鋒。

## 結論

『五四運動』，就它的整個傾向，它的基本要求和成就說來，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

『啓蒙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歐洲先進國家中，是表示新興的資產階級發展到了相當程度，企圖在思想上從一切封建的專制主義的殘餘傳統的束縛下解脫出來，而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統，建立自己的世界觀或人生觀的一種運動。換句話說，啓蒙運動，就是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民主解放運動。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運動，就其本質說來，是最初的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而法蘭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則是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之一個最完成的典型。因爲這個運動會以『批評』爲武器，以『理性』爲標準，將當時橫暴的專制政治，不平等的法律，愚昧的宗教，貴族的藝術

人自由發展的思想、風俗、習慣等等，都統統放在『理性』的法庭之前，加以猛烈的尖銳的『批評』，嚴厲的控告，最後宣佈了它們的死刑。不用說，藏在這個『理性』幕後的乃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在當時，這『主義』正是代表歷史進步的傾向。所以啓蒙運動者在他們的『批評』奮鬥過程中，會展開了並完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最進步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狄德洛所代表的唯物論和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乃是這一啓蒙運動思想發展的邏輯後果。與法蘭西啓蒙運動性質上相類似的啓蒙運動，在歐洲各先進國家中差不多都發生過。不過後者所表現的形式和內容，遠沒有達到前者的高度和澈底而已。正因爲如此，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近代全歐洲歷史上劃時代的。

自從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侵入東方後，東方的落後國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乃至日本等）也先後發生了各自的啓蒙運動。

中國的啓蒙運動，從歷史上說來，遠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前就已萌芽。而且有趣的是：最初發動這一運動的還是一些外國人，如李提摩太和李嘉白等。康梁的維新思想，受他們的影響是很不小的。『戊戌政變』後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也可以說是一種啓蒙運動的表現。梁啓超及其同道者們，在那時不但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一般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經濟知識、道德、哲學及自然科學等，而且還批評了中國專制政治的流弊，以及某些舊思想、舊道德、舊風俗的不合理，並大聲疾呼要培植『新民』（見梁氏所著『新民說』）。但由於梁啓超所代表的階級基礎在那時甚爲薄弱，因而他的基本立場只能是與舊勢力、舊傳統、舊思想謀取妥協的改良主義。因此他所進行的『啓蒙運動』，也就無法澈底，無法深入。但我們絕不能因此便否認梁啓超及其『新民叢報』，在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所起過的重要作用。我們寧可說，如果沒有梁啓超在『新民叢報』裏替中國文化思想各方面所作的許多準備工作，後來的『五四運動』是絕不會進行得那樣順利和發展得那樣迅速的。雖然如此，但梁啓超所進行的工作，只能算是『五四運動』前的一些準備工作而已。這正如法國的『人文主義者』在『文藝復興』時代所作的工作，只能算是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作了一些準備工作，是相類似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真正劃時代的啓蒙運動。它把二千年來

的批評，澈底的否定；尤其是它以絕大的勇氣和決心摧毀了『孔教』，粉碎了這個『大成至聖』，『萬世師表』的偶像，這差不多等於在歐洲粉碎了耶穌基督那個偶像一樣；它同時也以同樣的勇敢和決心，廢棄了二千餘年來被『士大夫』視為『正宗』，視為『奇貨』的文言文，而以『鄙言俗語』的白話文來頂替了它，這又和『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各國以各自的俗語去代替拉丁文，很相類似；最後，則以最認真最嚴肅的態度，將近代西方文化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世界觀，——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次輸入到中國來，並立刻運用了這主義的哲學方法解釋了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特別解釋了『五四時代』思想變動的本身；——這些劃時代的具體表現，不但是我們以前的啓蒙運動家所不會作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啓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啓蒙運動的典型；那麼，我們的『五四運動』，便是東方落後國家的啓蒙運動的一個模範。雖然，我們的啓蒙運動，遠沒有像法蘭西的那樣具有創造性，達到那樣高度的成果，產生了那樣的『百科全書』；但比起東方的落後國家來，我們的啓蒙運動，是最富於批評精神，最富於歷史意義，而且是收穫最大的。因為我們有了『五四運動』的貢獻，我們這一代人的頭腦，從孔子學說的一切鎔鑄下解放出來了，我們從此纔有可能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信仰和自由批評；我們的筆從文言文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了，我們從此才有可能自由抒寫自己的情感，發表自己的意見，創造自己的文藝；我們得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和觀點，我們從此才有可能進一步地、科學地來研究全人類的歷史發展，考察整個世界的內在關係，預測這個世界的可能前途，研究改造這個世界的方法和步驟。

自然，我們並不是說，『五四運動』是沒有弱點的。我們寧可說，它的弱點是很多的。它像任何落後國家的啓蒙運動一樣，一定要顯露，而且顯露了代表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的某些『神性』，某些妥協性或極端性。例如：人們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思想，往往是無批評地接受；而對於自己的舊傳統或舊思想，則予以感情的而非理智的否定。以致今天否定的東西，明天又改棄了。然而這一類的弱點，並不

妨害我們前面敍說過的『五四運動』所會達到了的那種劃時代的意義。而我們所要認識的正是這一劃時代的意義。因為認識了這一意義，對於我們的今天和明天都是很有幫助的。

自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又經過了整整的二十七年了！這中間曾經有一次大革命（一九二五——一七年）。那個革命，在思想上原是與『五四運動』發展的最後成果（李大釗所達到的）緊相聯繫的，是從那裏出發而不斷地準備起來的。它是應該繼續『五四運動』的最後成果，而將中國民族帶到一個新的歷史解放階段上。但它却被一種舶來的瘟疫思想和內在的反動勢力給毒殺了！

從此，中國又沉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淵。外來的侵迫，內部的混戰，軍閥的橫暴，官僚的貪婪，——交織成了一幅網羅，人民就被放禁在裏面，任其擺弄和宰割。如果從思想上說來，幾乎倒退到了『五四運動』的出發點。最荒謬而又最諷刺的是：在『五四時代』曾經反對過舊倫理，反對過禮教的人們，隨後又在『禮義廉恥』的名義之下去擁護它們了！從前反對過孔子的人們，隨後又親身踏進孔廟裏去舉行祭孔了！從前反對過文言文的人，隨後又堅持以文言文『辦理公事』並教育青年了！甚至曾經自以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們，現在也認為那種『主義』不過是一種『哲學』罷了！好像歷史是在開玩笑，專替我們這個時代繪製諷刺畫似的！

但歷史的發展究竟有它自己的邏輯，並不因為人們的故意倒退而就永遠踟躕不前。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情形已很明顯：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比之『五四』更為高級的時代，一個將繼承一九二五——七年的大革命的時代，正在醞釀着，潛長着，準備着要從黑暗的深淵裏掙扎出來，邁步前進。歷史現在所要求於我們青年一代人的，是首先從思想上來重新武裝自己。『五四時代』在思想上所遺給我們的一份遺產，自然還不够用，遠不足以適應一個更高級的新時代的要求。但它那種對舊傳統，對舊思想的大無畏的批評精神，那種認真研究新學說，熱烈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現時青年一代人特別效法的。一個『飛躍的新時代』，必須有一種『飛躍的新精神』來迎接着它！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六日完稿

#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 中國如何民主化

郭紹虞

民主，必須由爭取得來的，或且由流血得來的。假如不付代價，不勞而獲，甚且出於欽定的民主，那就不免有變質的危險。

『惡紫之奪朱也』，與其得到變質的民主，寧願得不到民主。我們不希望蒙馬以虎皮。

但在現時的中國，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民窮財盡，大家已掙扎於飢餓線上，從任何方面說都沒有再從事於戰爭的理由。所以我希望高唱還政於民的，真能切實地做到還政於民。真做到還政於民了，當然軍隊國家化，也不應再有什麼問題。消除一切人類不應有的隔閡，放棄一切鬥爭不合理的手段，善意的而又互相監督的，彼此協力，彼此秉着大公無我的心以從事於建國，我不信神聖的黃帝子孫，做不到這一步。我不信人類必向着陰暗面進行而不肯伸出誠意的手。

做到還政於民，做到還軍於國，政治就上了軌道，就上了民主的軌道。此外，再有何求！

說我這一些意見是太理想化嗎？

我這一點希望也是本於大多數人民厭戰的心理而產生的。尤其在現在，更不應當槍口對內。所以雖則覺得民主應當出於爭取，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許可能受這一點厭戰心理的感動，而澈底覺悟做到道地的民主。

時代是演進的，不隨着演進則自身必歸於淘汰，所以這民主主義的潮流是沒法違抗的。歷史是無情的，將來的爲功爲罪，自有定論，決不能够求助於現時的宣傳，所以這千載難逢的建國時機，又是不容許輕易放過的。

在現在的時機，我覺得中國如何民主化的問題，假使要不流血而從和平

之路以救中國，那麼最要緊的只有建築在這種心理上面。

然而能說這一點意見，不是太理想化嗎？

我們且靜待事實的證明。

##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李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主義的潮流日趨膨脹。這種主義固然不是一張萬應藥膏，無論什麼症候可以應用；但在抗戰八年，疲於奔命，大家都想休養生息的目前中國，至少是對症下藥。因此，我趁求真徵文之便，也來談幾句。

民主主義一稱德謨克拉西，人們認爲舶來品，故用譯音來強調牠的色彩。在我國幾千年君主專制之下，的確談不到民主主義，即三十四年來的中華民國，又何嘗找得着牠的影子？不過原始共產社會都有真正的民主主義，我們的唐虞時代也有不少遺跡遺傳下來。到了封建制度崩潰的戰國，孟子會大聲疾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主思想的新萌芽。

孟子說了這句話，雖受到明太祖無情的懲罰，被屏諸孔廟配享之外至兩年之久。但這話本身現已不適用，應改爲『民爲主，國家屬之，主席爲公僕』。這是談民主主義的起碼知識，值得全國人民記在腦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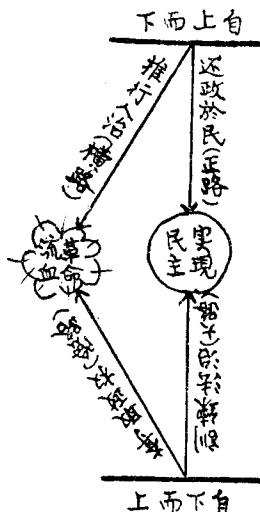
蘇軾說：『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其實向來的統治者所要的是『天下』，是『匹夫匹婦』的財和命，並不是他們的『心』。所以孟子儘管喊破喉嚨『民爲貴』，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同樣，所謂『民爲主』，如無適當的方法表現出來，也自然是沒有價值的。我們現在代表『匹夫匹婦之心』要求：一、由成年男女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制定憲法，並選舉地方至中央的會議代表和行政首長；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權利。

、貧農（包括退伍的貧農）無償的獲得土地，工人取得足夠維持生活的工資，並參加生產的管理，規定合理的勞動時間，禁止星期日勞動，限制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四、提高店員生活，並予以業餘教育；五、厲行普遍的免費國民教育，提高教職員待遇，按照服務年限予以養老金，無論大中小學實行教員治校；六、徵收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重徵遺產稅，取消一切間接稅。總說一句，我們所要求的民主，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經濟的、社會的，如果後者辦不到，雖有前者，也是無濟於事的。

## 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林漢達

反民主的法西斯帝已被擊毀，壓制民眾的獨裁政治已被打倒的今日，民主主義成為全世界不可抗禦的大潮流，民主政治成為中國必走的路線，這已經是無須討論的了。所要討論的只是怎樣使中國的政治名副其實地走上民主的大道。照我看來，只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自上而下，從政府政黨走起；一個是自下而上，從人民大眾走起。自上而下的方向底下，又有兩條路：一條是正路，就是還政於民，實行憲政。一條是橫路，就是澄清吏治，推行賢人政治。自下而上的方向底下，也有兩條路：一條是大路，就是訓練紀律生活，培養法治精神；一條是險路，就是喚醒民眾，奪取政權。兩個方向，四條路，上下選擇得好，配合得法，可以很快地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目的；否則，愈走愈遠，也許會走到絕路上去。說明如下：



要是政府不走正路，不肯還政於民，不實行憲政，却走上橫路，想從推行賢人政治着手，即使目的是在將來實現民主，即使同時訓練人民服從紀律，培養法治精神，其結果，必致走入歧途；因為中國數千年來政治的路線就

只有這條「人治」的橫路。這條高架的橫路只有統治階級可走。走得好，也不過一切為人民打算，不准人民自己打算，即所謂 Everything for the people, nothing by the people。治權既在治人者，而受治的人民沒有「法治」的保障，人治政治很自然地就變成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又很自然地變成了貪污政治。所以人治政治的橫路必然引入貪污政治的泥潭裏去。在官僚制度，貪污政治底下，要叫人民服從官僚所定的紀律，遵守貪污所發的法令，簡直是揪住牛頭頸，叫牠飲水，除非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全是一種不守法的風氣正是貪污土劣統治底下的產物，是反抗奴役民眾的官僚制度的自衛心理的表現。國家只有「以上制下，以下事上」的片面強制法，而沒有「以下制上，以上事下」的公約，人民怎末能够有法治精神呢？換言之，沒有「法治」，怎麼能够培養「法治精神」？沒有「民主」，哪兒去找民主精神？

只有政府還政於民，實行憲政，人民才可以從「做中學，學中做」養成紀律生活和法治精神。要是你想教育人民參透紀律的真諦，訓練他們養成法治的精神，等到四萬萬五千萬的男女老少，三萬萬六千萬的文盲政盲，都能夠讀書、識字、知禮，都能够正心、修身、齊家，而後才實行民主，這等於勸勉窮人說，『好好兒地修橋、鋪路、樂善好施吧，下世給你投胎到一個財主家裏去』一樣。

以上是說，政府不走正路，人民是走不上大路的。自上而下的橫路愈走愈糟（到貪污的泥潭裏去），自上而下的險路就愈走愈狹。那末怎麼辦呢？能不能永遠這末分道揚鑣地走下去呢？不能，決不能。人民大眾決不全是人才；一條鐵鏈鎖不住全國的人心。「先知先覺」就會領導「後知後覺」，起來反抗那「不知不覺」的老朽的統治者。你要我拿出證據來嗎？法蘭西的大革命推翻了路易的政權；布爾希維克推翻了帝俄的政權；中國國民黨推翻了滿清的政權。這是一條自下而上的近路，也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需要血和肉來鋪成的革命的道路。誰會喪心病狂得願意去走這條血路呢？還不是貪污老朽出賣國家民族的「獨夫」政府，逼使人民從絕路上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嗎？革命的固然是叛黨，同情革命的也是叛黨，批評政府的是叛黨，不滿現狀的也是叛黨；反對貪污的、主張公理的、愛國的、憑良心說話的、要求和平的，都是叛黨；寡子反對玉杯象箸是叛黨，九侯之女不喜淫，也是叛黨；比干

不怕死是叛黨，文王背後嘆了一口氣也是叛黨。於是不屬於叛黨的也被迫而爲叛黨；凡是有良心的，有靈魂的，有血氣的，有思想的，有常識的，有腦袋的都有被捕、被殺、被剖的危險。人民被逼而走上了險路，於是良莠不分，玉石俱焚的大屠殺和反大屠殺的刀兵，害得老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天哪，我想到這兒，只會流淚祈禱：但願上帝拯救我們飽受戰爭的痛苦的人民，拯救我們瘡痍滿目的國家，免了這個可怕的可咒的災難吧！

實現民主，統一中國，改善民生，復興民族的路線，已經很清楚地擺在我們的面前。要是上下一心，精誠合作，我們就可以歡天喜地走上那條和平的演進的康莊大道。否則，一個脫離了民衆，走上了歧路；一個要求生存，走上了險路。雙方的路愈走愈狹，終於跌到流血的革命的血路上去。自己遭難還可以說是咎由自取；可是怎末對得起下一代的子孫呢？

## 民 主 與 特 權

胡山源

——誰配談民主？

中國人生來似乎就有享受特權的觀念。想做帝王將相，當然爲了要享受特權，就是一個「起碼人」，也總時時憧憬着「討便宜」的念頭，討便宜又何嘗不是享受特權。上電車時，希望自己搶先上去，這是要享受特權；上了電車希望電車即速開，不要再搭別人，這也是要享受特權；上了不要停，直到自己要下去的地方才停，這更是要享受特權。總之，個人自命不凡，個人要在享受上超出別人，於是，享受不到，便搶，搶不到，便打，打不了，便殺人放火，無所不爲；或者，享受不到，便騙，騙不到，便玩弄種種手段，以別人爲犧牲，來造成自己的機會。同時，既享受到了，便又牢牢把定，不肯放鬆一分一毫，免得別人來搶，來騙。這種心理，當然「自古已然」，不過「於今爲烈」罷了！

現在我們要實行民主，這個享受特權的觀念不取消，即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其結果也不過「取而代之」，換湯不換藥，決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出現。

要取消享受特權的觀念，如果希望享受者自動取消，那真成了「分虎謀皮」，萬萬辦不成。這只有由不想或不願享受者用強力去取消之。照我看，取消現在享受特權的特殊人物並不難，難在一批享受特權的人

物取消了，而另一批享受特權的人又起來了，並且這一批人中，簡直就是妄來高喊取消別人的人。因此，話又說回來了，在現在，除了大家聯合起來，用強力去取消享受特權的人之外，還該根本着手，大家養成不想或不願享受特權的觀念。

我現在要問問每個人，尤其知識階級，你有沒有這個享受特權的觀念？

如果你還想你的生活比別人優越些，你的地位比別人高些，你的勢力比別人大些，你的名譽比別人響些，你的一切享受，不論物質的、精神的，都要超出別人，甚至只要超出一些些，那我就老實對你說，你沒有資格談民主，你的民主是假的，你還是特權中人，「一朝權在手」你一定「便把令來行」，使人過不去。你不配，你只有被取消！

特權當然要被取消，民主當然會實現：我們要做取消者呢，還是被取消者？

## 民 主 問 題

索 非

現在已經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因此，現在的主政者只要能够順應潮流，事事公開，唯民是聽，則非常容易地走上「民主」之路了。

我們的國家的必須「民主化」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時到今日而還要把他當做一個問題來討論，這太使人不敢相信了。

我們不討論這問題，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

## 佛拉提米爾論中國民主主義

沒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能真正解脫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因爲這種高漲激勵勞苦羣衆並使之能够完成奇特的事業……中國的自由是因農民民主派與自由資產階級的聯合而爭取到了，農民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做領導，是否能够用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來抵擋住自由派（這派人只待良機到來，就要向右飛奔），這在不遠的將來便可看得明白。

印度尼西亞——東印度的面前，擺着一個問題：再做殖民地呢還是以武力爭取民族解放。

東印度有兩大地理特點：一、它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熱帶國。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島國。全國有土地七十三萬三千平方公里，一九三〇年時有六千萬餘人口。

一般地說來，東印度可分為四大部份：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西里伯等四島為一部份，統稱大巽達島；爪哇以東的較小的島嶼如峇里、龍目、松巴華、松巴、色洛羣島、韋他、弗洛雷斯，及梯摩島等為第二部份，統稱小巽達島；麻拉甲羣島（香羣島）為第三部份；新畿內亞之一小角及其附近各小島為第四部份。

但是從歷史及政治經濟方面看來，前述這種區分並不恰當。爪哇雖是大巽達羣島中最小的一個，但它最富饒、發達，人口最密，是全東印度的中心區。

這一個羣島國的幅員之大，往往為一般人所忽略。東印度自極東至極西的距離，與美國紐約至舊金山的距離相彷彿，南北距離七百英里，一部份荷屬的婆羅洲，其面積已與法國相等，蘇門答臘一島比美國加利福尼亞一省還大些。新畿內亞是東印度的最大島，給兩個帝國主義分割為一。這橫亘在赤道之上的大島，有無數積雪的高山，都沒有火山，也有無數廣大的沼澤森林區。其他各島的豐瘠各各不同，其中以爪哇、峇里、龍目三島為最富饒。

東印度多雨、少風、濕度高、溫度也高。

一九三〇年荷蘭當局的統計，「荷印」人口共六〇、七三一、〇二五。爪哇及馬都拉有四一、七一九、五一四人，佔全人口三分之二。其餘各島佔三分之一。爪哇人口密度為全球第一，每平方公里三一四·五人。但是，爪哇和馬都拉只有六個市鎮的人口超出十萬的，最大城——巴城也只有四十三萬幾千人。

#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竹雲龍

這六千萬餘人中，土人五九、一四三、七五五人，歐洲人二四一、三七二人，中國人一、二三三、八五六人，其他亞洲各國人一一、〇二一人。十餘年來，尤其經過此次太平洋大戰以來，人口數字當然改變了，但這總的比率形態不會被破壞的。

二十四萬餘歐洲人，有十九萬餘住在爪哇和馬都拉島上，十萬人以上則集中在七個大都市裏。歐洲人之中，很多是混血種，這個數字荷蘭當局者沒

有（願意的）發表。其他亞洲各國的人也多數集中在城市裏。

中國人大多數去自廣東福建二省，分佈比歐洲人較廣。在爪哇及馬都拉

的較少，在其他各島的較多。華僑之間也有混血種。大多數是苦力。在礦山

，農場，這些華僑受着與土人一樣的待遇。

土人之中，除了新畿內亞中若干番族之外統稱印度尼西亞人。他們不但在「荷印」生存着，而且在馬來半島，菲律賓、台灣、馬達加斯加島等地都有他們的蹤跡。

土人的文化程度，相差很遠，有的已接受了現代文明，有的還在野蠻時代的樣子。

土人大多數信奉回教，但峇里島人則多數信佛教，因為佛教先傳入東印度，後來回教侵入了然後佛教退守該島，所以有此特殊現象，信奉基督教的共約一百五十萬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二、五。

一般說來，東印度土人沒有菲列賓人那樣能迅速地接受現代西方文明。雖然，荷蘭把東印度編為「第十二省」，但其文化、言語、習慣、風俗、宗教，……都與這個老朽而又卑小的帝國主義格格不入。

東印度人口大多數散佈於農村及礦山中，充份地說明了它的殖民地性質，表現出「供給原料」的一種最殘酷的無人道的姿態。

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東印度是個「原料出產地」。它供給全世界百分之九的規乃樹皮，百分之八十四的木棉，百分之八十的胡椒，百分之六十的植物纖維，百分之三十五的樹膠，百分之二十二的錫，百分之十二的茶，

百分之十的糖，百分之八的咖啡，此外尚有油礦煤礦鐵等。為什麼東印度不能成為一個富強的大工業國？它有足够的原料與勞力的呀！回答這問題很簡單：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限制東印度只許成爲農業國，永遠地成爲供給原料的殖民地。

東印度經常在帝國主義的瓜分中，經常成爲明爭暗鬥的目的物。

荷人於十六世紀末葉，在北歐一帶受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排斥，才直接向東方發展，第一艘商船是一五九五年到達東印度的。以後七年中有六十餘艘商船在荷蘭與東印度之間先後往返共十四次，在各個不同的『股份公司』管理之下，都獲得厚利。但不久因爲各公司競爭劇烈，買價提高，賣價降低，於是荷政府批准在東印度經商的一切商人，組織『東印度公司』，由政府授以各種特權及專利權——從政治方面到經濟方面的權力與權利。

當時東印度公司統治的地區很小，土王統治的面積極大，各土王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與戰事，不能建立一個統一的穩固政權來對抗荷蘭人，於是給荷蘭人一個絕好的機會；荷人集中管理海上交通，隔絕各土王，禁止土人自由貿易，不許土人自由遷移或旅行，實行其分而治之的毒政。

十八世紀後半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因辦事員舞弊過甚，待遇又薄，開支太大，公司船內濫運私貨等原因，虧損頗巨，而英國人及亞拉伯人的貿易競爭又很厲害。一七九八年政府的特許取消了，一八〇〇年一月東印度公司宣告停業，債務由荷蘭政府清理。

一八〇七年，荷政府成立一委員會，研究對東印度的通商原則及具體辦法，因爲不能放棄舊方法（如強迫徵工，分而治之，專利，實物稅……），訂立新辦法後一年餘又廢除了。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一年，曾經實行過比較開明的政策，以後又給英國征服過去，一八一六年又交還給荷蘭，一八一八年，荷蘭政府所派的三個專使，才草擬好『東印度法律』，成立總督，諮詢院。可是，當時真正在荷蘭人統治之下的，不過爪哇、馬都拉、麻拉甲三區；其他各地仍在土人自己管理之下，荷人不能深入。一八二七年，荷皇雖然也主張鼓勵發展私人資本，採取放任主義，但不久又改變了主張。因爲當時荷蘭國庫虧空甚巨，想急切地榨取東印度以求相抵。荷政府當時曾強迫土人以耕地及勞力代納稅，估計佔去土人勞力五分之一以上，這政策引起了土人

的樣子。私人企業在禁止之列，自由競爭又受限制，一切專利權爲政府包辦，造成經濟方面的混亂、停滯、衰落和恐慌。

一八四八年，荷蘭憲法修改了，國會已有權干涉殖民地問題，立法院有權否決關於殖民地的法律，一八五四年又在『東印度政府組織法』內刪除侵略政策的明文。在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荷蘭對東印度的殖民政策，繼續在國會中不斷爭辯。一八六八年國會決定殖民地高級官吏只對國會而決不向國皇負責。一八六四年訂立的『審計法規』，一八六七年訂立的『東印度財政預算』才算在國會通過。一八七〇年通過『農業法』，最後否認強迫墾殖制，至一八九〇年才全部廢止強迫墾殖。但咖啡種植的強迫制，到一九一五年才真正的廢止。

由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明白：一八〇〇年以後資產階級勢力的興起，反對少數貴族獨佔殖民地利益，至一八四八年得到立法上的勝利，一八七〇年後才得到真正的『自由主義』政策的指導，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發展。

一八七五年至一九〇〇年，可稱之爲『自由主義時代』，荷蘭統治者一方面鼓勵私人開發，一方面又對土人採取較前溫和的政策。一八八二年起，貨幣納稅的實行，可以猜想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真正發展才開始。在這二十多年中，每年平均有六百五十萬盾用於建築鐵路。教育經費及灌溉設施也逐年增加。一九〇〇年後，且決定提高土人中的『基督徒』的地位。

可是，土人的物質生活，仍舊在向下衰落，一九〇二年荷政府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對爪哇馬拉都的國民經濟作十二年的調查研究與報告。雖然並未公開說明土人經濟生活之衰落，但一九〇五年荷政府直接津貼東印度四兆盾，分十五年撥付，用於改進爪哇及馬都拉的經濟設施；即表示土人物質生活並無向上發展的徵兆或可能。

一九〇〇年後，荷人放棄以往的『不深入政策』，積極地擴充政治經濟勢力至爪哇以外的名島。一九一二年起，東印度政府在司法及財政方面完全與荷蘭分開。土人之間的階級分化，也從二十世紀初開始。

一九一三年以後，荷蘭在東印度的經濟利益遇到新的競爭；東印度出口貨之中，一九一三年荷蘭人佔百分之二八·一，至一九二九年減爲百分之一四·七七；進口貨之中，一九一三年荷蘭人佔百分之三三·二，至一九二九年減爲百分之一八·三一，一九三年更減爲百分之一五·三。荷蘭貨對於

萬六千萬盾的數字跟着商業範圍的縮小而減少了。因此，荷蘭資產階級羣起主張恢復已往的關稅特權，締荷蘭與荷印的關稅聯盟。一九二二年，荷蘭憲法又修改了，說明：『荷蘭帝國包括荷蘭、荷印、蘇立南、哥拉可四部份組織而成。』

但是，荷蘭本國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東印度荷蘭農業資本家的利益是衝突的。恢復荷蘭的關稅特權，等於限制東印度與別國的進出口貿易，而東印度最重要的出口貨——糖及橡膠，荷蘭消費極少，恢復荷蘭的關稅特權，等於致東印度農業於死命；並且，荷蘭與東印度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絕不平衡，例如一九二八年荷蘭輸出東印度貨物達六千萬盾，而輸入東印度貨僅一千三百萬盾。

因此，關於東印度的關稅問題，就引起無休止的爭論，一方面是荷蘭工商資產階級的反對東印度門戶開放的自主關稅政策，另一方面是荷印國民會議中東印度農業資本家所主張的『國際合作』政策，相持不下，無法解決。

荷蘭工商業與東印度的關係，遠不及投資者與東印度的關係之密切而重要。換言之，資本一經投入荷印，它的地位變更了，利益與宗主國即不同，離心力就日漸增漲。今天，荷印資產階級已自成一個體系，與荷蘭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斷絕了血緣聯繫，如美國之於英國那樣。荷印政府實際上已經是荷蘭政府統治權力之外的政府，但是，前者不敢也不必要公然與荷蘭決裂，此點，則和當初的英美關係不同。

荷印政府佔有東印度錫礦之最大部份，而荷印的產錫量約佔全球的五分之一。在海空航業方面，顯然無法與英美法各國競爭。自一八七〇年土地法公佈之後，政府即佔有『凡非私人所有土地』之外的一切土地——包括森林礦山海港河道等；從此，土人就被拒於廣大土地之外，舊的公有土地為荷蘭人所掠奪，於是，荷蘭人的大農場就有了一大批廉價的勞動者，資本主義農業就這樣的在東印度建立起來，並且直至目前為止，東印度的出口貨差不多全部是原料，入口貨也大都是製成品。

東印度是一個可能成為工業國的國家，但是，荷蘭資本却強迫東印度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化的農業國，說得好聽一些，變成一個『工業化的農業國』。這無論如何是違反了經濟正常發展的自然要求的！尤其是「一九〇〇年以後，國際帝國主義競向東印度伸展其勢力，更使東印度經濟屈居於供給世界工業的原料產地，一方面又不得不消費高價進口的製成品。」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之後，東印度事實上成『國際殖民地』的局面。區時候，荷印統治者即敏感地發生極大的恐懼，預料未來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經濟目標之一即為東印度，事後的二次大戰經過，證明了這一預感的正確。世界經濟發展至今日，生產力雖則停滯不前，而生產技術却仍在不斷進步，這一矛盾情形的根源，是各帝國主義於經濟侵略競爭之中的破壞行為——包括傾銷，關稅壁壘，投資競爭，劃分勢力範圍，擴大不合理的特權，最後則以大規模的戰爭來解決殖民地問題。一次大戰時，東印度問題僅列於最不重要的地位，二次大戰之中，東印度即成爲國際帝國主義必爭的資源地帶。現在，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終止了，但一切舊的經濟問題却以更嚴重的姿態提出於全世界經濟學家的面前；如果一切殖民地都不能在經濟上政治上取得完全的獨立與自主，則帝國主義的勢力仍舊將支配全世界，大規模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殘酷戰爭，將三次四次五六次地不斷演出，這是人類的浩劫，尤其在原子弹發明了之後的近代，世界大戰已足夠毀滅全世界的人類與數千年以來人類文明的成果。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殖民地運動與十八九世紀的情形有顯著的不同點；以往，如美國獨立革命運動，由有產階級領導完成獨立自主的戰爭，並從此建立一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東印度的有產階級是妥協性很濃厚的集團，他們的利益雖與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不相調和，但與東印度國內的工業利益更不調和；所以，在二次大戰後的東印度獨立戰爭中，以索卡諾為首的東印度資產階級是妥協的，反對『過激份子』的，其目的僅在改善本身在國際帝國主義治下的地位及爭取較前略多的權益；另一方面，『極端派』經過數年來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在工農羣衆擁護之下，今日尙對英荷日各帝國主義的進攻作殊死戰，絕不妥協。這表面上是政治主張的不同，實際上是經濟利益的不同。

索卡諾的提倡並擁護甘地的『不抵抗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實有其歷史的階級的根源在內。印度尼西亞的命運，與印度的命運一樣，決定的力量已操在工業羣衆的手裏了，買辦階級以及買辦性的『民族資本家』已毅然決然地站在舊秩序的立場上了。帝國主義已用聯合軍事行動來對付羣衆的獨立戰爭，如果單靠一國羣衆的抵抗已無勝利的把握，帝國主義的聯合行動，必然引起殖民地羣衆的聯合反抗。那末，印度尼西亞的命運，就是東方殖民主張恢復已往的關稅特權，締荷蘭與荷印的關稅聯盟。一九二二年，荷蘭憲法又修改了，說明：『荷蘭帝國包括荷蘭、荷印、蘇立南、哥拉可四部份組織而成。』

但是，荷蘭本國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東印度荷蘭農業資本家的利益是衝突的。恢復荷蘭的關稅特權，等於限制東印度與別國的進出口貿易，而東印度最重要的出口貨——糖及橡膠，荷蘭消費極少，恢復荷蘭的關稅特權，等於致東印度農業於死命；並且，荷蘭與東印度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絕不平衡，例如一九二八年荷蘭輸出東印度貨物達六千萬盾，而輸入東印度貨僅一千三百萬盾。

因此，關於東印度的關稅問題，就引起無休止的爭論，一方面是荷蘭工商資產階級的反對東印度門戶開放的自主關稅政策，另一方面是荷印國民會議中東印度農業資本家所主張的『國際合作』政策，相持不下，無法解決。

荷蘭工商業與東印度的關係，遠不及投資者與東印度的關係之密切而重要。換言之，資本一經投入荷印，它的地位變更了，利益與宗主國即不同，離心力就日漸增漲。今天，荷印資產階級已自成一個體系，與荷蘭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斷絕了血緣聯繫，如美國之於英國那樣。荷印政府實際上已經是荷蘭政府統治權力之外的政府，但是，前者不敢也不必要公然與荷蘭決裂，此點，則和當初的英美關係不同。

荷印政府佔有東印度錫礦之最大部份，而荷印的產錫量約佔全球的五分之一。在海空航業方面，顯然無法與英美法各國競爭。自一八七〇年土地法公佈之後，政府即佔有『凡非私人所有土地』之外的一切土地——包括森林礦山海港河道等；從此，土人就被拒於廣大土地之外，舊的公有土地為荷蘭人所掠奪，於是，荷蘭人的大農場就有了一大批廉價的勞動者，資本主義農業就這樣的在東印度建立起來，並且直至目前為止，東印度的出口貨差不多全部是原料，入口貨也大都是製成品。

東印度是一個可能成為工業國的國家，但是，荷蘭資本却強迫東印度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化的農業國，說得好聽一些，變成一個『工業化的農業國』。這無論如何是違反了經濟正常發展的自然要求的！尤其是「一九〇〇年以後，國際帝國主義競向東印度伸展其勢力，更使東印度經濟屈居於供給世界工業的原料產地，一方面又不得不消費高價進口的製成品。」

#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禮遜著·康君譯

譯者按：本文載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之密勒士評論報。牠批評和暴露出聯合國憲章對殖民地人民的虛偽面目，使我們又一次地認識了這個新的國際聯合，究竟是什麼東西？但作者所提供的『修正案』，只是以較精細的幻想，來代替這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幻想而已。

當大多數觀察家贊揚聯合國機構的時候，他們都是從這組織解決『原子問題』的能力這個觀點來判斷其未來的。但是，在和平的年頭中，那仍受殖民地剝削的鎖鍊束縛着的半數人類底命運，不是對人類有同等的關切嗎？假如聯合國憲章的主要宗旨，是將最大量的幸福給予最大量的人民，那末，半數人類的命運，確乎是無上重要的。

因此，必須要分析憲章中有關殖民地問題的條文，且在分析之後，把牠們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唯有歷史的聲音，在最後分析中才是決定的。

憲章第十二章題爲『國際託管制度』，其中含有如下的幾條：

- 第七十七條：一、託管理制度適用於依託管協定所置於該制度下之下列各種類之領土：
- (子) 現在委任統治下之領土；
- (丑) 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
- (寅) 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
- 二、關於上列種類中之何種領土將置於託管理制度之下，及其條件，爲此後協定所當規定之事項。

把這條文重讀一遍，然後回想舊國聯的委任制度。我們對殖民地人民及其願望之同情，究竟有無進展了呢？這世界，事實上已循着道義之路前進，還是歷史在重演其自己，祇以一種對曖昧辭句及保留之不同的選擇，加一層糖衣於殖民地奴隸的苦樂上面呢？法律，按其實質來說，是由制裁權力來決定其有效性的。但憲章中第七十七條有這樣的辭句，如『可能置於本制度之下』，『自願置於本制度之下』，『爲此後協定之事』，則又從那裏得來

種制裁的權力呢？結果，全部條文都要推翻而只賸下這一點：各國對其統治下的一切領土，都仍保有生死的權力——那末，對這種唱高調的辭句之真實意義何在，你就可以明白了。而當託管理制度條文付諸實施的時候，牠們將以幻象來代替啟發。因爲憲章所需要的，而且一開始就需要的，乃是少些『可能』，多些『必定』。每次在憲章中見有『可能』一語時，就要給反對和平的罪人以逃走之路了。在這全部的憲章中，再沒有別的一章比牠那樣浪費地點綴着『可能』的了。

進而檢討憲章中最重要な第十二章時，則第七十五至八十條中列有託管理制度的其他幾點。第七十五條宣稱，託管理制度可適用於這樣的領土，即『根據此後之個別協定而置於本制度之下者。』第七十六條則定下託管理制度之基本目標，這些目標是列明增進國際和平與安全，增進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與教育的進步，以及他們朝向自治政府或獨立之發展，鼓勵人權之尊重，並保證一切人民之平等待遇的。第七十八條稱，此制度不適用於聯合國會員國的領土。第七十九條稱，託管條件之變更或修正，當由直接有關國家與委任統治之協議決定之。第八十條稱，在託管協議成立以前，該章無法『可以任何方式製訂或自行改變任何國家或人民之權利，或國際機關之現行條例。』我們細看每一條文，大率都是如此。即使用不同的術語，和表露不同的辭句，但實際上其內容則一，即：一個統治的國家，仍舊是一個不受任何法定義務所牽制的統治國家，而被統治的人民，仍舊是沒有法定權利保護的人。

關於諸民族在託管制治理下所產生的固定不移的權利，我們在憲章中找不到任何的暗示。在執行託管制的國家施行權力的時候，我們看不出對牠有

什麼限制。但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們，却堅稱他們已跨進了一大步。且讓我們在後來事件底光輝中，觀察這個問題吧。

大不列顛——天宇第一號的殖民帝國，表示願意將現存的委任統治地轉變為託管地，但將巴勒斯坦除外——牠在英美調查出結果以前，是會保持現狀的。但像馬來，緬甸，非洲殖民地，太平洋屬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合併的其他領土，都沒有提起。口頭上服務於聯合國的南非，答應將以前的德國殖民地轉而為託管地了。但跟着又來一個報告，聯邦正考慮直接合併西南非洲。

法國提出對案，聲明她正考慮讓與多哥倫和喀麥隆以『自治領的地位』。對於她那殖民帝國的較進步的部分，如印度支那或法屬非洲各地，却沒有說及。解釋是：多哥倫和喀麥隆都是法國現在所僅有的委任統治地，因而牠們需要『自治領的地位』。印度支那却只是一個殖民地，所以法國不提出牠的行政問題。

荷蘭也不提起她的龐大的殖民地（這並非由於畏懼印度尼西亞在名譽上對她有所損失）。

如此，憲章中全部第十二章，乃是一種正義的假裝。各國同意轉為託管地的，只是十年前強搶自別一列強手中的那些領土。但對於這以前被征服了的領土，殖民強國們覺得並無責任可負。並不是僅有一些非殖民地的列強，才注意到事實與法律虛構之間的差異，紐西蘭那位直言不諱的彼得·佛雷沙說：『委任統治地並不屬於委任的列強』。

但是，佛雷沙本可以更進一步說，沒有殖民地領土是屬於所有者的列強的。主權根本屬於當地的住民，所有強詞奪理的國際法觀念，也不會證明相反的。

當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們，考慮美國所提修正託管決議的草案，要求一切殖民地列強將託管制度的利益廣施於一切非自治的民族時，真正的試驗便到來了。像中國，紐西蘭及別的國家，都會支持美國的動議，這是可信地預言的。可是，法國、荷蘭、大英帝國以及因裝甲的託管制度之建立而只有所失但無可得的其他國家，却又採取什麼立場呢？

然而，假使美國的建議順利通過，這裏依然留下保證殖民地人民得到保護的問題。為什麼沒有成立國民會議的倡議呢？人們也許爭辯說：很多人民還沒有達到能够研討政府問題的階段。不過，每一地方，無論如何落後的，

都有些個別份子受過現代較高的教育，可以辦別出枉法貪污和辦事正直，假公濟私和開明統治。而且，『保護政府』的觀念，也可以在已成立之託管現中運用起來。在戰爭中，每一個交戰國都有一『保護政府』以保護敵對國家中的本國人的利益。現在為什麼不可能讓每一託管的人民，去選舉一種『保護政府』，這個政府雖不能過問領土的行政，却能够以當地居民的看護人和保護者的資格工作呢？這個制度在戰爭中既貢獻過這樣多的便利，為什麼在和平時不能貢獻同等的利益呢？

因此，假如歷史對聯合國憲章衡量得很低，並『發現牠不夠』，那末，下列幾點必須馬上而且無保留地付諸實施：

- (一) 一切自治屬領，毫無例外地，必須置於託管制度之下。
- (二) 託管地原住民的代表會議，必須召集，以代表當地人民。
- (三) 當地住民必須選舉出『保護政府』，此政府定將保護當地住民的利益和要求。

#### (四) 屬領之歲入，至少有四分之一必須用以增進及擴大教育上之福利。

祇有當這幾條修正案見諸實行的時候，聯合國的代表們才能夠說他們自信：不僅他們自身的安全與繁榮獲得保護和增進，而且，那仍受殖民地剝削及人類墮落的鎖鍊束縛着的其他半數人類之安全與繁榮，也得到保護和增進了。假如和平是不可分的，則人類的自由也是如此。

### 一封表示憤懣不平的歷史信件

# 古史辨的解毒劑

李季

## 一 開場白

美人原淺薄，詹（姆士）杜（威）何足論，胡公揚餘緒，一擊刺遊魂。社戰猶未了，批評豈贅言？史辨多夢囉，待余掃其根。

這是我去年作的季子史詩十五首之一，當時已經草成了一部十萬字的古史和井田問題，內中有不少批評古史辨派的文字，故詩中提及這一派。現在求真創刊號徵集稿件，要求我做一篇學術論文，我欣然承諾，於百忙之中，將原稿撮出一部分，並加入一點新材料，使之自成一文。學術論文的題材本來很多，我為什麼首先選擇這個題目？這不僅為的要履行詩中的預約，還有一種重大的理由，應首先聲明一下。

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學術界發生過幾次大論戰，即井田問題，科學與玄學，古史辨，革命文學與非革命文學，及社會史論戰等等。這些論戰中的問題，有的已經相當解決了，有的早被擱置了，只有古史辨仍繼續進行，歷時最久，產量最多。就已印成的十大本書看，是起於民國九年十一月，終於三十年二月，綿延二十一年，字數達三百二十餘萬。雖中日戰爭砲火喧天，連帶擊毀了我國許多文化事業，却沒有打斷他們論戰的興趣。其頑強的態度，堅忍的精神，實足驚人！在我國學術論戰史上，像這樣的持久與多產，雖未必絕後，的確可算是空前！尤其在精神食糧最感貧乏，飢不擇食的今日，在抗日勝利結束，莘莘學子正擬勇猛上進的今日，這十大本書將發生怎樣巨大的影響，是可以預先想像得到的。但不幸其中所含的毒素非常之多，在最初幾年，雖有不少人加以嚴厲的批評，然大都枝枝節節，不得要領，並且理由與證據也不充分。最近十多年來，簡直連這樣貧弱的批評也難得看見。因此，養成了他們的驕傲自滿，大言欺人。不是幻想他們的權威怎樣大，「甚至有人著中國通史，不敢提到古史隻字。這樣看來，『疑古』的成績確已相當可觀了」。『古史辨有名的貢獻是「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一般人已承認牠的價值了。』（古史辨七冊上編「自序二二」和五頁）就是說『最近的疑古

大師，誰都知道是顧頡剛先生。……到了今天，著述愈積愈富，發明愈來愈多，同志愈聚愈衆，聲名也已從毀譽參半到了譽多毀少的地步』。『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我以為當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著者楊寬先生。』（同書同編「自序二」一和二頁）他們自己中了毒，呈出一種變態心理，信口開河，固屬可惜；但更企圖將這種毒汁輸入青年學子的純潔腦袋中，尤為可畏！我本不是一個專門研究古史的人，又長為生活所困，無暇及此，故對於他們久已置於不議不論之列。現在中國開闢了一個新生的機會，我如果不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毅然出來做一番清毒的工作，實在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古史辨派的師友，更對不起我國無數的青年學子和學術界。我這篇論文的用意：一方面是在促他們的虛心反省；另一方面是要防止青年學子的繼續中毒。因此，我不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專從根本上診斷他們的病源，使他們和學術界得聽到一種澈底的新批評。

## 二 古史辨派的方法

既名為古史辨，自然有兩派人在戰場上對敵廝殺，這裏所指的當然是為主的一派，即胡適、顧頡剛先生一派。不過凡所用的方法和他們完全相同的方法，反對派，也一併包括在內，這是要預先聲明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這句話是學匠治學的不二法門。一個人治學的精粗深淺雖和自身的聰明才力等有很大的關係，但所用的方法是否適當，更具有決切的重要性。所以我們要考察一個人的學說，必先注意他的方法。

胡顧諸先生的治學方法是什麼？是形式邏輯和實驗主義。他們應用此等方法整理中國古史，而以辨偽為先務。顧先生說：

『我日來在家裏做辨偽叢刊的事情。……這辨偽叢刊分做兩類：一是辨偽書。……辨偽事的固是直接整理歷史，辨偽書的也是間接整理。因為爲

這是形式邏輯與實驗主義信徒的說法，自我們辯證法論者看來，是完全不對的。因為他們認『偽書上的事實全是全偽，只要把書的偽跡考定，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我們却認偽書上的事實不一定全偽，雖把書的偽跡考定，未必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換句話來說，我們認偽書中有真材料，而真書中也有偽材料，應當細心去加以分析，加以選擇，絕不能糊塗籠統地說『真百真，一偽百偽』。

『拿證據來，愈多愈好，但偽書中的證據絕對無效。』顧先生等是要這樣反詰的。

證據麼？有的是，不獨不是『偽書』中的，也不是真書中的，而是——天上的，而是——地下的，經得起你們的『實驗』。並且第一部書就是你們最排斥的堯典，第一個證據是梁啟超曾經說過的：

『如尙書堯典所記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據日本天文學者所研究，西紀前二千四五百年前時，確是如此。因此可證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爲堯舜時代之真書。』（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五九頁）

這裏未明白指出日本天文學者的姓名，不知是否即新城新藏？他在日本藝文第五六七號會發表支那上代之歷法，推算紀元前二千三百年堯典的星座，雖有人對之持異議（參看科學十三卷一期飯島忠夫書經詩經之天文歷法），然觀於『埃及人知用日曆，蓋在紀元前四二四一年』（摩賴：尼羅河與埃及之文明，中譯本五七頁）的事實，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堯時知用歷法是可能的。新城氏『十數年來專心研究』『支那古代之文獻』，本認『支那之天文學在古代發達甚著』之說，『係全反於事實』，然却引用堯典作立論的根據：

『大火爲夏日傍晚見於西方之赤色三星。西洋稱之爲Corvus座之辰星。

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自古以此星傍晚南中之時，爲夏之正中，即五月之目標。』（中國學術討論第二集，新城東洋天文學史大綱六頁）

堯典所記，既無悖於現代天文學上的證驗，可見此書雖爲後人所改編，當時實遺下一種真材實料了。即退一步，認此爲不足據，那我們也可以再提出一個地下的證據來。董作賓先生講到卜辭夢父（疑即傳說）三處之一，

『上列辭一，有「王固曰愈」之語，如尙書堯典帝曰愈，往欽哉，「愈乃命令臣下的發語辭，史記作然，此愈下即接稱夢父，當是命夢父之語。』（朱芳圃編

（內中多是他們所謂偽書），在夏書商書周書中未會見過，以後的書更不用說。堯典中有『愈』，卜辭中也有『愈』，又可證堯典至少有一部分是堯舜時代遺留下來的真實材料。顧先生說堯典『「金作贖刑」由呂刑來』（古史辨一冊二〇五頁）證據就是『偽書』兩字的虎頭牌，不再負找證的責任。並而卜辭埋在地下，編尙書的人無由得見，否則『帝曰「愈」由卜辭來』的話，一定和上面一句話並列在古史辨中，作爲宣佈堯典死刑的另一罪狀了！其次就拿莊子來講。太史公說莊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是莊子在史料上的價值應等於零。其實不然，內中談到古帝王，和其牠書對照，大都不無根據。即拿書中一個最細微之點來看，也無不如此。董先生提及殷虛出土的大龜說：

『莊子外物篇「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此所謂七十二鑽，乃舉大龜之最多數而言，非妄語也。所謂無遺策者，策卽冊，指龜版而言，遺，留餘也。言七十二鑽，使龜冊無留餘之地，則鑽之最多者也。今依上述最多之數（六十二）而更推算之，則前後左右，可各加二鑽，則適合於七十二之數。』（甲骨學商史編下冊商九第一七頁）

這個外物篇屬於莊子中的雜篇，向來公認爲莊子之徒所作，也就是顧先生所謂『這（指外篇和雜篇）似乎是道家已成立，要和儒家分庭抗禮時的出品。』（古史辨一冊二八五頁）這樣看來，是後於莊周本人的作品。不過顧先生同時又認莊子完全爲『偽書』。他說：『我的意思，以爲莊子是戰國

之，遂殺其君驥臣也。」今本紀年帝泄十二帝，一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殺其君驥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辭見之。其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于周秦之間，非絕無根據也。」（甲骨學商史編上册商二第三至四頁）

山海經是顧先生自目爲偽書的（詳情見後），其中紀載，除神怪外，有不少可靠的材料，尤其在地理方面是如此。今竟與卜辭有相合之處，這又是偽書中有真材料的一鐵證。

末了，我們拿周禮來看。這部書是適之先生論井田問題時出死力排斥的，不妨先聽一聽他的說法：

『周禮是偽書，固不可信。』（胡適文存六〇六頁）

『漢代是一個造偽書的時代，是一個詁古改制的時代。西漢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禮來。周禮一書，我起初只承認牠是戰國末年的一部大烏託邦。現在我仔細看來，這書一定是孟子王制以後的書，一定是用孟子王制作底本來擴大的。……周禮裏的井田制說得很詳細，很繁複，很整齊，確是中國統一以後的人的大胆懸想。』（同書六一二頁）

『……可見當時〔指西漢〕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為豪富的反對很大，故不得不用託古改制的方法，用「大帽子」來壓服反對的人。這便是周禮等書的動機。……楊雄劉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盡心思，先去埋下一個改革的根據。劉歆造偽書的原因，大概是如此。』（同書六一三頁）

適之先生的話真娓娓動聽，他以最堅決的口吻，斷定周禮是『偽書』，因而斷定其中的井田制是劉歆一班人捏造出來的。同時，郭沫若先生告訴我們說：

『……舊本啟曰：「王令<sup>五</sup>飼公族」，師克啟曰：「令女<sup>九</sup>飼<sup>一</sup>飼走馬」，諫啟曰：「先王既令女<sup>九</sup>飼<sup>一</sup>飼王者」，均與飼字連文，而从北从井，北井者古者九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也。……』

『此字于宋人書中亦屢見，如微子鼎之「王令徵絲<sup>九</sup>飼」，飼九祝「鄭啟之「王曰鄭啟先王既命女作邑，<sup>九</sup>飼五邑祝」，師克啟之「令令女死我家<sup>九</sup>飼」，飼我西偏東偏」，又齊侯鑄「余命女厥差左卿爲大史<sup>九</sup>飼」，命于外內之事」宋人均釋爲「繼」，子字無說，義亦難通。然釋爲「繼」，則可行無礙。』（甲骨文字研究上冊釋籍二頁）

以向來否認井田制的郭先生（聽說近已承認有井田制度）竟不得不徵引周禮地官小司徒的『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按原文徵引有誤）去解釋金文中的字藉，不知適之先生見了，作何感想？他也許以為這不過偶合，這是孤證，未必絕對可靠。好，就算如此，我們再提出一個證據罷！散氏盤銘中有如下的兩句話：

『……以西至于淮莫竟井邑田，自柳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

這是指田界講的，竟兩次提到井邑。井邑是什麼？還不是『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嗎？何況第一句的井邑下面緊接着一個『田』字，還能說這不是指田講嗎？上面的丘井既繫之以『未』，而這裏的井邑復繼之以『田』，則其爲周禮中所指的井田，寧復有絲毫疑義？

現在要問適之先生，周禮即使不是劉歆偽造的，難道周金也因『楊雄劉歆王莽等都是要想做一番大改革的人，不能不用盡心思先去埋下一個改革的根據』嗎？周金的文字中既找得出井田的遺跡，可見井田制度不是孟子發明的，而西漢末年跑出來的周禮仍含有一部分真的材料。

以上四例說明偽書中有真材料，不可籠統抹煞，總算是够顯明的了。關於這一點，連力排『偽書』的崔述也是承認而且利用的。他在唐虞考信錄辨體國經野中利用偽孔傳的『海畔山』去證明蔡傳『淪入于海』之失，就是一例。但我們的辨偽的先生們完全不懂得這一點，一見人家用了偽書，便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氣餒逼人，不可嚮避！試一讀顧先生下面一段話，當可領略幾分：

『例如章演羣先生（鴻臚）所著的石雅，不愧爲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裏邊對於偽書偽史不加別擇，實是一個大缺點。他據了拾遺記的『神農採峻鍛之銅以爲器』，史記的『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說中國在神農黃帝時已入銅器時代；又據了禹貢的『厥貢璆錠銀鏹』，山海經的『禹曰出銅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說三代之初，已知用銅。這種見解很能妨礙真確的更實的領受。若能知道神農黃帝不過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貢和山海經都是戰國時的著作，那麼，在質證上就可以剔出許多僞妄的證據，不使它迷亂了真確的史實的地位。』（古史辨一冊自序五八頁）

其實章先生是用王國維所謂『二重證』——即『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安特森在甘肅所掘發的銅器和殷墟出土的銅器等等）——立論的，處處經得起證驗，顧先生在這裏板起面孔說話，去指摘他的謬誤，到底有

什麼證據？除掉『偽書偽史』那塊虎頭牌外，的確一點也沒有。試問這種糊塗籠統的辨偽方法怎樣能够辨得出真偽？怎樣能够靠近真理之門？！

最好笑的是：顧先生一方面說章先生不該用偽書偽史去迷亂真確史實的地位，另一方面却用自己所宣佈的偽書山海經和臯陶謨（古史辨一冊二〇二頁）去證明禹是神不是人（同書同冊一二二頁）。顧先生既已明明告訴我們『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試問他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論斷不是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嗎？『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顧先生等另一種最荒謬的主張是一部書在某一時代寫定，便只能代表某一時代的制度，或對古代的懸想等等。例如他認山海經是戰國時代的著作，即不能用以證明『三代之初已知用鐵』；適之先生認周禮是偽書，即不能用以證明周代的井田制度。不過這種限制只施於他們的論敵，而他們自己却可隨便應用，不受拘束。我們在上面所說顧先生利用山海經臯陶謨證明禹為神，固是一例，而楊寬先生更愈出愈奇：竟說『大約在神話裏，舜的弟弟就是一頭象，所以天問上會說出「舜服厥弟」的話來，「服厥弟」就是「服象」啊！』（古史辨七冊上編序四頁）他又用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傳，後漢書袁紹傳和三國志樂陵王茂傳去證明孟子『封之有庳』就是封之有鼻，『象的特徵是鼻，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有鼻」』，（楊序三頁）這還不是一頭象嗎？總說一句，他們二十年來愈加辯論古史，便愈加陷入絕境，用他們的方法去担负這種工作，是完全沒有前途，是完全破產了！

### 三 古史辨派的研究範圍及其科學素養

凡研究學術，範圍愈狹，愈能深入，這是當然的道理。古史辨派的研究是以古史為對象，照舊式的說法，雖涉及經史子集四類，但無非以尋找史料為主，故歸根到底，仍只是古史。範圍既狹，材料也極有限，耗去二十幾年的歲月，自然應該有精深的著作出現，救濟梁啟超所謂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歷史飢餓』。（中國歷史研究法六二頁）誰能料到他們不獨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不獨沒有光明，反而黑暗了！大家試再看楊寬先生近年來所研究的結果，就可以知道。

『吾人歸納言之，則古史中之聖帝賢臣，其原形如下：

（1）本爲上帝者：帝俊，帝嚳，帝舜，大皞，顓頊，帝堯，黃帝，泰帝。

（2）本爲社神者：禹，句龍，契，少皞，后稷。

（3）本爲稷神者：后稷。

（4）本爲河伯水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兒，閼伯。

（5）本爲火神者：玄冥（冥），馮夷，鯀，共工，竇沈，臺骀。

（6）本爲嶽神者：四岳（太嶽），伯夷，許由，皇陶。

（7）本爲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啓，太康。

（8）本爲鳥獸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龍，朱，虎，熊，鼴。』（古史辨七冊上編三九九頁）

這是楊先生『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同編楊序二頁）所做的十六萬字大文的總括。大家看了本爲某神之後的一批名字，也許有些莫明其妙，至少不會知道他們彼此間有什麼關係，讓我請出他的一位同志童書業先生來加以解釋吧。

……我在這裏想特別替楊先生的神話分化說介紹一下：

『所謂神話分化說者，就是主張古史中的人物和故事，會得在大眾的傳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無數。例如一個上帝會得分化成貢帝，顓頊，帝嚳，堯，舜等好幾個人；一個水神會得分化成鯀，共工，玄冥，馮夷等好幾個人；一個火神也會得分化成丹朱，驩兒，朱明，祝融等好幾個人；一件上帝『遏絕苗民』的故事會得分化成黃帝伐蚩尤，和堯舜禹竄征三苗的好幾件故事；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會得分化成女媧，顓頊，鯀，禹等治水害的好幾件故事。這種神話傳說分化的例子，實在多到不可勝舉，不過從前人不會看出來，一經楊先生的揭發，便無不令人驚佩了！』（同書同編童序三頁）

但我們看了之後，不是『驚佩』，而是驚駭！為什麼？楊先生如果是一個鼓吹神道設教的宗教家，自然有權利在真書以至偽書中翻筋斗，矯揉造作地做成這些烏烟瘴氣的東西，盡量向史學界傳播，弄得天昏地黑，永遠沒有了一線光明。不過我看他沒有做宗教家的野心。顧先生要『做一個科學的史學者』（同書一冊三六頁），他當然也是如此，因為他告訴我們：『史學之研究，首貴乎史料之批判。吾人除搜集史料外，必須對史料分析綜合，辨其偽而求其真，然後史學之能事盡也。』（同書七冊上編四〇一頁）他說中國古史的舞台上只有上帝和一些什麼神在那裏變戲法，這是求真嗎？待我們來考慮一下。

無論中外，凡是古代史沒有不雜入多量神話的。例如法國有名史學家摩賴（A. Moret）說：『要之，自神話而言之，統治埃及者，先爲神，後爲

半神半人，最後爲人；史料可稽，羣無異詞。（尼羅河與埃及文明中譯本三四頁）我們中國的古代史自然也不能例外。什麼『天皇氏十二頭』，庖犧氏和女媧氏『蛇身人首』（史記三皇本紀），『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同書厭書）不都是一些顯然可見的遺跡？可是一個科學的史學者的責任不在助長這些神話，而在解釋這些神話的起源。關於這樣的解釋，有種種派別，德國著名的博言學家米勒（Max Müller）稱之爲倫理學派，物理學派和歷史學派。神話的起源，本甚複雜，這三派並不能完全解釋世界一切神話，不過專就楊先生所說的上帝和神講，是可以用歷史學派的方法來解釋的：即一切神原來都是酋長，帝王，大戰士，聖賢，或造福人類的人，他們在生前既已出類拔萃，所以死後便逐漸被視爲神明了（柳下惠對臧文仲所說的一段話，正合此例，詳見後）。即使不然，也應當像摩賴關於古代埃及所說的一樣：『其政權操諸各該諾姆（Nome 區域）之神祇手中，實行此政權者則爲神人之代表，國王或諾姆長官是也。……埃及政教不分，其來固已久矣。』（尼羅河與埃及之文明中譯本二六頁）這才是治古史的現代史學家應有的態度。不意楊先生竟走了一條恰恰相反的路，那能不令人驚駭？！

他爲什麼走一條恰恰相反的路呢？因爲他引經據典（這經不是五經，六經，或十三經，而是山海經之類）地證明堯舜禹鯀等等爲神，於是作出結論道：

『堯舜禹鯀之事初爲神話，不爲人話可知矣。墨子楚辭天問山海經等所載，乃傳說之初相，儒家所陳，轉多潤色之辭，……由神話潤色而爲古史，其潤色之跡，吾人尙多可尋。』（古史辨七冊上編二一〇頁）

他這種說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就是說，他只知道『堯舜禹鯀之事初爲神話，不爲人話，』而不知道關於堯舜禹鯀的神話原是由人話轉變來的。他這十六萬字的大著只是一個『導論』，還有下文，我們猜不着是什麼，不過專就本文而論，他便不能說我們的批評是錯誤的。

就楊先生告訴我們的許多話看，在四千年以至三千年前，中國古史上只有兩類東西：一是神，二是獸。關於神的一類，我們已經領教了，現在再看第二類。

『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其前身不過是神話裏的鳥獸罷了。』（古史辨

『益就是玄鳥鳳鳥，是服侍上帝的，所以上帝（卽舜）要叫他來管理一下草木鳥獸，而益還謙讓，要讓給朱，虎，熊，熙去管理，（見魏晉）朱虎熊熙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在神話裏也是替上帝服役的。（同序五頁）

現代的考古學已經證明人類的生存遠在三四十萬年前，（民國十八年所發見的『北京人』，有的說距今一百萬年，有的說五，六，七，八十年。）即現代人的出現也在二萬五千年以前，我國在三四千年前沒有人的傳說或歷史，只有神和獸的傳說，試問人到那裏去了？他總不能否認當時人的存在吧！既有人，他們的歷史舞台何以被神和獸壟斷，自己毫無表現？這非請楊先生答覆不可。

得了，我們何必希望他呢！我們應當告訴他們一派人，要研究古史，須先有一般科學的素養，尤其須懂得地質學，古生物學，考古學，博言學，和民俗學等等。可惜他們對於這些科學，不獨未曾深入，連淺嘗都沒有，因此把圖騰的遺跡如朱虎熊熙等，看做真正的獸，於神道設教之外，再來一套獸道設教，總之，他們的工作不但是大都白費氣力，並且笑話百出。試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來講。

郭沫若先生在十幾年前將日本學者對於商代社會性質錯誤的估計介紹過來，說：『在商代的末年都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八頁）自此以後，大家幾乎一致盲從附和。他本人一直到二十九年，仍固執此見，沒有絲毫變動，所以他要矯正之先生的錯誤，說：『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時代，却是可以斷言的』。（古史辨七冊下編三六二頁）因爲適之先生是把商民族列入石器時代，並加以附註道：『發見澆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同書一冊九九頁）顧先生於是宣佈這『可以做我們建設信史的骨幹』。（同書同頁）

這些都是絕對荒謬的主張。商不僅是什麼新石器時代，不僅不是什麼時代。關於這一點的證據相當地多，並且都有二重證。本文爲篇幅所限，無法贅列（詳見古史和井田問題）。這裏除掉一種爲人們容易了解的有力證據外，其餘只略提一下。

一、殷墟雖無鐵器出土，但經日本小松茂和山內淑人對商銅器二十六點

譯本四五至五〇頁)而商代的銅容器『由刻於器上之款識及其他方面推測，則其較哈爾斯大德和高加索鐵器時代初期之銅容器等，內容更為進步。中國人之所以解為禮樂器，亦暗示其在文化史上乃極高階段之所產』。(同書七頁)這可證明商青銅器為鐵器時代的銅器。

二、商代並不是什麼牧畜業時代，而是高度發展的農業時代，可以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四六至二四七頁，甲骨學商史編下冊商八第十至十一頁，同書同冊商七第三十頁所舉的證據看出來。

三、關於商代的國家組織，從卜辭中可以考見牠的政制，有史官，小臣，大右，錯臣等等(同書商七第五至六頁)。

四、我們現在要比較詳細說到牠的文字了。『殷商文字見於殷虛龜甲獸骨上的已有兩千字上下。』(同書上編商六第三四頁)關於二千字的數目沒有爭執，內中被確切認識的不過八百多字。卜辭既不是字典，而出土的龜甲又被毀滅甚多，則二千字非殷代全部字彙，僅為其中的一部，自無疑義。我們現在假定殷代文字還有三千，一共是三千，總不算說得過多。我們再看：

#### 一、秦代的三倉只有三千三百字；

#### 二、西漢楊雄的訓纂篇只有五千三百四十字；

三、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加入流俗異體，也不過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以上三種都是字書，對於當時的字雖未完全收入，已是應有盡有了。周代文字的興盛，春秋戰國學術的發達，是用不着我多說的。然經過周朝八百年長期的發展，不過加多三百字，人們可以想像商代的文化是怎樣的高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郭先生說：商代『文字尚未脫原始之畛域。(1)象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一字之寫法有至四十種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八九頁)但我將殷虛文字類編拿來計算一下，真正的象形文不過百分之十強，其餘盡是指事，會意和形聲等字。郭先生不懂六書，所以把後面幾項文字也列入象形文，以致蒙蔽了商代文字的真相。至於一字之寫法在四十種以上，不能作為文字未脫原始畛域的有力證據，因為遲至秦漢時代，年字至少有六十七種寫法(金文續編第八)，此外，如長，孫，子，侯等字都有四十至少三十種以上的寫法。(同書第九，十二，十四，和第五)難道我們也可以說秦漢文字未脫原始畛域麼？無論如何，我們確相信那樣高度發

展的甲骨文決不是商代六百四十八年間所能够達到的。

第三，英文現有十萬字，據美國學者計算，著作家所常用的字不過一千，而基本英語只有八百五十字。又據鐸爾基(Dorsey)說：『現在普通的人都常用的字也不過三百字』。(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中譯本二八頁)這是就外國講的。更就中國講，康熙字典有四萬一千多字，一說四萬四千字，海禁大開以後，又增加了不少的新字，故中華大字典共收四萬八千多字。據閔宗益先生估計：『中國常用字亦不過千字』。(東方雜誌三二卷十五號閔氏漢字變遷之大勢及今後應有之改良九八頁)又據同卷十四號洪深先生的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使用法一文看，只需如許字就可以辦報，可以作評論。在文化水準這樣高的中西人民中，所用的字竟比卜辭所用的少一倍，這又可以想像商代的文化是怎樣的高了！(商代的文化自然低於現代，牠的用字反多，是因當時文字的含義絕不及現代文字的豐富。)

美國著名的考古學者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告訴我們，發明銅器和牧畜果真有科學的素養，對於商代能作一種綜合的研究，何至二十年來還在繼續鬧這種商是新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笑話！他們口口聲聲抱怨鋤頭考古學不發達，不能供給他們以必需的材料，其實如上所舉的大批材料早已出現，不過他們不知道去利用罷了！

## 四 古史辨派的公式

末了，我們來考慮這一派的公式。顧先生說：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說

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漢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多，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賢，到堯舜就成了一個「寧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個聖人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情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

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古史辨一冊六〇頁）這個公式是顧先生「下了兩年的苦工然後發表……的」（同書一冊三三六頁）也是經過適之先生贊同並誇獎的，他說：

這個公式也經過長期的發展，最近又由楊先生的神獸論——分化演變說加以補充。所以董先生說：

『古史傳說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傳說怎樣會「累層」起來的呢？我以為這得用分化演變說去補充牠。因為古史傳說愈分化愈多，愈演變愈繁，這繁的多的那裏去安插呢？於是就「累層」起來了。……大約演化出現愈後的人物，他們的地位便愈高愈古，這便產生了「累層地造成」的現象。所以有了分化說，「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便越發顯著，分化說是累層說的因，累層說則是分化說的果。』（同書七冊上編自序六頁）

這是古史辨派經過千錘百鍊認為無復缺憾的萬應法寶，連郭先生也為這法寶的魔力所吸引，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版書後說：『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

可是這個受全國第一流學者熱烈讚頌的公式，自我們看來，絕對不成其爲公式，請申其說如下：

適之先生認顧先生在中國古史上係承崔述的系統而來，崔述幹了第一次革命，他幹了第二次革命。實則他是承康有爲的系統而來，與崔述相反。不過他們既提起崔述，我也正要引用他幾句話來做材料。崔氏說：

『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于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明矣。……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羲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嘗盛有所鋪張也。』（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因事及之』這四個字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為顧先生僅根據詩經，一口咬定『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是禹』，他既不願知道詩經非史書，又不懂得詩經中提到禹，只是『因事及之』。例如要講到『豐水東注』，才聯想到『維禹之績』是。

左傳昭十二年，楚子提及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皆古書名』。是否真有此等古書，議論紛紛，姑且不提。至於孔子所謂『志有之』

的志，孟子所謂『於傳有之』的傳，確爲古書，都亡了。又梁啓超講到尚書二十八篇注云：『據漢人所傳說，謂古代書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纂之爲百篇，遭秦而亡焉。漢興，由伏生傳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二卷，即所謂今文尚書也；其後孔安國所傳復多十六篇，即所謂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而復佚焉。』（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二頁）書本有三千多篇的話，由近古的漢儒傳出，雖未可全信，書亡佚的篇數必多，（無論孔子刪纂過與否）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再就孔子時代講，史通正史載孔子得百二十國書，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百國春秋，是春秋戰國史書之多，可以概見。史記秦始皇紀載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六國表載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是春秋戰國時代和以前的史書（尚書也是古史之一種）都被摧毀了，或早已亡佚了。

太史公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後人頗疑古詩未必有如此之多。然無論孔子刪詩與否，古詩沒有全部保留下來，也是絕對沒有疑問的。左傳中所引詩二百十九條，而逸詩佔十三條，就是一證。孔子門弟子所記的論語一類，也決不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全部語錄。如將詩經論語與上述的古史較，恐怕只佔其中百分之零點以下的數目。何況兩書本身也是殘缺不全的。如果有人利用此等殘缺不全的書做立論的根據，沒有不失敗的。試舉一例如下：

『阮氏謂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卽包仁字在內。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慣言而造爲仁字。』（說文解字詁林補遺八上仁）

所謂阮氏就是著經籍纂詁的大學者阮元，他根據上列各書斷定夏商以前無仁字，但甲骨文中却有仁字。可見這種推論方法是最靠不住的，是最幼稚可笑的。其實牠在三百多年前，早就被毛奇齡譏笑得不值一文。他說：

『人第見易書詩無騎字，祇曲禮有「前有車騎」一語，遂謂騎字是戰國以後之字，古人不騎馬。若然，則六經俱無麤聲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麤聲，此笑話矣！』（西河合集經問二卷）

不意古史辨派的先生們對於前人所排斥的推論方法，以及前人用此方法所造成的錯誤，一無所知，根據腹部殘存的，並非歷史的詩經論語，貿然斷定周初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有禹，孔子時只有堯舜等，因而成立一個公式！還有一層，論語上明明宣佈『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古代會長的傳說實

然與神話結合在一起，孔子不談堯舜以前的酋長，說不定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不幸顧先生把不語不知和沒有三椿截然不同的事混為一談，以為不語就是不知，不知就是沒有，所以他提到春秋時秦齊二國的器銘和宋魯二國的頌詩，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公式是完全建立在

毫不遲疑地說：

『他們都不言堯舜，堯舜不知道有堯舜似的。』（古史辨一冊二六七頁）

他在這裏雖用『堯舜……似的』等字眼，企圖減輕這種推論的不合理性，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公式是完全建立在  
不言||不知||沒有  
這個公式上面的。請以下例為證。他說：

『試看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沒有事蹟的古帝，門弟子問孝的這般多，孔子絕沒有說到舜身上，可見舜在那時還沒有孝的名望。』（同書同冊四二頁）

他對於這種主張是非常堅持的，所以後來又重提一次。（同書同冊六四頁）其實在論語中，門弟子問孝的不過四次，均見為政篇：

一・『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二・『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三・『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四・『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孔子在這四次問話中既未嘗舉過任何孝子作答，顧先生何以要從此去斷定他不知道舜孝，又何從知道舜還沒有孝的名望？這種論證如果可以成立，那孔子也同樣沒有說到他的弟子閔子騫身上，也就是不知道閔子騫孝，也就是閔子騫還沒有孝的名望。何以他後來又偶然提及『孝哉閔子騫！』（論語先進）

這樣看來，顧先生的不言||不知||沒有的公式，真是幼稚極了。不幸『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公式完全以此為基礎，否則何以東周初一部書不言堯舜，就是不知道堯舜，也就是根本沒有堯舜，孔子時一部書不言黃帝，神農，就是不知道黃帝神農，也就是根本沒有黃帝神農？……

如再舉一例，當更為明顯。王國維所謂和禹稷同樣有大功德於民的服牛的王亥，東周初沒有人說過，孔子時沒有人說過，孟子時又沒有人說過，那就是不知道堯舜，也就是根本沒有王亥。山海經突然說起王亥，依照顧先生的大理論，這是山海經憑空創造出來的，可以供他做『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頭碰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們的法寶碰碎了！

像這樣不言||不知||沒有為的公式並不是顧先生偶然的臆測，而是他們一派人常用的最重要的法寶，例如楊先生說：

『殷商與夏代密接，殷墟卜辭歷年發得數萬片，又絕未見夏代之踪跡。』（古史辨七冊上編一六頁）

他這裏又是以卜辭不言夏代，即不知夏代，因而證明沒有夏代。這種幼稚而荒謬的公式如果可以到處應用的話，我們更可以說：鑿井而飲，為古代人的普遍現象，殷墟卜辭歷年發得數萬片，絕未見井字之蹤跡，可證商代是沒有汲水井的！可以這樣說嗎？

我們再回到本問題上去，現在要問，除掉並非歷史的詩經和論語外，其牠較古的帶史料性質的書有沒有提及堯舜黃帝一類人？有的。展禽說：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故有虞氏禱黃帝而祖顓頊，郊縣而宗禹；商人禱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禱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魯語上）

展禽就是柳下惠，周莊王時人，即先於孔子百餘年的東周初人。他不獨提及禹，而且還提及神農（烈山氏），黃帝，顓頊，帝嚳和堯舜等。此外，如後於柳下惠五十年的司空季子也說及：『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同書晉語四）顧先生宣佈東周初只有禹，到戰國時才有黃帝神農等，碰着這些證據，不是又破產了嗎？！

然古史辨派的先生們看到這裏，也許要大笑起來，因為認這是偽事偽書，不足為據的。但我們不能承認這樣的說法。為什麼？柳下惠的話是對臧文仲而發，季子的話是對晉公子重耳而發，對方都是有智識的人，他們豈能捏造古人名字和史蹟，隨便瞎說？古史辨派也許認為這是編國語的人捏造的。國語相傳為左丘明所作，而左氏一說與孔子同時，一說為六國時人。無論如何，他或其他編者無須『託古改制』，『用大帽子來壓服反對的人』，根本沒有偽造古史的必要。何況國語在歷史上的價值總不比山海經低，楊先生的『神獸論』的大來源之一是山海經，試問他們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我應用一部較古的國語的材料作論據？

這樣看來，顧先生的公式的第一點是絕對不能成立的。現在再來考慮第二點。即所謂『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而以舜為例，以

論語爲唯一的材料來源。此書既非舜本紀，怎能將他的事蹟一起寫出來呢？可是即除掉他們所排斥的堯曰篇『咨爾舜』，『舜亦以命禹』等不計，也還有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在政治方面說出他的缺點，並不止『無爲而治』一端。至於在堯典中，舜既成爲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君，那孝子的身分當然已包括在內，何況書中明白說他『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表現他是至孝大孝，又何待孟子時代來多說？到孟子時還不過這一點點，那就不是『愈放愈大』。豈止於此，他從家齊而後國治的廣大範圍中退出來，專門做一個小小家庭中的孝子，可說是愈縮愈小了！在實際上，孟子仍舊是在述孔子的話，說『君哉舜也，巍巍乎其有天下而不與焉？』（孟子滕文公上）這不和孔子所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論語泰伯）是一樣？舜不始終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不增不減嗎？

由此可以看出顧先生所建立的公式，與所舉的說明例子，全不相符。即使相符，也不能證明他的公式爲正確。因爲關於舜的傳說到底有多少，我們根本不知道。如果在孔子時遇着機會表現一點，在堯典中遇着較多的機會又表現二三點，在孟子時遇着更多的機會，又表現四五點，都是很可能的。我們可以因此稱之爲愈放愈大麼？確定一種傳說有無歷史的價值，應以是否合當時發展階段爲標準，不能以愈放愈大，愈縮愈小，或始終不大不小爲標準。

公式的一二兩點既都不能成立，第三點又怎樣？就他所舉的例子看，是『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這就是說：在東周時做的東周史才是真正的東周史，在戰國時做的東周史，便不算真正的東周史，只是戰國時發明的東周史。這種說法如果正確，則中國的正史一一二十六史沒有一部是真正的歷史，須有成千成萬的史學家來做辨偽的工作！適之先生確切相信周禮中的井田制是劉歆一班人捏造的，固然可作他們的公式第三點的鐵註腳；但周禮中的『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由周金一再批准了，於是他們的公式的最後一點，又因碰着硬鏘鏘的青銅器場臺了！

至於楊先生所補充的什麼分化演變說不獨不是這個公式的救命星，反而成爲牠的催命符，因爲這種說法離開神與獸即不能談古史，這與科學的古史

綜合我們上面對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所分析的各點來看，牠完全是一種糊塗思想的湊合，愈修改便愈昏亂，絕對沒有科學的價值，故經不起我們的一擊。

## 五 古史辨派的腰斬中國歷史及其對外宣傳

梁東園先生不忍看見他們向古史那樣的『剝皮』，不勝感慨地說：

『結果是把一部上古史弄得一塌糊塗，使人簡直莫明其妙，究竟這部中國上古史是什麼一套把戲。』（東方雜誌二七卷二三號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六九頁）

其實抱怨他們剝古史的皮，弄得一塌糊塗，只道出真相的一半。他們一開始就謀斬斷古史，適之先生說：『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古史辨一冊二二頁）顧先生說：『從四千年的歷史跌到二千年的歷史，這真是一大改造呢。』（同書同冊一四頁）他們向古史剝皮，弄得血肉模糊，不可收拾，於是將歷史腰斬，而以革命英雄自居。適之先生說：

『韻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連禹和后稷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在中國古史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韻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議的事實。』

（同書二冊三三八頁）

我們知道，一個科學的歷史學者的職務，是在將已經神化了的古帝王或酋長從封神台上請下，回復他們原來的人的形狀，而不是將本來是人的古帝王或酋長送上封神台上去，增加古史上的糾紛和黑暗面。何況古籍中所遺留下來的材料並沒有他們所幻想的那樣糾紛與黑暗？試略舉兩節如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韓非子五蠹）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繫辭下）

這裏說明上古人羣最初由穴居野處，採取菓食，進而爲漁獵牧畜，終於

氏，神農氏等，顧先生以為是『想像中的人物』，郭先生以為『顯然是周秦之際的學者們所擬議的一種考古學般的推察，而且是很合理的（！）一個推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〇頁）楊先生說得更巧妙，有詳加介紹的必要：

『此等歷史進化觀皆得之遠裔民族之觀察。秦晉淮楚之間，夷狄雜處，所見文化，程度不一，其進化之跡顯然。故莊子稱太古為至德之世，山木篇又謂：「南越有邑焉，名為至德之國。」此其明證。……高木敏雄比較神話學謂「大抵依其名而示其性，所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庖犧等，無一不然。」蓋無一非出于意造，吾人治古史，於此等假說之說首當擯斥而廓清之！不能因其有合歷史進化之論，遂從而信之也！』（古史辨七冊上編一四頁）

我們知道，所有漁獵畜牧農業等都是人類的羣體從實際生活中發明或發現的，決不是任何個人創造的；不過為便於傳說或紀錄起見，不能不託始於其中一個能力特別大的集成的人。這就是有巢氏等名義的出來。顧先生所謂『想像』，沒有提出證據，等於空口說白話。郭先生所謂『推察』，也同樣無稽，因為周秦學者沒有現代考古學的知識，如無傳說作根據，何能作成『很合理的（！）一個推察』？楊先生所謂『疑皆得之邊裔民族之觀察』，這種疑似之詞，絕不足為據。禮記王制說：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這是漢儒所述的周秦時代四夷的狀況，他們以為夷蠻的『不火食』，戎狄的『不粒食』，是由於民性不同，不可推移，試問秦晉淮楚之間的夷狄生活何能幫助周秦學者造成一種『歷史進化觀？』至於以莊子山木篇南越至德之國作為莊子推測太古為至德之世的『明證』，更是滑稽之至。因為我考查四種不同的版本，都是『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並不是什麼『至德之國』，即退一步，假定何種版本作『至德之國』，又怎能斷定莊子是根據『至德之國』的『觀察』去推測『太古為至德之世』，而不是根據『太古為至德之世』的傳說去虛擬一個『至德之國』？古人明明沒有現代考古學的知識，（上面引文就是明證，）而其紀錄恰恰合於這種科學的證驗，可見此等傳說是真材實料，決非出於『想像』，『推察』或『意造』。他們不知道應用此等可貴的材料，反視為『假說之說，首當摧陷而廓清之』，可見他們的論斷

是盲目的，玄學的，而非科學的。

古史辨派的先生們沒有處理古史的能力，而不知自省，反大罵古史，顧先生宣佈：『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實，這裏邊不知藏垢納污到怎樣！』（古史辨一冊一四頁）我們絕對不相信古史是臭薰薰的東西！即使真是藏垢納污的話，也只應去其『垢』與『汚』，如認其皮也是臭皮囊，也只應『剝皮』。照他們的辦法，剝皮之後，理應現出原身，真相大白；何以愈弄愈糟，終致腰斬了事呢？

這種辦法本來是治古史者一樁不大光榮的事。這樣的悲喜劇在國內表演得還不够，竟向美國去獻技。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適之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這部書『是百五十年來中國關於古史的最有價值的著作。』（同書二冊四四七頁）一個叫做Arthur W. Hummel的，也在英文雜誌（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Vol. V. No. 5 Nov. 1926）替他們鼓吹，說『這部書開了中國歷史研究革命的新紀元，而替一班不懂中文的外人嘆惜，認為不能一讀此書，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參看同書同冊三六四頁）而美國史學聯合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所草成的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一文，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印第安那坡黑（Indianapolis）開會時當場宣讀。（原文見美國史學評論三十四卷第四期，古史辨二冊也載有原文和譯文）其中幾句最關重要的話是：

『我們如果接受這些深刻的結論，同時必須預備把中國的歷史縮短起來。我們雖仍可以說，中國已有三千年的紀錄，却再不能說她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像普通一般人那樣。』（古史辨二冊四四九頁）

美國的歷史本來很短，現在有一個文明古國願意將固有的歷史年齡減少一半，自然使牠特別發生興趣。所以牠的一個學術團體馬上接受我們的『古史家』『這些深刻的結論』，也『預備把中國歷史縮短起來。』他們的對外宣傳總算是如願相償。可惜這不是真理，致使我們的古代文化無端蒙受一種重大的損失！

## 六 結 論

綜合以上各項來說，治學方法的幼稚，研究範圍的狹小，和科學素養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傷。因此所產生的公式荒謬到無以復加。他們自以爲是在『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古史辨二冊顧序七頁）但他們的治學

態度和工作範圍遠遜於清代學者；因為清代學者不喜師弟互相標榜，而於主  
要科的經學外，旁及於史學，典章制度，小學，音韻，金石，校勘，天文，  
算學等等。古史辨派的先生們只在幾本古書裏打滾，對於治史所必需的現代  
科學毫無所知，而又深染淺薄的明代學者標榜相高的習氣。除掉上面所舉的  
什麼『第一次革命』，什麼『疑古大師』，什麼『廢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  
外，最露骨的是傅斯年先生於民國十九年給顧先生的信，內中有一段說：

『……而你這個題目〔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鑑鏡，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太成。……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却有待於你這古史論。……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顧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同書同冊二九七至二九八頁）

適之先生在民國廿七年一篇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的大文中，曾慨嘆「現在中國全部瀰漫着一股誇大狂的空氣」（胡適文存三集四八頁）其實這種空氣的造成，他們自己應負絕大的責任。把顧先生去和崔述甚至於牛頓達爾文相比，我們總覺得有些不倫不類。因爲他在思想家中還佔不到地位。像這樣的誇大狂，除掉助長受者及其門徒虛驕之氣，而阻礙其進步外，別無好處。試看楊先生下面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的說法，即可見一斑。

『有些人正在那裏拿着古史來玩把戲，天天挖空心思，信口亂說，真不免要令人頭昏，這確乎是我國史學界的病態！』（古史辨七冊上編楊序一頁）他利用神話學的『新的武器』造成神獸論，難道不是『拿着古史來玩把戲？』

母系氏族怎樣轉移爲父系氏族

當希臘拉丁兩氏族其家族以女系爲本位時氏族在其特性之中具有如次的特性第一禁止同一氏族內通婚因此子女便屬於與其父親所屬的氏族的相異的氏族，第二，財產及酋長公職爲氏族世襲制，因此，子女便不得相續其父的財產及其父的公職……。在家畜開始飼養羊羣與牛羣，而因此形成個人財產的對象及生活上之必需物資以後，在因耕作，而發生土地及房屋爲各自的所擁有權後，對於氏族相續制的現行形態，便必然發生反抗，其原因就在於：財產所有者的子女——其父漸次得到保障——不得不繼承這種財產，其原因就在於：這種財產須給與他的氏族的血族。……在財產益加大量地積蓄而採取恆久的形態時，在爲個人所有的財產之分量益加增大時，於是以女系爲本位的家系，必然地陷於崩壞，而同時必然地由那一以男系爲本位的家系起而代之，在某一個時候，這些子女，當分配財產之際，一定是與其餘的父方宗族，都同樣得到分配，但隨時間之進展，所謂父方之宗族，便限於其直系的子女了。

『二十年是如何長久的歲月！他們專治古史，未曾露出一線光明，腰斬了中國歷史不算，還要將那被腰斬的部分描寫成神和獸的歷史，與我們的祖先無關，『真不免要令人頭昏！』

現在總說一句，古史辨派的先生們，你們如果不是『風頭主義者』，真有為求真理而治中國古史的誠心，我十二萬分誠懇地希望你們更換你們的治學方法，擴大你們的研究範圍，豐富你們的科學素養，拋棄你們的武斷公式，轉變你們的標榜習氣，深思苦索，勇猛前進，替中國創造一部科學的古代史。語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我所以不顧一切，不客氣地盡情批評，並不簡單地和王充著論衡一樣，是由於『疾虛妄』，（論衡佚文篇）我所着眼的最主要之點，重說一遍：一為愛護莘莘學子，不使繼續中毒；一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愛護你們，尤着重於後一點。顧先生在讀書雜誌的啟事中說：『愈駁得猛厲，我愈感謝』。（古史辨一冊一八七頁）可見你們原來竭誠歡迎批評，正是學人追求真理應有的態度。你們中間不少第  
一  
流  
學  
者  
，  
是  
國  
家  
和  
社  
會  
幾  
十  
年  
培  
養  
出  
來  
的  
人  
才  
，  
你  
們  
應  
當  
有  
更  
大  
的  
勇  
氣  
，  
貢  
獻  
國  
人  
。  
梁  
啓  
超  
晚  
年  
有  
幾  
句  
偉  
大  
的  
自  
我  
批  
評  
，  
是  
值  
得  
寫  
在  
下  
面  
，  
供  
你  
們  
借  
鏡  
的  
：

『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淺薄，啓超與有罪焉。』（清代學術概論九一頁）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草成)

他利用神話學的「新的武器」造成神異論，難道不是「拿着古史來玩把戲？」

一 摘錄莫爾甘「古代社會」

#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歐伯

## 一 老子的時代

老子的生存年代，在莊子、禮記和史記等古籍中，本已有明白的指示，即這些古籍中皆一致記載孔子會見過老子，這證明老孔實為同一時代的人。胡適之推定老子的生年約當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十年，較孔子約大二十歲，與事實當相差不遠。但自梁啟超提出六項懷疑的理由（見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後，老子的生存年代似乎根本成了問題。但梁氏的懷疑理由經過許多人的批駁（如張煦葉青等）之後，很少能站得住。繼梁氏而起的一些懷疑家，其所持理由大都重複梁氏，更少新的發見。作者的目的只在闡究老子的根本思想，故不欲多費時間從事考證的批評。但有幾點應當特別指出：即孔子會問學於老聃，不僅為史記所大書特書，為老派的莊子所數數稱道（見莊子天道、天運和外物諸篇），而且為門戶成見素深的孔門弟子所迭次引據（見禮記曾子問篇），這證明孔子之親自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因而成為老孔兩派門人之共同的傳說。其次，在論語中有不少的處所，如『無爲而治者……』，『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以德報怨』等，都與老子完全相合，這證明孔子在思想上確會受過老子的影響。即就老子的文字和思想本身而言，老子一書與後來戰國時代的著作也顯然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老子實與孔子同時，或略長於孔子，曾一度為周之守藏室吏，後隱於沛（據莊子天道和天運所載，孔子會兩次見過老聃，蓋一在其為周之守藏室吏時，一在沛，即歸隱於沛之後也），著老子（所謂道德經）上下篇。

至老子一書的內容，像古代其他的典籍一樣，不無後人竄入的僞作，故在某些節段和語句中，間有矛盾或不可通的地方。但就一般論，老子實為中國古代第一部思想精深而較有系統（就其思想之連貫一致言）的最可靠的古籍，牠深刻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矛盾，這絕不是後世妄人所能隨便假造的。

如果老子與孔子同時，則老子的時代便正當春秋的末期。這正是中國古

代典型的封建制度開始發生動搖和變化的時期（後來戰國時代之最激烈的兼并局面，以及秦之建立統一集權的專制帝國，都導源於此）。

在這時期中最顯著的現象，是各封建諸侯國間的戰爭之益趨頻繁和劇烈。並且戰爭的範圍也由黃河流域擴展到了長江流域（如楚與吳，吳與越之間，都時常發生戰爭，這是春秋前期未曾有的現象）。此等戰爭發生的原因，表面上似乎是由於『周室衰微，諸侯爭霸』，而實際上却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為自春秋開始以來，生產技術日見增進（如鐵器之普遍應用，手工技術的發達等），商業經濟日見發達，貨幣使用的範圍日廣，奢侈品的生產愈多。——這一切，大大地刺激了和提高了一班封建貴族的享樂慾望。封建貴族為滿足其享樂慾望：一方面，在其所領有的地域內對農民盡量施行榨取，如增加地租，延長徭役，提高賦稅等；另一方面，則拚命掠奪別國的領土，即向外擴大榨取農民的範圍。在封建時代，戰爭便是封建階級擴大榨取農民範圍之唯一的手段。同時，新起的商人為侵入鄰國市場，也往往幫助了本國的封建貴族進行戰爭。

戰爭的後果，許多小國諸侯是被消滅（即為大國所吞併）了。但戰爭的全部負擔總是落在農民身上。農民不僅被迫參加戰爭，直接犧牲性命，並且還要負擔全部戰爭的費用和損失。不管任何一方戰勝，農民總是變成了戰爭的犧牲品。而且在戰爭時期，關於農業上最關重要的水道隄防和灌溉等工程必然荒廢，牛馬和人工等必然缺乏，因而往往釀成了極厲害的水旱災荒，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便成了一種定律。這對於農民當然又是『痛上加痛』！

其次，即在同一封建國家內的封建貴族集團間，為奪取權位的鬥爭也愈演愈烈。互相殘殺，互相驅逐，成了家常便飯，封建階層內的『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充滿了春秋左傳的記錄。封建階級內部這些鬥爭和殘殺，固然暴露了封建階級自身的削弱和衰敗，但同時亦愈加引起了社會的混亂和

其經營的安全與享樂，便不斷地修城築池，開闢闢面，建造宮第，屯集財寶，這一切不用說也是要靠榨取農民的勞力與財物來完成的。

所以在這一時期中，一方面是封建階級在內部進行劇烈的爭奪，對農民加緊壓搾，在生活上窮奢極慾，還要侈談仁義，誇張禮節；另一方面，是農民在不斷的戰爭和經常的榨取及壓迫之下感到異常痛苦，無法生存，強者挺而走險（所謂『民不畏死』），弱者坐以待斃——這便是老子生存時代之最顯著的社會關係和矛盾——這種情形都深深地烙在老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中。

至於老子本人究出身於何種階級？頗為近時一般研究老子思想的人所爭論。有人說他出身『平民階級』，有人說他代表『奴隸領主』，更有說他是『極端破壞派』或『隱者』的。這些說法，不是臆測，就是模糊。如果就老子所受的文化教育及其曾經一度為周之守藏史而言，說他出身於貴族階級，是比較可信的。但就老子的思想論，則顯然含有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成分，即強烈地反映了廣大的農民階層對於當時的統治階級種種不滿的意識。人們或許以此為矛盾。但以出身貴族而同情農民的痛苦，攻擊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和專橫的人，并非不可能的事。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近代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自然，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農民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會只限於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而必然要將當時已發展到相當高度的貴族文化，貴族的宇宙觀及許多偏見，與之多少聯繫起來，而造成一個新的思想體系，即一個含有深刻矛盾的思想體系——老子和托爾斯泰都是如此。

## 二 老子的哲學——元論與辯證思想

老子思想中的重心而且最富於歷史意義的當然是他的社會思想，即他對於當時社會的觀察、批評和改革的理想。但老子是我們古代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家，他差不多吸收了古代的全部文化，所以他的目光所及不只限於社會現象，而且注視到整個的自然。他曾把自然和社會作過一番比較的研究，企圖從自然中找出一種根本原理以為批評和改造他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指針。這原理便是他的哲學，即他的一元的宇宙觀和辯證的方法論。

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一元的宇宙觀和有意識地運用辯證法以考察問題的人，要算是老子，也只有老子。在這一點上，老子在中國是盡了泰利斯（Thal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的開山任務（在希臘思想史上，泰氏第一次提出一元的宇宙觀，赫氏第一次揭出辯證法）。惜乎他

的後輩沒有能繼承他發展他。

在老子以前，關於宇宙諸現象及其構成的問題，易經和洪範中確已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就思想發展的階段而言），但其形式還是很原始的，並且是多元的（易經以『八卦』象徵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并以此代表構成宇宙的因素。洪範則以所謂『五行』的水、火、木、金、土表示自然諸現象的根源）。只有老子才第一次明白地站在一元論的觀點上去探索宇宙萬有的根源。自老子看來，宇宙間一切事物雖然紛糾錯雜，品類萬殊，但究其本源是同一的。所以他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真。其致之者一也。天無以清恐將裂，地無以甯恐將發，神無以靈恐將歟，萬物無以生恐將滅，侯王無以爲真恐將蹶。

這裏所謂的『無』、『無名』、『玄牝』或『一』，都是『道』的別名。很顯然地，依老子的意見，『道』就是宇宙萬有的根源，猶如泰利斯所說的水是萬物發生的根源、宇宙的本體一樣。然而『水』是可以家用感官看得見、觸得着的東西，是物質的。但所謂『道』究竟是什麼呢？老子說：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

在這裏，老子告訴我們的只是：所謂『道』者，不是感性所能觸知的具體的物質，而是一種抽象，即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但究竟什麼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呢？老子在這裏未曾繼續解釋下去。不過他在另一地方曾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看來，所謂『道』者似乎是一種取法於『自然』的法則了。（按道字的本義原是具體的道路，後申引爲抽象的道，即是法則或規律的意思）。法則或規律雖然是看不

見、聽不到、摸不着，然而却確確實實是客觀地存在着的。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正合乎形容『法則』之不可捉摸而又真實存在的意思。

但是，老子的『道』究竟是否真正等於客觀的自然的法則，這是我們必須追究清楚的。如果就『道法自然』的表面來解釋，似乎取法於自然的『道』，就等於客觀自然的法則了。然而實際却不然。因為老子所謂的自然，不是指的自然界之客觀存在的物質的自然本身，而僅僅是就自然界一切現象之自生自滅，不受人爲干涉，自然而然的一點意思而言。例如他說：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物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又說：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所謂『莫之命而常自然』及『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這顯然是把『自然』與『人爲』對立起來，意思是說『自然』就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爲的干預，也用不着人爲的干預。一切聽其自然，不事人爲，便合乎『道』。這種思想，如果拿來對抗古代的宗教觀（即認爲宇宙或自然界中一切現象都是由多神或一神創造的觀點），是一個大大的進步，並且是接近唯物論的。因為這種思想承認自然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爲的干預，同時也就否認了神的干預。並且依老子的意見，就是神也是取法於『道』，即取法於自然的（所謂『神得一以靈……神無靈恐將歟』）。但如果只簡單地把『自然』與『人爲』對立起來，以為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則所謂自然便成了一種純粹的抽象，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了。真正客觀的自然法則，并不在於牠的抽象的『自然而然』，而在於牠本身就是自然物質自己運動自己變化的具體表現。所以這種法則首先必須承認自然物質的客觀存在。沒有物質，根本便沒有運動和變化的法則之可言。

可是老子却認爲他的『道』是獨立存在於自然物質之先和自然物質之外的。例如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顯然是說，『道』在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已經是獨立存在了。存在於何處呢？不用說，是存在於純粹的虛無之中。所以老子特別用『無』來代表『道』，並舉出一些『虛』與『無』的實例來解

釋他的『道』的意義。如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這種對於『虛無』的作用之解釋，是頗爲巧妙的，並且也含有一部分真理。不過我們必須注意：所謂『虛』或『無』，只有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才有作用。試問：沒有橐籥爲其範圍的『虛』（且不說空氣），能『動而愈出』嗎？這裏顯然證明離開物質條件的任何虛無，只是一種純粹的抽象。而老子的『道』分析到最後的結果，便是一種純粹抽象的虛無。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老子雖然建立了一元的宇宙觀，說宇宙萬物都發源於『道』，取法於『道』，然而他的『道』却是抽象的，空想的，即超物質的。所以具有唯心論敏感的梁啟超說，老子的『道』等於佛家起信論中所說的『眞如』（見梁著老子哲學），就共同是屬於客觀的唯心論一點說來，是不錯的。其實，老子的『道』，不僅等於起信論中的『眞如』而已。即柏拉圖的『觀念』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與老子的『道』都是屬於同一的範疇，都是一種想像中的存在，一種幻念，在客觀的自然界中實際是不存在的。然而這恰恰是梁啟超所未曾了解的。因為在梁氏看來，『道』與『眞如』都是客觀的真理哩！

但是，近來頗有人認定老子的『道』是屬於物質的範疇。例如葉青說牠等於亞諾西米尼（Anaximenes）所說的『空氣』，甚至等於康德所說的『星雲體』（見葉青『胡適批判』一四一一四二頁）。這自然是一種頗爲新鮮的見解，可不是老子原來的意思。這是由於葉青只注意到老子描寫『道』之迷離惝恍若有若無的一些形容辭，因而附會的結果。不錯，老子那些描寫『道』的笑容辭（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等）拿來套在『空氣』或『星雲』上是很相像的，說得過去的。然而却絕不能解釋老子所運用到的許多問題。例如老子說：『道雖無名，……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假如依照葉青的意見，把這裏的『道』套上『空氣』二字，試問將成爲什麼意思呢？只有依照老子自己的意見，即把『道』解作含有『虛無』和『自然』的兩重意義，那時對於上段文句才能解釋得通。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釋老子的全部文義。因為『虛無』和『自然』的另一解釋，即『清靜無爲』，這是老

子全部社會思想的骨幹。這似乎は葉青所未注意到的，因而對於老子的『道』發生了上敍的曲解。

現在我們來考察老子哲學的另一方面——他的辯證思想。

我們從前面已經看到老子承認宇宙萬物都是出於同一的根源的『道』，宇宙萬物是統一的。但是老子不僅看到了宇宙萬物的統一，而且還看到了牠們相互間的對立矛盾。所以當老子考察一切具體事物，特別是社會現象的時候，他常常是從事物或現象的對立方面去解釋。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無，善——惡，福——禍，盈——虛，剛——柔，曲——直等等對立的公式。這絕不是偶然的。

老子從各種事物或現象的對立中，首先看出了牠們相反相成的相互關係。他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

這便是後來黑格爾辯證法中之有名的『對立的統一』公式的表現。無疑地這是一種天才的發見。在古代只有希臘之偉大的天才的赫拉克利特曾經發表過與這同樣的思想。赫氏說：

『矛盾自相和致，各樣的聲音，產出最美的調和，一切都由鬥爭而來。自然亦受矛盾，牠之產生和諧，乃是矛盾而不是同一。例如牠綏合雄性之於雌性，而不是緹合同性，……技術顯然一樣是模仿自然行事。繪畫配合着白色與黑色，黃色與紅色，這樣遂獲得圖像與原樣之相類形狀。音樂配合高音與低音，長音與短音，就成為相異的調子而產生唯一的調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思想集，辛樂版——六七頁）。

老子與赫氏這種辯證法的思想，當然不是一種『偶合』，更不是單純地從腦子裏空想出來的，只是因為他們的天才與敏感而反映了客觀的現實，即客觀的辯證法而已。同時我們還必須了解：這種『反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即在社會的矛盾，階級的對立達到一定程度之下（像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及同世紀的中國春秋末葉），才有可能。

老子既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對立的統一』，同時也就明白了一切對立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這就指出了『唯』與『阿』，『善』與『惡』中間並沒有絕對的不可逾越

的鴻溝，究其極是相差無幾的。其他如美貌，曲直，禱福等，在老子看來都是如此。並且老子還進而指出了對立物之相互轉變的原理。例如他說：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這種思想，已經接近黑格爾所謂『質量互變』的原則了。『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惡，進步變成退步，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不是這種思想嗎？自然，我們還只能說是『接近』或『預見』。真正『質量互變』的法則，只有到更高度發展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水平下，才能被發見的。所以老子的辯證思想，只能進到此地為止。

有人說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現象之外的對立，即表面的對立，而沒有看出事物的內在矛盾。人們便以此為老子辯證法的最大缺點。不過，事物內在矛盾的法則，如同辯證法中『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兩種法則一樣，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偉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會發見這一法則。況且，老子還曾經說過『萬物負陰而抱陽』的話，這便已經多少接觸到事物內在矛盾或對立的法則了。我以為老子的辯證思想之最大缺點，則在於他一方面指出了各種事物或現象之對立，但另一方面他又異常厭惡這種對立，企圖用消極的方法去取消或調和這種對立。

對立原是由於矛盾，而解決矛盾的方法只有經過鬥爭（從溫和的到劇烈的）。鬥爭和對立是不能分離的。故赫拉克利特當其發現了事物的對立性和矛盾性之後，他便極力讚揚鬥爭，主張鬥爭。他說：『一切都由鬥爭而來』。『鬥爭是一切事物之父』。『凡為戰鬥而死的，就是神與人所尊重的人』（七〇和七四頁）。然而老子的精神則完全相反。他所最厭惡和反對的就是鬥爭。他雖然看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對立，但他認為解決矛盾和對立的唯一方法不是鬥爭，而是消極退讓。因此他提倡『不爭之德』。他認為『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所以他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在老子看來，凡是對立的局面，只要一方永久保持退讓的態度，完全站在消極方面，就可以獲勝而取消那種局面了。所以當強與弱，剛與柔，直與曲，榮與辱，福與禍，貴與賤，及尊與卑等相互對立時，他都主張無條件地站在後者一方。這樣一來，老子原來的辯證思想就完全成了反辯證的玄學了。

老子在對於事物運動和發生的問題上也表現同樣的矛盾。他一方面承認萬物是運動的，有生有滅。如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是辯證法最基本的原則）。他所注意的只是：萬物未生前之『無』和萬物既滅後之『根』。他說：『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常，知常曰明』又說：『當無欲以觀其妙，當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老子所追求的不是現實事物之運動和變化的本身，而是事物之『始』與『終』的靜止狀態，即事物之死的狀態或虛無狀態。這也是十足的玄學。

### 三 老子的社會思想

老子的社會思想便是由上敍的哲學觀點出發。宇宙萬物的本源既是『道』，而『道』是取法於自然的。所謂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己活動，自己變化，自然而然，不事人爲的意思。在老子看來，這樣的『自然』，是『無爲』的，然而又是『無不爲』的。於是『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便成了老子社會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說：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反之，如果違反自然，妄事作爲，則一定得到相反的結果。『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朝甚除，田甚無，倉甚虛』。『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在老子看來，天下一切爭亂，一切禍患，一切罪惡，一切腐敗，以及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都是由於在上者之妄好作爲所釀成的。因此他極力攻擊當時統治者的『有爲主義』。他把統治階級的種種作爲都加以考察、分析、批評。戰爭是當時一切『有爲』中影響最大而又最壞的。因此老子極力反對戰爭。他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這是很明顯的非戰思想。其次，爲老子激烈反對的是當時的嚴刑酷罰和橫征暴斂等。他說：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斬；夫代大匠斬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此外，凡是可以助長奢侈，引起爭奪，造成禍患的聲色貨利，游樂田獵，奇技淫巧等，都爲老子所厭惡所抨擊。他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關於當時統治者及一般上層階級（商人在內）的種種作爲及其惡影響，老子算是深刻地指摘出來了。即我們在今天讀來還是很生動的。但要怎樣才能取消或停止牠們呢？換言之，要怎樣才能從『有爲』進到『無爲』呢？於是老子便以哲學家的態度進而追求一切有爲的根源，企圖從根源上消滅一切有爲的禍害。他以爲一切作爲，如戰爭、刑罰、苛征、恣意聲色、屯積貨財、競爭技巧、馳騁田獵等等，都是起於有『欲』。而慾望之多，又是由於

『不知足』。所以他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因此他極力主張『少私寡欲』，主張『知止知足』。他說：『甚愛（指多欲）必大費，多富（指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說：『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斯足矣』。這是一種消極的禁欲主義，不用說是純粹唯論的。因爲人們，特別是當時一班封建貴族們的欲望之提高，不是由於老子似乎是觀察到了的。所以他進而主張消滅一切可欲的對象。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不過老子在這裏仍然是主觀的唯心的。他不了解所謂『賢』『難得之貨』，一切『可欲』的東西，都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不因為你主觀上『不尚』，『不貴』及『不見』而消滅。事實上，正因為是『賢』，所以引起人們『尚』牠，正因為是『難得之貨』，是『可欲』的東西，所以引起人們『貴』牠，和注視牠。這是無可避免的，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於是老子的禁欲主義與人類自然發展的欲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也就是他的自然主義本身發生了矛盾。

與欲望問題相關連的是知識問題。人不但有欲望，而且有知識。有了知識，自然會分辨事物的好壞、可欲的東西和不可欲的東西；自然會『尚賢』而抑不肖，『貴難得之貨』而賤易得之貨等。並且知識愈發達，製造的東西愈巧愈多，辨別力愈強，欲望也一定愈高，因而愈不容易滿足。這本來也是一種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但在老子看來，這是不『自然』的。因此他像反對欲望一樣地極力反對知識。他對那些以知識治國的人會作猛烈的攻擊，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同時他彷彿以身作則地形容自己是無知無識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闇闇；……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他最後的結論是『絕聖棄智』。『使民無知無欲』。但在另一方面，老子又很希望有道者，即有智的『聖人』來統治。他甚至埋怨人們『無知』，不了解他的『道』，說：『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吾言甚易行，天下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知我』。這可見老子所提倡的無知主義不但與社會的自然發展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相矛盾的。

關於老子主張退讓或不爭的見解，我們在前面論究他的辯證思想時已經提到。現在應當特別指出的，就是這種見解的本身也是矛盾的虛偽的。例如他說：『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為什麼？因為『柔弱勝剛強』。『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這是所謂以退為進，以不爭勝人（他常說：『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實際上，這是一種變相的不抵抗主義。所謂柔弱勝剛強，與當時的歷史事實是完全相矛盾的。春秋二百年歷史都是證明強者征服弱者，大國併吞小國。假如你沒有實力，不拚命鬥爭，一切謙下或退讓，都只能引起敵人的輕視和進攻，速其滅亡而已。

老子根據了他的『無欲』，『無智』和『不爭』等無為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原理，最後便提出了他的理想社會的主張說：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原始社會的人雖然是結繩而用之，或者自以他們的飲食為美，但實際上他們是十分缺乏的，艱苦的。他們的居住多是不安定的。尤其是各部落社會之間有着經常的戰爭，并不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他們不乘舟車，是因為尚未發明。更沒有所謂什伯之器而放着不使用的事實。老子這種理想社會，與其他一切烏托邦主義者的主張一樣，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開倒車的。他是企圖將當時已經發展到高度的，並且正在衰落的封建社會拉到

原始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去，這顯然也是違反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勢，是不『自然』的，等於要將『人』再回復到『猿猴』的形態去是同樣的空想與反動。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老子的社會思想，就其自身的邏輯結構言，雖然很能連貫一致，很有系統，似乎沒有什麼矛盾，似乎『自然』，『無為』，『不爭』，和『無知無欲』等，都是從他的『道』邏輯地發展下來的。但從社會的歷史的觀點看來，却充滿了矛盾，僅僅是各種矛盾的混合體而已。除上敍的許多矛盾外，我們還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深刻地描畫出了各種事物的對立性，矛盾性，即鬥爭的不可避免性；凡鬥爭的規律，永久是積極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他却無條件地主張站在消極方面，企圖以此去取消或調和矛盾。一方面，他尖銳地攻擊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妄好作爲，嗜好作戰，嚴刑酷罰，橫征暴斂，驕奢淫佚，以及使用種種智巧以欺騙人民等；這樣便應當喚醒人民，號召人民起來反對這樣的統治者，推翻這樣的統治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不爭』，退讓或謙下等消極的主張，即主張不抵抗主義，仍然希望有什麼『守道』的侯王或『聖人』（老子理想中的統治人物）來拯救人民。

但是這些矛盾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當然不能從老子思想的本身中去尋找解釋。老子思想的矛盾不過是當時社會中許多複雜條件所造成的矛盾，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層的地位的矛盾之反映而已。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老子的時代

之一切豪奢縱慾等，最後都壓在農民身上，即全靠榨取農民來支持。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會發生種種不滿，憤慨和仇視等的感情與意識。農民首又最直接的。他們對此自然要發生強烈的反感。但同時他們又感覺不到自己有力量可以停止或干涉那樣的戰爭和私鬥。所以他們除憤恨咒罵之外，只有希望統治階級自己相互退讓，『小國下大國，大國下小國』，用『不爭』的方法解決問題，免得累害他們。農民對統治者的嚴刑酷罰，橫征暴斂等也是如此。一方面表示憤恨，仇視，但另方面又不知道怎樣去反對牠們，制止牠們。所以結果也只有希望統治者實行『無爲』，即少作些事，自動地停止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農民根據自己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不但覺得一切戰爭、刑罰、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四獵等是多事，是有害的，就是一切知識也是多餘的、騙人的、有害的。所以『無爲』、『無知』、『無欲』、『不爭』和『知足』等，正是農民那種原始的實際生活的反映。最後，農民對於當時社會所加於他們的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同時又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於是只有根據傳說，根據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大概每一民族的傳說和神話中對於遠古時代的生活都有許多美滿的描寫）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來的。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老子思想中的一切矛盾，一切弱點與優點，都能從當時的社會矛盾中，從當時農民大眾的地位中找到了說明。老子提倡『不爭之德』（以農民對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而言，就是不抵抗主義），提倡無知無欲，主張復古，這些固然是他思想中的弱點。但同時老子也有他最光輝的地方，就是他曾經無情地深刻地批評了當時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種種虛偽，以及對於人民之種種搾取和壓迫，這種批評精神對於燭照和揭發社會的黑暗是極可寶貴的。老子的自然主義或無爲主義，從社會發展的觀點說來，固然含有反動的意識，然而拿來批評當時封建貴族那種橫行無忌、無所不爲、無惡不作，也是含有牠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在某點上說是幫助進步的。盧騷也曾用過自然主義去批評當時法蘭西的君主專制政體之種種橫暴，種種違反自然的事實，這對於當時反君主專制主義的推動，以及對於後來的大革命，都給了深厚的影響。

如果我們拿托爾斯泰的思想與老子的思想來比較一下，那我們對於老子一定能夠獲得更明確的理解。自然，托爾斯泰的時代與老子的時代，不但相隔是十分遙遠，而且在本質上也是很不同的。在老子時代封建制度雖然開始衰落，但商業資本主義還在萌芽。而托爾斯泰的時代，不僅西歐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就是俄國的資本主義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了。（這是就托氏時期的末期而言）雖然如此，但從托氏與老子思想的本質上，即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一點上說來，還是很相類似的。

所謂托爾斯泰的時期約當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即俄羅斯前革命的時期。在這時期中，舊的農奴制度已經崩潰了，但新的社會制度尚在準備當中。所以當時俄國的農民雖然處處感到變化、震動、擾亂和痛苦，但另方面又看不出任何新的前途。雖然舊的農奴制度崩壞了，但建立在這個制度上的沙皇專政的官僚警察和地主貴族等，對於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却未曾減輕；雖然資本主義已經闖入農村，但在農民看來，這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禍。因此，當時俄國的農民仍然只有把他們的面朝着過去，去回憶他們那種原始『米爾』（Mir）式的共同生活——這便是托爾斯泰思想所產生的基地。

所以托爾斯泰一方面嚴厲地無情地抨擊了沙皇官僚政治的橫暴，地主貴族的腐惡，資本的剝削，而另方面却又主張『不以暴力對抗罪惡』；一方面尖銳地指出了切上層階級的虛偽，宗教的假面具，而另方面又極力宣傳『一切應訴之於世界精神』，即訴之於他的新的宗教；一方面深刻地描繪出了勞苦大眾的貧困，痛苦和不幸等等，而另方面又宣傳禁欲、克己等的主張。托爾斯泰很慨嘆於俄國民眾的粗野和愚蠢，但他同時又極端反對西方文化，說那種文化是消滅人類天性中的一切天真和善良。他甚至反對學校教育。他說：『大學只是為那些易感的病態的自由派而設的，民眾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八六二年的論文）。托爾斯泰的這些矛盾，我們前面在老子的思想差中不多都碰過了。

## 四 老子與托爾斯泰

甚至托爾斯泰也主張虛無。他說：『一切都是虛無，是物質的虛無』（見托氏論生活的意義）。托氏不承認歷史有進化律。他說：『在人類面前一般

的運動法則是沒有的』。所以他讚美靜止狀態，讚美東方人民的好靜。這種

見解與老子的清靜無爲是很相符合的。托爾斯泰的理想社會，所謂『共同生活』，也是完全以俄國遠古時代傳下來的農村『米爾』制為根據而加以理想化的結果，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屬於同一的烏托邦。

自然，托爾斯泰與老子之間也有不少異點，但從社會的觀點看來是次要的。例如托爾斯泰思想的最後歸宿是信仰世界精神，信仰他創造的新宗教，而老子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雖不否認神的存在，却沒有終極的宗教信仰。不過老子也會說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便已經很接近於宗教的宿命主義了。

托爾斯泰曾在一些論文（俄文集刊為一小冊）中專門研究老子的思想，他極力贊揚老子，欽佩老子（惜原文不在手邊，關於托氏推崇老子的話不能具引），這可見托氏與老子的思想之間之血統關係，已經由托氏自己認識出來了。

列寧稱托爾斯泰的思想，是俄國前革命期、即過渡時期中農民意識的矛盾之反映。農民要想脫離自己的矛盾，只有在一個更前進的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然而在托爾斯泰的時期中這個階級尚未生長成熟（至少在政治上如此），所以托氏思想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生在春秋末期反映農民意識的老子之思想上的矛盾，更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如果我們再把老子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略微比較觀察，就會更加顯出老子的思想是反封建貴族的。孔子是完全站在當時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

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壞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與特權。故孔子的全部精神都集中於糾正和重新確定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為這是施行改良主義的出發點。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以忠義固各級封建主的統治權，以孝鞏固家長權，這是從根本上維持封建的秩序），誇說『仁』的理想——這些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封建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核心。然而老子恰與孔子相反。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是揭露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虛偽的，違反自然的，這是根本否認了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想只有站在被壓迫的仇視封建階級的農民的觀點上，才能發生出來。

老子是我們古代最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哲學家，最富有批評精神和同情於民眾的社會思想家。他的元論，他的辯證思想，特別是他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及其統治者的批評精神，直到現在還是光輝地映在我們眼前，值得我們研究，發揮。然而他的唯心論，他的玄學，他的虛無主義，禁欲主義，無知主義，復古思想，尤其是他的消極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精神，是十分有毒害的。但是自稱老子思想的繼承者，後來所謂道家者流，恰恰是繼承了他十分有毒害的這一方面；甚至現在人們還在為他這一方面的思想而服務，這等於在民眾中散布毒菌。繼承并發揮老子思想中的優點而排除其毒素，只有站在中國最前進的一個階級的觀點上才有可能。

## 伊里奇論托爾斯泰思想的矛盾

『藝術家、思想家和說教者的托爾斯泰，主要是屬於一八六一到一九〇四年的時期，他把全俄第一次革命的歷史特性，牠的優點和弱點，都可驚地浮雕地顯現在他的作品之中了。』

『在托爾斯泰的著作中，這一農民羣衆運動的力量、弱點、強點和狹隘性，都表現出來了。……可是同時，這個激烈的抗議者，熱情

的控告者和偉大的批評者，在他的作品之中，却表現他如此地不了解那推動俄國的危機之原因及怎樣克服危機的方法，這種不了解在一個

離開了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羣衆鬥爭。他於否認官式的教會時，同時又鼓吹了純淨的新宗教，即鼓吹那純淨和精製的麻醉被壓迫羣衆的新毒藥。對於私有土地制度之否認，不是引到集中一切去反對真正的敵人，反對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及其政治工具——君主專制，而是引向迷夢，渙散和無力的嘆息。一方面對於

資本主義及其帶給羣衆的痛苦加以非難，而另一方面又對於國際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認了政治，宣傳『不以武力抵抗罪惡』，完全之全世界的解放鬥爭取完全冷漠的態度』。

# 論古代希臘羅馬戲劇

## 一、希臘悲劇

古希臘悲劇是從獻祭狄奧尼西神 (Dionysus) 的禮拜儀式的動作中發展出來的（希臘文 drama 這一個字，本來是動作的意思）。這種禮拜儀式的動作通常由團舞<sup>①</sup>、舞蹈和歌唱（祭狄奧尼西的頌神歌 (dithyrambos)）等相輔而行。歌曲的內容是敘述狄奧尼西的異蹟的神話。表演者以舞蹈及表情 (mimicos) 把這些神話複述出來。後來，合唱隊中分出一個領導者來和合唱隊對答。這種腳色常常由那時候已經存在的職業優伶擔任（例如舞蹈師，各種滑稽藝人等，他們常常在集會中取悅羣衆）。有些研究家推測，遠古時代，關於狄奧尼西神受難的神話是由僧侶講述的，同時在這一個時候，僧侶把山羊作爲犧牲，供上祭壇（希臘文山羊作 *trages*, *tragoeida* [悲劇]這字就是從這裏來的）。

參加禮拜儀式的人戴著假面具和山羊的鬚與角，表演狄奧尼西的從徒——薩蒂爾<sup>②</sup>（薩蒂爾戲劇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禮拜儀式的表演在春秋兩季獻祭狄奧尼西時舉行。狄奧尼西祭典有『大』『小』之別，大祭典在城市裏舉行，規模豪華，小祭典在鄉村裏舉行，規模較樸素。這些禮拜儀式的表演也就是希臘戲劇的起源。希臘悲劇在初期是保持著關於狄奧尼西的神話的一切特點的。據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時代的樣式來作推斷。

希臘的劇場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露天建築。舞台是由一個狹長的平壇所構成，三面圍着牆，其中後面有屋簷的部份叫做 *skene*，兩旁的叫做 *paraskenion*，而我們現在叫做舞台的部份，他們稱爲 *proscenion*。一層一層高起來的半圓形的觀眾座位叫做 *amphitheatre* (圓形劇場或圓形看台)，舞台

與圓形看台之間的地方叫做 *orchestra* (希臘文原意爲合唱隊席，後來成爲一般的樂隊席，甚至於單單樂隊的意思)；這就是由 *Coryphaeis* (合唱隊領隊) 指揮的合唱隊所在的地方。隨着戲劇動作的發展，合唱隊席上加上了供演員們更衣的小室 (*skene*) (因爲每一個演員要扭任好幾個腳色)。平常我們所了解的舞台裝置，希臘人是不知道的。這對於構成希臘悲劇的技術很有影響（詳下面）。演員們戴著面具，穿着厚木底靴 (*cothornos*) 和長及腳跟的斗蓬（斗蓬的顏色看角色而定，譬如國王穿紅色的斗蓬）。這一切都使演員增加了身材的高度和偉大性，使演員肖似他們所演的神和英雄。爲了吻合這種情形，演員的動作很誇張，朗誦台詞的語調也很悲壯。

從用表情來敘述狄奧尼西的苦難的頌神歌，逐漸演變成由情節來表演了。特斯庇斯 (*Thespis*) 和庇齊斯特拉特 (*Pisistratus*<sup>③</sup>) 同時代) 和佛里尼赫<sup>④</sup>。可算是第一批的劇作家。他們採用了一個演員（第二個演員和第三個演員是後來愛斯啓爾 (*Aeschylus* 525—456 B.C.) 和索福克爾 (*Sophocles* 496?—406 B.C.) 加用進去的）。戲劇作品通常是以競賽的方法由作者提出。作者們表演主要的腳色（愛斯啓爾和索福克爾都是名優），他們自己爲悲劇寫樂曲，指導舞蹈。戲劇競賽的組織者是國家。爲了這件事，特地由高等法院 (*Areopagus*) 分派出一個長官 (*archontes*) 來決定辭却或者准許那一

● 本文譯自蘇聯共產主義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部出版盧那恰爾斯基主編《文藝百科全書》中『戲劇』條第四節。

● 是許多人圍成一圈，載歌載舞的遊戲。

● (*satyros*) 古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牛的神，淫逸放縱，是酒神狄奧尼西的從徒。

③ (495?—429 B.C.) 雅典大政治家，平民黨領袖，執政時外禦強敵斯巴達，內則精勵圖治，雅典文化空前興盛，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伯里克勒時代。

些悲劇上演。在評判戲劇作品之際，總要曝露出階級的態度。戲劇作品必要適應上層階級的情緒和利益，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把合唱隊授給劇作者的這種權力委託給戲劇藝術的特別的保護者——就是大地主們。統治階級竭力想利用戲劇作爲煽動和宣傳自己觀念形態的工具。爲了要影響全體自由公民，（奴隸是禁止上劇場的），他們爲窮人制定了特種戲劇事業的經費（伯里克勒時代已有）。

希臘三大悲劇作家——愛斯啓爾，索福克爾和攸里庇德（Euripides 480—406 B.C.）——在他們的悲劇中，依次描寫地主貴族和商業資本在他們發展的各階段上的心理觀念形態。愛斯啓爾悲劇的基本主題是命運萬能與鬥爭的徒然的觀念。社會秩序是被一種超人的力量所建立的，一次確定就萬劫不變了。這種秩序，甚至於起來叛逆反抗的蒂坦族人<sup>❶</sup>也無法把它撼動（悲劇『被束縛的普羅美修斯』）。這種觀點表現出了統治階級——貴族——警衛的趨向。貴族階級的觀念形態認爲必需絕對服從現有的社會秩序。索福克爾的悲劇所描寫的是希臘人戰勝波斯人而開闢了商業資本通路的時代。

由於這種原因，貴族在國內的權威動搖了，這也相應地反映於索福克爾的作品中。他的悲劇的中心是列代相襲的傳統和國家的權力之間的衝突。索福克爾認爲社會矛盾的調和——就是商業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妥協——是不可能的。

最後，攸里庇德是資產階級戰勝地主貴族的擁護者，他已經否定宗教。他的『貝萊洛方特』描寫一個戰士因爲羣神庇護貴族中的背信的統治者而起來反抗羣神。『假使人不要瘋狂地相信古舊的神話，』他說，『天上是不會有神的。』在那充滿無神論思想的攸里庇德的作品中，劇中的人物完全是人。假使他也要用到神的話，那也不過是在需要解決一件繁複的糾紛（*intrigue*）的時候才用。劇情他是用現實的心理特性來推動的。愛斯啓爾和索福克爾的偉大的但是氣質單純化的主人公，在這一位年輕的悲劇作家的作品中，給那即使是性格比較平淡無味的但是却是複雜化了的人物所取而代之了。索福克爾曾經如此批評攸里庇德：『我把人描寫成他們應有的樣子；而攸里庇德是把人描寫成他們實際所有的樣子。』

到希波戰爭的時候，在狄奧尼司祭典日，通行演出三齣發展同一個題材的悲劇（trilogia〔三部曲〕）和一齣薩蒂爾劇。這一齣薩蒂爾劇是以愉快而

題材的。索福克爾已經離開了這種三部曲的原則。是的，在戲劇競賽時，他還是帶着三部悲劇出場。不過每一部悲劇都有着各自的題材。索福克爾的悲劇可以算做是具有希臘悲劇的古典的形式的。他首先採用 *peripeteia*（主人公的命運或境遇的激變）。他把他的先驅者愛斯啓爾的悲劇所特有的劇情的急速性緩慢下來。索福克爾的劇情髮端是逐漸滋長而逼近 *catastrophe*（劇變）的，而在劇變之後再要有一個結局。爲了適應這一點，他加用第三個演員。索福克爾的悲劇是這樣構成的：由引子（*prologos*）開始，接着是合唱隊唱着歌（*parodia*）出場，然後是斷斷續續地隔着合唱曲（*stasimos*）中間的插曲（*epeisodion*），最後部份是結束的合唱曲和演員與合唱隊的下場（*exodion*）。合唱的歌曲因此把悲劇分成幾部份，這幾部份就是現代戲劇中稱爲幕的。分部的數目，甚至於同一個作家也是變化不定的。

合唱隊在整個演出過程中是不離開自己的位置的，因爲經常要插在劇情中：它協助作者闡釋悲劇的意義，展露作者的主人公們的心境，以當時得勢的道德觀點評判主人公們的行爲。因爲劇場中有合唱隊在場和沒有舞台裝置，所以把劇情從一處地方轉移到另一處地方去的可能性給剝奪去了。而且還有一點，希臘劇場不能描寫日夜的交替——因爲技術的條件不容許運用燈光效果。因此產生了希臘悲劇的三一律：地點、劇情和時間（劇情祇能在日出到日沒之間的時間內完成），都應該加強劇情的現實性的幻覺。時間和地點的一致，由於敘事詩要素的關係而大大的限制了藝術樣式的進化所特有的戲劇要素的發展。戲中有許多必定需要的事件，如果把它們描寫出來却又要破壞一致性，所以祇好報告給觀衆知道。關於那些舞台之外發生的事情是由所謂『報告員』講述的。

攸里庇德在悲劇中加用了糾紛（*intrigue*），不過他是把它人爲地解決的，大多數場合是依賴特殊的手法——*des ex machina*<sup>❷</sup>。到這一個時候，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了組織趣向（*machineria*）的發展。在他手裏的時候，合唱隊的地位慢慢兒地退成爲演出的音樂伴奏了。

荷馬的史詩（*epos*）對於希臘悲劇的影響很大。悲劇作家們有許許多多故事都從他那裏借用來。劇中人物時常使用從『伊里亞特』（*Iliada*）中借用

來的話。合唱中有著希臘音樂的影響。劇作家們用來創作對話和合唱歌詞的是那接近於活的語言形式的三音節一重音的詩體。

## 二 希臘喜劇

古希臘的喜劇，和悲劇一樣，是在獻祭狄奧尼斯的儀式中產生的，不過環境不同而已。假使說，悲劇的溫觴是禮拜儀式，那末喜劇是獻祭狄奧尼斯的陰沉肅穆的禮拜儀式部份結束之後開始的娛樂的產物。在古希臘，那時候是舉行狂歡地載歌載舞的遊行的（『遊行』希臘文爲 *comos, comoedia* [喜劇] 一字就是由此而來），人們穿着奇裝異服，互相爭辯，鬪鬥，交互說些尖利和玩笑的話，這種話時常很不雅，據古希臘人的見解，這是狄奧尼斯所鼓舞起來的。在這種娛樂的時候，也就產生了喜劇樣式的原素：多里（*Doris*）的世俗劇 *Mimos*（由即興的對話和歌舞所構成的一種滑稽表演）和亞蒂卡（*Attica*）的曝露性的合唱歌曲。亞蒂卡的青年組成兩個合唱隊，互相作歌唱的競賽。他們的歌曲是各合唱隊自己即興作成的。這些娛樂中逐漸逐漸開始有職業優伶參加，他們在表演時用他們經常不變的面具和動作。詩人們為他們改編神話的題材，諷刺地加以改作。第一個喜劇作家是詩人兼哲學家愛庇哈爾姆（*Epicharmus*），他是那由 *Mimos*（滑稽表演）發展成的所謂多里喜劇的代表作家。他作品中的神都作為玩笑的角色。這和那開始撼動古希臘宗教基礎的民主主義運動的時代是相一致的。亞蒂卡喜劇綜合着 *Mimos* 和曝露性合唱歌曲的原素。在貝里克勒時代，喜劇作家已經在他們的喜劇中描寫社會鬥爭，把他們的諷刺的箭針對各個政治家。當時在舞台上表演的是關於迫切的政治問題的喜劇。常常有許多喜劇，由於它們對某幾位統治者態度不尊敬和諷刺各方面的國事而給當局禁止演出。

亞蒂卡政治喜劇的三個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克拉丁（*Cratinus*），攸波里德（*Eupolis*）和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 445?—380? B.C.）。其中最偉大的是亞里斯多芬。他在自己的喜劇中向那在彼羅龐尼克斯（*Peloponnesus*）戰爭<sup>①</sup>時代當政的民主主義進行激烈的鬥爭。亞里斯多芬是絕對擁護和平的，因為戰爭對於地主貴族的反映是有害的，而他乃是表現地主貴族的意識形態的。這也確定了他的哲學觀點和道德觀點的反動性。所以他諷刺地描寫蘇格拉底（*Socrates*），不放鬆那和他同時代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表現皆女且老惡，也許苦存幾也或可也，也勿苦引大多故老惡也風利是主主義

者的，克列昂（*Cleon* <sup>②</sup>）和貝里克勒也在其內。喜劇『巴比倫人』中克列昂一角是他自己所起，因為演員們不敢演，怕統治者報復。

喜劇並不需要舞台有特別的設備。演員的數目不超過三個，不過每一個演員所演的腳色多於悲劇。合唱隊，在喜劇中也佔着很重大的地位。喜劇中的合唱隊的特點是合唱隊領隊（*Coryphais*）代表作者本人說話，他敘述作者在喜劇中所含有的一些基本思想。合唱隊領隊（作者的代表）所說的話叫做 *parabasis*。跟在合唱隊表演之後的曝露性部份是喜劇的中心部份，這是由滑稽劇（*buffonata*），默劇（*pantomimos*）和 *condacis* 舞（一種姿放的舞蹈）等混合而成，其中的舞蹈和悲劇中的莊嚴的舞蹈不同，這帶有色情的性質。喜劇合唱隊的服裝也不像悲劇合唱隊的服裝。喜劇中的服裝是奇出怪樣的（譬如表演飛禽，黃蜂，雲彩等等），而且是有寓意的。演員的面具必需要把所曝露的人物特出地描繪成可笑而醜陋的樣子，（譬如，眼睛突出，嘴吧闊到耳朵旁邊等等）。演員的身驅也是頗為醜怪。演員不穿厚木底靴。這並不需要，因為他們所表演的形象並不理想化，並不偉大等等。正相反，演員們必需以誇張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形象，顯露他們一切卑下的地方。

<sup>①</sup> 帕坦（*Titan*）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族。這神族是烏朗（*Uranus*天神）和蓋亞（*Gaea*地神）的後裔，其中包括克朗（*Cronus*政權之神），阿特拉斯（*Atlas*雙肩擔天柱之神），普羅美修斯（*Prometheus*盜天火授予世人之神）等等在內。後帝坦族與以宙斯（*Zeus*）爲首之奧林比亞（*Olympia*）諸神爭奪天界統治權失敗，墮入地獄（*Tartarus*）而覆亡。

<sup>②</sup> des ex machina 拉丁語的原意是『機關中的神』，是古希臘悲劇家們所用的戲劇手法的名稱。當悲劇的劇情太繁複，作者就用人爲的方法來解圍。他們在劇終時用某一個神的干涉來迅速使糾紛作預定的結束。這神是乘着一個特造的機關（名稱因此而起），從造在台上所築的屋門上面的洞裏出來，下降到舞台上來。他通常總是把糾紛弄明白，徹底決定劇中人物的命運，有時候甚至於改變整個劇情。現在凡是在戲劇中突然毫無理由地出現了來解決劇情的人物都叫做 *des ex machina*。

第四世紀初，在所謂中期亞蒂卡喜劇時期（當時的代表作家是安蒂芬（Antiphanes），安那克山德里特和亞列克西斯），這種樣式首先是配合資產階級的口味的。喜劇不觸及政治問題而成為世俗生活的諷刺了。這是因為禁止引用政治領袖上台和完全禁止觸及政治鬥爭問題所促成。第四世紀時最風行的是以菲萊蒙（Philemon）和特別是以梅南德（Menandros）為代表的所謂『新喜劇』。梅南德自認為是攸里庇德的學生，因為後者是開始在舞台上樹立描寫平常人和人類情慾的基礎的。攸里庇德喜歡的題材是父母認領自己亡失的親生子女，而這也是梅南德的基本題材。他的喜劇的主要人物是寄生蟲，詔媚狡猾的奴隸，吹牛的戰士（馬其頓王亞歷山大遠征的產物）等等。在描寫現實的生活時，梅南德的世俗喜劇不用舞蹈和歌唱了。

## 三 古希臘的戲劇理論

作為古希臘戲劇的理論基礎的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ka）。在他

之前，就已經時常遇見想部份地建立戲劇作法理論基礎的各種片斷的企圖，但是到了亞里斯多德手裏，才把它形成完整的體系。索福克爾寫過一篇沒有流傳下來的關於合唱的論文，但是，像他和攸里庇德的論爭一樣，也是帶着較多的論戰性的。在柏拉圖（Platon）的理想國（Respublica）中，也有关於戲劇的議論，不過主要是從社會政治方面出發的。柏拉圖認為悲劇和喜劇對於他的理想國是有害的。悲劇呈現的是令人惋惜的處身於不幸之中的人，而這却在觀眾之間傳佈一種不必要的惻隱之心；喜劇鼓勵那種輕浮的諷嘲的傾向，將來這會漸漸變成一般的習慣。和柏拉圖的意見相同，亞里斯多德確定藝術是自然的摹倣。但是柏拉圖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說藝術低於現實，而亞里斯多德却相反，他給藝術添上一種崇高的發散的意義。戲曲是摹倣人的行動的，不過人可以被描寫得比實際存在的好或者比實際存在的壞。悲劇裏描寫的是第一等的人，就是說，比較好的人，而喜劇裏描寫的是第二等的人，就是說，比較壞的人。悲劇是『摹倣那有着一定範圍的重要而完成的行動，依賴語言的幫助，在它那用各種樣子裝飾過的每一個部份裏，用行動而不是用講述的方法，為同情和恐怖來「發散」（*ektharsis*）那諸如此類的情緒。』希臘悲劇的基本主題是對於命運的恐怖，據亞里斯多德的意思，這種主題應有的結果不是僅僅懼怕墮入這種境界，而是在精神上發散那可能引起這種境界的情感。所以悲劇的發散並不是懼怕那威脅着的現實的危險，而

能超越於這種情緒之上的可能性。亞里斯多德把詩的韻律、歌唱和音樂的伴奏稱做『裝飾過的語言』。對於悲劇的各個不同部份，這種『裝飾』也可有各不相同。亞里斯多德計算悲劇有六個構成部份：思想（idea），情節（fabula），人物（character），口語和音樂伴奏。藝術的基本原理之一，亞里斯多德認為是在複雜多樣之中求統一：作品的一切部份應該構成一個有機的和合理的整體。悲劇應該表現一個完成的事件，時時刻刻不要使劇情鬆弛，或者不要破壞了完整的統一而使劇情有所變動。人物應該要能滿足三種需要：他們應該高貴，應該適合該人物的性格及其行動，應該真實和前後一貫。結局應該由劇情的發展中逐漸推引出來。

## 四 羅馬戲劇

羅馬戲劇的基礎是建立於所謂菲生寧（Fescennine）<sup>①</sup>之上的。菲生寧——這是村民在收割穀物和葡萄之後舉行的假日裏互相對答酬唱的諧謔詩。他們起初取笑新娘者，後來完全針對各個公民了。同時羅馬的兵士們在他們將帥凱旋的遊行中歌唱的諧謔歌曲也參加進去。

羅馬土壤上的第一期的戲劇演出是愛特魯里亞的優伶們演出的。這些優伶因疫病流行而遵從古老傳說，奉召到羅馬去：優伶的舞蹈，迷信的羅馬人以為是唯一可以取悅震怒的神和阻止人民的災難的。在愛特魯里亞優伶影響之下，羅馬的青年們自己似乎也開始舉行舞蹈和音樂的演出了。他們並且把對話形式的嬉謔和它結合起來。

因此就這樣創立了第一種戲劇樣式——諷刺劇（*satyrus*，拉丁文原意是由各種食物煮成的『雜拌兒』）。後來這種樣式和描寫內地生活的民間的趣劇（*farse*）——亞特拉喜劇（*Attellinae* <sup>②</sup>）——結合起來。亞特拉喜劇產生於什麼時候，這還無法斷定。不過祇曉得，表演這種喜劇的是羅馬的青年而不是外地的 *histrionis*（優伶）。亞特拉喜劇是在戴着經常不變的假面

<sup>①</sup> 一譯『希臘內戰』，發生於公元前四三一至四〇四年間，是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結果羅典戰敗。彼羅龐尼克斯是古希臘最南部的半島的名稱，現在叫莫里亞（Morea）。

具的形式之下表演加姆佩尼亞喜劇的典型人物的，假面具的人物如呆子，蠢貨馬卡，饕餮，饒舌家布康，可笑、吝嗇、有錢而利慾薰心的老人巴琶與有學問的騙子，粗胚陶生。

戲劇之以文學作品的姿態在羅馬產生，那是在商業資本繁榮的時代。那時候，商業資本的威力已經佈滿了地中海流域的全部，因此羅馬的統治階級不得不攝取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比較進步的文化。這可以拿第三世紀羅馬帝國所特有的醉心於希臘文化的事實來做證明，當時非但在商業資本階層內有這種情形，而且在那些投身於商業中去的貴族（nobilis）——羅馬的大地主之間也是如此。

在希臘人影響之下，羅馬也產生了戲劇。羅馬的戲劇是保持着羅馬統治者們廣泛運用的競技表演的一切特點，目的也是在轉移被奴役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怒火。戲劇表演大多類似默劇，舞劇（ballet）和神話劇（féeerie）。假使說，喜劇是得到人民的愛好的，那末，悲劇是有教養的人的財產，悲劇在他們主要是供作閱讀的。

羅馬第一個劇作家是被俘虜的希臘軍人里維·安德洛尼克（Livius Andronicus在紀元前第三世紀），他是羅馬摹倣文學的創始者。他第一個翻譯了許多希臘的悲劇和喜劇。在他影響之下，羅馬人納維寫了幾部反抗羅馬貴族的喜劇，因此被捕入獄。納維寫的作品很多，不過都是盲目地摹倣希臘作品的。他在那些取材於羅馬史的所謂『普萊特克斯達』悲劇（paetexta<sup>†</sup>）是比較獨立的。普通，納維算是奠立羅馬戲劇基礎的人。普萊特克斯達悲劇是世界文學中最早的历史劇。

羅馬最大的悲劇作家是恩尼（Ennius），巴古維（Pacuvius）和亞克西。恩尼在改作希臘原著方面已經顯出較多的獨立性。在寫作獨白的方法中，他喜歡用在獨白中表現内心行動的漸進法（gradatio）。恩尼尤其接近攸里庇德的哲學思想與情感心理。巴古維不但摹倣一定的希臘作品（尤其是索福克爾的悲劇），而且已經獨立地把他們的原理和技術應用到那還沒有定形的希臘神話中去。他的作品中有着羅馬人醉心於哲學的反映。亞克西大大地改善了悲劇的技術。戲劇的成分在他的作品中大大地排斥去了敘事詩的成分。他善於在活的動作中表示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感。

無論羅馬的悲劇具有多麼大的摹倣性，它還是在古代戲劇史上添上了它所獨有的特點，這種特點是合於一般的羅馬人的生活和特殊的羅馬戲劇的條

件的，在民主主義的雅典的戲劇中顯得這末重要的合唱隊的地位，在羅馬人手裏是大大的縮小了。三部曲的原則和諷刺劇他們也不用了。羅馬悲劇的特點是所謂 canticum——在笛伴奏之下歌詠的獨白（canticum也是羅馬喜劇的特點）。

羅馬的喜劇比較獨立，雖然這裏必需聲明：納維因在他的喜劇中嘲笑貴族而受到的刑罰，抑制了作家觸及任何有關羅馬社會生活的題材。甚至於禁止用羅馬人的名字來稱呼劇中人物。而且，羅馬喜劇的人物必需穿了希臘人的服裝——pallium（短披肩）——而登台（描寫希臘人生活的『巴里』喜劇（comœdia palliata）一名就是由此而來）。但是劇作家的權力雖然受到這樣的限制，却沒有妨礙獨立的羅馬喜劇的興盛。

羅馬共和國的最大喜劇作家是普勞特（Plautus 紀元前 254?—184），他在青年時代是亞特拉喜劇的伶伶，後來是導演。他在改作希臘梅南德的喜劇的時候，加進了許多滑稽劇的成分。其中透露出真實的羅馬的生活——這一個時代的生活和習俗。普勞特的時代和梅南德喜劇裏所描寫的時代，有著很多的共通點。這種一致決定了性質相同的社會因素。

與梅南德同時代的希臘貴族，在達到了他們的威力的頂點之後，開始衰落了，與此相像，普勞特時代的羅馬貴族也這樣的開始傾向沒落了。地位降低的貴族，感覺到自己沒落的不可避免，他們盡情的講究享樂，過着荒淫的生活。所以，和梅南德一樣，普勞特的主要人物是藝妓（hetaira），貪財的女子，幫助貴族青年拉皮條，鬧戀愛和揮霍祖傳遺產的奴隸騙子。

普勞特改作梅南德的喜劇的時候，尤其是改作菲萊蒙的喜劇的時候，總是求助於那所謂『混合情節』的方法——就是把幾個以不同的題材寫成而有著共同的典型人物（譬如：吝嗇鬼，寄生蟲之類）的喜劇歸併入一個喜劇中去。別人的主題和題材，在普勞特手裏，特別由於他的喜劇所特有的羅馬戲除了普勞特之外，羅馬喜劇的巨匠要算是賽西里和特倫西（Terentius）了。賽西里的喜劇沒有流傳下來。大家知道，他是亞蒂卡新喜劇的熱烈的創始者和翻譯者。和普勞特不同，特倫西的喜劇是難得離開希臘的原本的，所

<sup>†</sup> 非生寧一字是因埃特魯里亞（Etruria 在意大利中部，今稱杜斯卡尼〔Tuscany〕）非生寧城（Fescennium）而得名。

以當時人都稱他爲半個梅南德。假使說，普勞特在自己的作品中加進許多獨立的羅馬的東西來賺取大民大眾，那末特倫西是避免這樣的。所以他在當時有教養的人們中間有着比較大的聲望。他的喜劇的特點是非諧和的結構和經過慎密推敲的語言。在文藝復興時代，特倫西的喜劇是算作古典作品而根據了他來學習拉丁文的。

在第二世紀時，巴里喜劇爲托加喜劇（comedia togata<sup>❶❷❸</sup>）所替代，托加喜劇是反映葛拉克（Gracchus）弟兄<sup>❶❷❸</sup>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時代的羅馬的生活。羅馬史上這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含有政治的意義的。它表現着羅馬民主主義的反政府情緒。出現了攻擊當政的貴族階級與該階級的執政者以及該階級的生活習俗的（魯西里的）諷刺文學。這也是托加喜劇內所特有的。托加喜劇的最大的代表作家是蒂蒂尼，亞塔（Atta）和亞佛朗尼（Afranius），他們也是改作亞特拉喜劇的。他們的劇中人物是手藝工人，布商和鐵匠等等。巴里喜劇所特具的戀愛糾紛爲日常生活中的逸聞所替代了。

在紀元前第一世紀時，羅馬國粹的多樣化的喜劇——亞特拉喜劇和滑稽表演（mimos）——興盛起來。龐波尼（Pomponius）給亞特拉喜劇具備了文學的形式。他把加姆佩尼亞鄉村中所創作的這些民間趣劇加以所謂『城市的集中化』，添進新的人物，搬到城市裏去上演。滑稽表演在內容上看起來，使人想到像是亞特拉喜劇，它描寫的是社會中民主主義部份之可笑的一方面；此外，滑稽演是娛樂的表演，演這種戲的男伶是和女伶們一同穿着輕裝表演的，有時候他們完全赤身露體地摹倣一切言行或者含有色情意味的穢惡舉動<sup>❹</sup>。滑稽表演的優伶（其中最著名的拉貝里烏斯[Laberius]和西爾）是得到猶里。凱撒（Julius Caesar）的親自的保護的，這一事實確定了他們

## 眞

後而心裏毫不感到慚愧的人，也許不大會有的吧，至少在現代。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人多少總是自私的，自私的人很容易專爲自己打算，爲自己打算的人，往往不能夠真實

，這就造成舉世作僞的現象了。

怎麼會自私的呢？原因於「權」和「利」，爲了權，爲了利，就會有人昧去了良心，爲非作僞起來了。

## 與

「我是一個真實的人」，把這句話響亮地說出來了以後

長，漸漸形成舉世皆僞，以僞亂眞了。

作僞的結果怎麼樣呢？「僞」乃「眞」之對，互爲消

那末這世界有沒有「眞」呢？我想是應該有的，而且

是一定有的，祇是被「僞」籠罩住了，被「僞」壓抑住了，我們不容易發見牠，如果我們能夠衷心地尋牠，求牠，那「眞」一定會非常容易地顯示出來的，縱然是現代。

於是祈願推行一個「求真運動」。

的社會的面貌。滑稽表演完成了由文藝形式的戲劇轉移向純粹競技表演的形式的過程。所謂競技表演的形式是和武術表演——角鬥士（gladiator<sup>❶❷</sup>）的搏鬥，公開執行的死刑等等——混合而成的默劇。

在尼羅皇（Neron 37—68，在位年代，54—68）時代，創始了賽納卡（Seneca）的悲劇。這些悲劇的內容取材於索福克爾和攸里庇德的作品。這些悲劇充滿着哲學和道德的議論，大多是供閱讀的戲劇，所以形式上非常完美。這晚期的羅馬悲劇對於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時代歐洲新戲劇的形成所起的影響比了古代希臘悲劇更有力。正相反，在年代上比較相近但是在經濟上大不相同的封建主義文化建立和興盛的時代（中世紀），在它戲劇的創作方面，不是起源於高度發展的古代的悲劇和喜劇，而是起源於那在樣式上帶有古風但是却很幼稚的祭祀的神祕劇（mysteria）和流傳到農民階層中去的滑稽表演的形式。

<sup>❶❷❸</sup> 因產生地加姆佩尼亞（Campania）省亞特拉（Atella）而得名。這

種樣式的趣劇是意大利假面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前驅。

<sup>❶❷❸</sup> 因演員穿羅馬服裝 toga（羅馬公民平時穿的白色上衣）而得名。

<sup>❶❷❸</sup> 葛拉克弟兄均爲羅馬政治家，因創行農民改革，觸怒貴族，弟兄兩均爲貴族所殺死。

<sup>❶❷❸</sup> 古羅馬時代在競技場（circus）中與其他角鬥士或與獸類相鬥以供公衆娛樂的武士，這種武士大多是奴隸和戰俘。

#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英·C·考特威爾著  
朱·維·基·譯

## 一 原始積累時期

### (一)

資本主義謀自己的生存，需要兩個條件——巨額的資本以及『自由的』，就是受剝削的工資勞動者。這運動只要一開頭，資本主義就產生了自己的一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不變資本的總和是以積累而增多並且以合併而聚集，而這種合併由於不斷剝削匠人和其他小資產階級者，產生了工資勞動者的必要的供應。

因此在這些條件能實現出來之前，一個原始積累的時期是必要的。這種原始的積累必然是用暴力逼迫的，因為還沒有成為一個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還不會為自己的擴張造出政治的條件：國家還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

在這個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以及投降到資產階級那邊去的那個階層的貴族，奪取了教會的土地和財寶，並且以公共土地的圈定，寺院的封閉，牧羊地的擴展，和封建主及其隨從的最後的消滅，而造成了一隊被奪去了財產的流徙者。從新大陸劫取金銀，這在墊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扮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運動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君主政體和封建貴族鬥爭的時候，去倚賴資產階級，而且回報他們的支助。丟圖王室的君主們乃是和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締結聯盟的霸王。

在這原始積累的時期中，資產階級成長的條件是不法地造出來的。在每個資產階級者看來，他自己的本能——所謂他的『自由』——是不能容忍地為法律，權利和規令所限制，而且美和生命只能以他的慾望的強烈的擴大，才能獲得。

『凶殘，大膽和堅決的』不加克制的意思，既無標準又無度量，乃是這原始積累時代的精神。駕鷲於一切其他之上的這個絕對的個人意志，因此是依里薩白時代的生活原則。瑪洛懷的浮士德和旦姆勃令表現出這原則的最單

純的一面。

這個生命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君王』上，達到了牠的最高的體現。在那時為原始積累的領袖的意大利和英國，生命在君王的絕對意志裏達到牠的最有力的結果——君王這人物非常明晰地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幻覺，正好像在現實社會中，君王乃是實現資產階級擴張條件的必然的手段一樣。要打破封建制度的模型，從他們那裏奪來資本，這都需要一個絕對的君主的力量和殘忍。在他的意志的神聖權利上加上任何已建立的制限或障礙是錯的，因為這種制限或障礙唯其是已建立的和傳統的，就只能屬於封建的，故而會使資產階級的發展倒退。

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所表現的種種燦爛和背叛，是這君王的意志的呼聲——這個絕對的資產階級的意志，其力量就在於打破一切流行的因襲以實現出自己來。這就是所有莎士比亞的主人公們都有君主風的所以然了；也就是王帝風度成為這時候的人類行為的理想典型的所以然了。

瑪洛懷·却潑孟·格里恩·而尤其是莎士比亞都是由資產階級的父母所生的，準確地表現出這時代君主風的資產階級意志的旋風般的力量，及其一切的壯健和粗獷。里爾王、哈姆萊脫、麥克俾斯、安多尼、脫羅勒斯、馬賽羅、羅米歐和珂賴納斯各以自己不同的樣式，除了忠於自己外不知有其他的義務，把自己實現到最後的一點，發出自我的最純粹，最精妙的馨香。騎士時代又在吉訶德先生的英國兄弟們，即霍脫司潘，甫爾斯泰夫和亞瑪杜身上顯現，可不似像這時代自己所見到的那樣，却是像資產階級所看到牠的那樣地不受到信任而且是被辱罵了的。

甚至於那最卑賤的人物，就是那空無所有的，不被信任的，大言的巴洛爾司，也把這無限制的自我實現變成他那舞台生命的法則以及他的人格的辯護：

只要做我自己本身這樣的人  
就能使我本身生存。

莎士比亞的主人公們的重要性就在於這個毫不節制的意志，他們似乎用這意志把自己內在的幻影擴大並充滿整個世界。甚至於死亡也不使他們的自實現中止，他們在死亡裏才主要地成爲自我——比如里爾王、哈姆萊脫、姑婁巴和麥克俾斯——他們那死亡的秘密以及那悲劇的解決也都在這一點裏面。

莎士比亞在資產階級的幻覺中活動的深度，他那把握人類社會的廣大，是由這個事實所顯出，就是他歸根結蒂是一個悲劇家。這個人類個性的不加束縛的實現，在他看來就是『必然性』的不加束縛的擺弄。資本主義的推進力的這種矛盾，一而再地在莎士比亞的悲劇裏表現了出來。在麥克俾斯中，那主人公的野心是實現的——可是逆轉的。在里爾王中，那主人公在自己女兒的同樣不加克制的意志上粉碎了，也在『自然』上粉碎了，『自然』的必然性用一個暴風雨來表現出。暴風雨這個象徵的力量就在這個事實裏，就是：『自然』在一個大雷雨中好像自己在行動，不作爲一種牢不可動的傀儡，却好像一個怒不可遏的人類。在烏賽羅中，人的愛情能在自身中實現出最佳的德性來，却用這種實現的漫無限制的作用『殺死了牠所愛的東西』。在哈姆萊脫中，不能度量的意志間的一種衝突的問題，是用另一種形式提出——在這裏，一個人的意志向其本身分裂，所以縱使外界的事物不能反對或反映牠，牠還要和自己掙扎，於是毀滅。這單一意志的『兩面性』，是由那塗毒藥的寶劍和酒杯適當地象徵了出來，在其中，那單一的目的好像具有兩面，而獲得對立的目標。在安多尼和姑婁巴以及羅米歐和朱麗葉中，最單純和最強烈的本能的滿足，乃是沒有邊涯和沒有限度地去愛，而這種愛確定了愛者的毀滅，爲他們辯護的只不過是那愛是無限度的，以及蔑視愛國情緒，家庭觀念，理性和自私。這種死亡是悲劇的，因爲在這時代自我的漫無節制的實現是英雄的，是歷史的生命原則。我們覺得那死是必然的，而且一定要那樣發生：『這是無用流淚』。

在這階段，資產階級者的勁道和活力倚靠於自己作爲一個階級地團結在君主政體的領導底下。在許多地方，一個自己武装起來的，自己行動的公社，就是那英國的資產階級，早已唯朝廷爲馬首是瞻了。朝廷是進步的策源地，而且那裏的公共的集體生活一時成爲資產階級進步的潮流和原始積累的泉源。朝廷的本身並不是資產階級；牠像封建主那樣地要把自己的意志強行施

『絕對性』縱使其精義上是屬於封建的，在其結果上却是資產階級的，因爲這絕對性替他們造成他們發展的條件。

我們在這裏發見莎士比亞縱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幻覺，依然是朝廷的，或是資產階級貴族的一個官員。演員乃是『皇后的僕人』。他並不是一個爲資產階級市場，或是爲『大衆』的生產者。他有着一種封建的地位，故而他的藝術在其形式上不是個人主義的：依然是集體的。他的藝術過着朝廷的集體生活。從演員，從戲劇家講來，他和自己的聽衆生活在一個同時的公共的情緒世界裏。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在其最偉大的表現上，所以是戲劇，真實的上演的戲劇的原因，就是這個。這時期的詩歌依然能保持其社會性和大衆性，同時却也表現了資產階級的企望，就因爲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聯盟的緣故。

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總演出一個故事來。這故事往往講到人們的個性實現在經濟功能中——牠從外面看他們爲『人物』或『典型』。牠把他們安放在從外面看到的一個真實的社會界裏。但是在原始積累的時代，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還沒有分化到建立起社會的『典型』或『標準』的一種程度。資產階級的人以爲只要實現了自己的人格，就建立了一個經濟的角色，像一只脫節的腳。本能的東西和經濟的東西在他看來，似乎自然而然地二而一的，只有封建的角色在他看來是勉強而『人造的』。因此詩歌和故事還沒有站立起來：他們還沒有被分開出來。

在原始積累的時代，一切是流動而類似的。資產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創造出自己的精細的分工制度，來和文化的精細的複雜性相符合。在今日，心理學、生物學、論理學、哲學、法律、詩歌、歷史、經濟學、小說寫作、論文都是各種獨立的思想活動範圍，各自探索時莫不需要專門化，各自用的也是專門的語彙。但是像培根、伽利略和達文奇那樣的人並不專門化，他們的語言反映出沒有這種分化。依里薩白時代的悲劇中所說的一種語言，其範圍是極廣的，從俗語到崇高的言語，從技術的到敘述的言語，因爲語言本身還沒有所分化。

像一切偉大的語言一樣，這是付了代價的。丁但爾爲這語言喪了自己的性命；異教徒懷着死的恐懼去寫出作爲一個簡單明白的現實，而且直於寫詩的英國的散文體。在這些異教徒，這是一個宗教上的，而且也是一個革命的

這些習慣全了起來，竟復化成了一個新的計劃着可能底方案和故事。

莎士比亞若是在資產階級的發展開始時，不把資本主義矛盾的整個運動

，從龐大的成就一直到卑微的衰落都表現了出來的話，他不能達到他所達到的偉大。他的地位，他的封建的『遠景』，使他能够在一个時代裏統覽到在以後的時代中要分出來的，故而超出一次處理的範圍的所有的趨勢。●在羅

米歐和朱麗葉中顯出資產階級的愛情的溫潤上的新鮮，在安多尼和姑婆巴中顯出牠那致命的傾國的昏憲，或是在麥克俾斯，哈姆萊脫，里爾王和烏賽羅中顯出個人的人類意志在衝突中的場面，這都是不够的。他需要去嘗味那些渣滓，去預示出超現實主義和詹姆士·喬埃斯的時代而且去寫出雅典的泰蒙，來表現出資本主義的整個運動，這運動爲了要實現人類的精神而掃盡了一切封建的忠節，結果却只找到這個精神成爲金錢的囚徒——不是象徵地，而是用炙手可熱的精確來表現這個：

金子呵！黃色，發光，珍貴的金子呵！不，却是神明，  
我不是一個無聊的拜神者。一切之根，你使天空清朗！

只要這麼多就會使黑變白，使醜變美，  
使錯變對，使卑賤變高貴，使老變少，使怯變勇。

哈！你神明，爲什麼如此，你神明？爲什麼這

會把你的祭司和僕人從你的身邊拉開，  
把壯大的人的枕頭從他們的頭下面抽去；

給他們名銜，高貴和賞嘆，

會把宗教縫起而撕碎；祝福那被詛咒的人；  
使那發白的瘋癲病者受到尊崇；使盜賊有地位，

有着元老開議會；就是這個

使受打的寡婦再去嫁人；

病院見她的潰瘍而要嘔吐，這東西却以

油膏和香料使她回復青春。來吧，可詛咒的大地，

你人類的卑賤的淫婦，你使各國的民衆分了等差，我要使你做出

詹姆士·喬埃斯的人物們重複了泰蒙的經驗：  
倚應當極的事情。

在我們的被詛咒的天性中沒有平的東西，

只有直的無賴性。所以，去憎恨

一切的筵席，社交，和人羣罷！

和他類似的人，是呀，他自己，泰蒙都要蔑視。

毀滅，把人類咬住！

從依里薩白時代的詩歌的生命思想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死亡思想，是一個龐大的發展時期，但是在莎士比亞的戲曲裏一切都是包含着並且模糊地預示着。

莎士比亞在死的以前，朦朧而奇幻地企圖了一種非悲劇的解決，一種不用到死的解決。離開了資產階級文明的腐敗，在暴風雨的島上，人全關過寧靜而高貴的生活，獨自和自己的思想相對。這一種生活依然保留一種依里薩白時代的現實性——有一個被擗取的階級，即加力朋，野獸一般的農奴，還有一個只服務一時的『自由的』精靈——愛里兒，自由工資勞動者的領揚。這個天堂不能持久的。演員們回到現實的世界中去。魔杖斷了，可是在牠那純潔性和幼稚的智慧上，關於暴風雨及其魔術世界有一種惑人的本質，在這世界中『自然』的原力却被駕御了爲人們服務，這奇異地顯示了共產主義。

當原始積累逐漸產生一個分化的資產階級生產者的階級時，君主的意志在其絕對性上是一種創造力，現在就變爲反資產階級和封建的。一等到原始積累達到了某一點，那爲急迫地所希望的不是資本，却是一套條件，使資產階級能在其中實現出他的資本的發展。這是手工業工場的時代——和工廠的發展對立。

絕對的君主政體因大量賜予專利權的特權，變得和封建忠節的舊網一樣

地可厭。牠本身終究是封建的。在君主政體和匠人、商人、農夫和店主階級之間出現了一條鴻溝。

朝廷支持那早已成為寄生蟲的地主或貴族。他和朝廷聯合起來去剝削資產階級，而朝廷就用專利權，特權或特別捐稅來酬答他。這種種都阻礙了有壓倒多數的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這樣君王的意志就在原始積累時代過去了的時候，不再表現出資產階級在這階段的生命原則。

相反的，朝廷顯得是一切惡的源流。牠那閃閃發光的腐敗生活發出腐朽的氣味；卑賤和惡劣行爲都用絲綢來裹起。資產階級的詩歌變到牠的對立物那邊去，而以一致的運動像清教徒似地把自己的衣襟從那朝廷生活的污物那裏扯開。那原先是改良教會對於加特力教會的反動的運動，現在變成清教徒對於改良教會的反動。

表現君主的絕對意志和貴族的特權的教會，却遭遇到了不知道有法律只

知道有『精神』——自己的理想化的意志——的清教徒的個人『良心』。他的節儉反映出了原始積累一過去之後，累積資本的需要，自由和美德只能用『節省』，不能用窮奢極欲的盜竊來獲取。

敦思代表這過渡時期，因爲他是爲朝廷生活的淫佚和華麗所俘虜，他所受到的傲慢的待遇產生一種脫離牠的運動，進入了懺悔裏面去。這運動沒有完全。在敦思的晚年，縱然充滿着死亡思想以及對於人生的誇大的憎恨，肉體的驕傲依然在他的心上啃嚼。

詩歌從朝廷的集體生活引開，只能退縮到資產階級的私人書齋中去，裏面謹嚴地裝飾着，只爲幾個精選的朋友所分享，這種環境這麼地不同於朝廷生活在醒或睡時都有的那種公開性，以至於改革了詩的技巧。克拉蕭、赫立克、赫勃脫、甫亨——這時代所有的詩歌都好像是由那些獨自在書齋中寫作的羞澀驕傲的人所寫的——從朝廷生活中去向鄉間或是天堂懇訴。語言反映出了這變化。抒情詩不再變爲一個紳士能向他的閨女歌唱的東西；想像不再是能用朝廷上的談話投出去的東西。詩歌不再是向一班混合的聽衆吼叫出來的東西了。牠變爲一個有學問者的詩歌：學者的詩歌。詩歌是被閱讀，不被朗誦的了；因此牠有着與這相符的精妙和複雜。

但是色克林和勒父萊斯寫朝廷的詩，他們那一階級的簡單的坦白的詩。

他們和清教徒的詩歌對立起來，而維持依里薩白時代的朝廷抒情詩的傳統。

托惱爾表現了最後的朽敗，資產階級幻覺的第一階段的惡意的邪惡和意大利式的死亡。

### (三)

過渡時期向『革命』進行。資產階級以國會，自由和『精神』之名向君主政體和擁有特權的貴族反叛，而這所謂『精神』不過是向君主政體的意志挑戰的資產階級的意志而已，這就是武裝革命的時代，內戰的時代，隨之出現的是英國的第一個公然革命的詩人，彌爾敦。

文體上是革命的，內容上也是革命的。資產階級現在踏進了這麼一個幻覺的階段，把自己看爲反抗和孤獨的，而且向當時的種種權力挑戰。因之產生了一種人爲的而且有意識地崇高的文體，一種孤立的文體，在英國詩歌中最初的一種。

只能由整個人民的幫助而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往往達到一個他們感到『做得太過份了的』階段。資產階級的要求無限制的自由，一切都十分好，直到『無產者』也起而要求無限制的自由的時候，而這種自由却是要犧牲了『有產者』才能獲到的。於是一個克林威爾或是一個羅俾斯比爾就走進來強迫阻止了革命的進步。

這樣的一種資產階級的阻遏往往引起一種反動，因爲資產階級毀壞了自己的大衆的基礎。一個羅俾斯比爾讓位給一個『五人執政內閣』，再讓位給一個拿破崙；在一個較早的階段，一個克林威爾讓位給一個僧侶和一個查理二世。這輪子並沒有完全倒回來：因爲有了一个讓步。

在那些直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人，即清教徒看來，這個反動的最終階段是一種革命的出賣。故而在失樂園中，彌爾敦把自己當爲被壓倒的而依然有勇氣的，被詛咒的却依然是革命的撒但。在復樂園中，他已經棄絕了這個世界中的權力，以交換下個世界的權力。他嘲笑這個世界的廟宇和高塔；他的酬報是在下個世界裏，因爲他不肯讓步，因此這篇詩是失敗主義的，而缺少失樂園的那種崇高的反抗。在鬥技場撒參中，彌爾敦恢復了他的勇氣。他希望那一天他能把廟宇拉倒在他的淫蕩的壓迫者的窮奢極欲上面而把非立司丁人的朝廷一掃而盡。

他是不是有意識地把自己寫成撒但、耶穌和撒參的？只有把自己寫成撒參或許是有意識的。但是當他處理這個資產階級的主題，就是天性是善的

怎麼會到處是惡的，而說出這個爛熟的答案——由於亞當受了誘惑從天生的善墮落——的時候，他就不能不去考慮那誘惑者撒但以及他的墮落了。而由於撒但的掙扎顯然是一種革命，他就以自己的革命經驗去填進在裏面，就把那戰敗的革命者造成一個清教徒，把那反動的上帝造成一個司多德王室的人。這樣就出現了那撒但的聳入雲霄的身體，由於這意料不到的比例却顯出了彌爾敦的主題，《由不得他操縱》了。

在復樂園中，彌爾敦想要相信暫時的失敗是精神上的勝利，《日後》的勝利。但是彌爾敦是一個真正的主動的革命者，他在心中覺得這種精神上的滿足比真正的失敗更為空洞——如這篇詩的不滿足所顯出的。在鬥技者撒參中，他試把戰敗和勝利連結起來。

當然這種選擇在珂墨斯中已經決定了的，在其中那閨秀攻擊朝廷的奢華，而把她自己和人民的質樸的美德締結在一起。

我們要注意資產階級的幻覺已怎樣地稍微有些自覺的了。彌爾敦是意識地高貴的——莎士比亞決不這樣。依里薩白時代的人是英雄式的；清教徒却並不這樣，故而不得不穿上一種古式的服裝把自己看成英雄式的。這個臨時政府的拉丁文秘書的韻文和語彙很好地表現出了這個幻覺的第二個運動。這些詩篇的主題不能同時是崇高的而且在任何意義上要當代的。詩歌早已把自己和集體的日常生活隔離起來，這使散文的『故事』開始出現而成為一個對立的極端這一點，變為不可避免的。

當然這種從朝廷生活那裏的移轉，好像資產階級幻覺的任何其他的運動一樣，是在莎士比亞中預示出來了的。在暴風雨中，普洛斯班洛從腐敗的朝廷生活中退出，而走進他那島上的書齋的平靜裏面，像一個赫勃脫和一個彌爾敦那樣。莎士比亞退休到斯脫拉福·昂·亞馮去的時候，在生活上做了這同樣的事。

但是他在那裏不能寫作。他的魔杖是一種集體的魔杖。他把自己和朝廷的關繫打破了時，把這魔杖也打破，而他那幻想的有雲霧覆於其上的宮殿變成了空無。

## (四)

那繼清教徒的革命而起的那一種反動的時期的氛圍氣，是性質良善的大儒主義。那因之而發生鬥爭的極端的『理想』的那一種出賣，在大多數人看

長，顯得是以審慎出之的事情。不加束縛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的聽從，在理論上極好，可是在實踐上，對於那以此為口號的階級顯得有尷尬的性質。資產階級的幻覺經過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王政復古的階段。

這樣的運動是大儒主義的，因為牠是為了人生的理由出賣『理想』的結果。這運動是奢侈的，因為資產階級給了牠一頓重重的教訓之後又和牠聯盟的那一階級——即佔有土地的貴族階級——用不到節儉來獲得資本。這運動是集體的，因為回到了公共的朝廷生活和戲劇方面去。這運動在任何真正意義上並不是頹廢的；固然資產階級給了牠舊日的命運已定的階級聯盟——可是牠以新的生命給與了這個階級。表現朝廷的頹廢生活的韋勃斯脫讓位給表現朝廷的生氣的特賴屯。而特賴屯的變節生活是那麼和彌爾敦的正直不同，準確地表現出那時候資產階級的混亂而迅速的運動，從克林威爾到查理二世又從詹姆士二世到威廉三世。這是一個真正的聯盟——封建政權的回復是毫無問題的。詹姆士二世在那所謂『光榮的革命』中的命運，清楚地顯示了資產階級拿到了統治權。

詩人不得不從他的書齋回到朝廷去，但牠現在是一個更城市化了的，更合理的，不大浪漫蔚麗的朝廷。朝廷本身差不多變成了市民。語言顯出那同樣的從書齋移到倫敦的街道，從有意識的英雄主義移到業務的常識去的變化。那稍有裝姿態之趨勢的資產階級的宗派革命，變為合理的常人。這是從彌爾敦到特賴屯的過渡時期。敵對階級間的讓步理想化為『秩序』和『準則』——一種反動的熟悉的容貌——趨向到奧古斯都時代的概念，這時代一待『光榮的革命』顯出資產階級在這聯盟中操支配權時，由於不可避免的過渡運動轉到十八世紀的國家主義去。

這個像奧古斯都一樣的時代的自尊心，在事實上是特別相宜的。在羅馬的一個類似的運動中，愷撒扮了克林威爾的角色，奧古斯都扮了查理二世的角色；在那運動中，武士階級最初反叛了元老階級，當再前進要變得危險時，就走上了讓步和反動的一條路。

依里薩白時代的叛亂，即原始積壘的呼聲，就此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奧古斯都時代的穩健性，即製造時期的呼聲，個人主義讓位給良好的趣味。資產階級在其初期是需要粉碎一切的封建形式的，故而牠的幻覺是要把本能實現為自由。在這運動的進行中，先要獲得資本，然後讓資本有自由的運用，所以牠先倚賴君主政體——這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然後倚賴普通的人民——這

以彌爾敦爲代表。但因爲這是一個階級的利益，牠在其主張上不敢走得過份，因爲推進全社會的利益就等於否認自己的利益。牠不但一定要粉碎那些維持封建階級統治的舊形式，並且一定也要創造保障自己發展爲一個統治階級的新形式。這就是製造和農業資本主義的時代。那樞軸依然是土地，而不是工廠。

這個時代不但和原始積累時代對立，而且也和自由貿易時代對立。資本主義是存在的，可是無產階級還沒有十分存在。無數的匠人和農夫還沒有爲資本的運動所無產階級化；因此一定要由國家來助成這過程。廣大的資本主義時期（在這時期中，匠人的迅速的擰取把成千成萬的自由勞動者投到市場上去）還沒有來到。依里薩白時代的流民已經被吸收了。資產階級發見能使勞動力超過自己的價值的（即牠再生產食物和租金的費用）工資勞動的短缺。

因此就需要重重的法律來壓低工資和價格以及調整勞動，爲了要替資產階級獲得自己發展的條件。他現在看到他那革命式的要求自由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秩序、準則、法律、良好趣味和其他強加形式是必要的。傳統和因襲是無上寶貴的。現在封建的國家已經滅亡，這些束縛保障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自由貿易似乎成爲這時期經濟學家所想望的東西的對立物。資產階級的幻覺出賣了自己。

## （五）

所以，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詩歌表現出了製造業的精神，表現出了從事於製造的小資產階級，在擁有土地的大資本家的翅膀底下，產生了工業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粉碎一切的擴張還沒有開始。資本主義依然近乎那些以『保守爲生存的第一條件』，却還沒有完全進入『若不經常地改革生產手段就不能生存』的狀態中的經濟生活。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革命，可是好像一株需要保護的慢慢生長的草木，並不好像一處着火就使他處轟發的那一種爆炸。由於『光榮的革命』的讓步，擁有土地的保皇黨的貴族是準備給與這種保護，因爲他們本身已經資產階級化了。

只是在農業和工業資本主義間的分裂因工廠的崛起而發生時，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裂痕才開始在資產階級的幻覺上起了一種決定的作用。當毛

階級之間沒有直接的對立：要等到毛織工廠變成棉織工廠，原料要倚賴外面的來源時，也要等到牧羊業在澳大利亞發展並且供給英國工廠的羊毛時，農業和工業資本主義間才發生了直接的對立，在工業家那一方面這最後表現爲一種對於自由貿易的要求以及『五穀法令』的廢止。

樸普的詩歌，和這詩歌的『理性』——在奇特地簡單而膚淺的範疇內活動着的，可是準確地活動着的一種理性——同着牠那光潔的語言，格律和簡略的對句，反映了資產階級幻覺的那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資產階級的自由不能不是『有限制的』——人一定要在他的要求上審慎從事，可還沒有絕望的理由，一切都順利進行。人生是在高層上，可是要操急則不可能。外在形式的強加在心的上面，是必要而且接受的。因此十八世紀的英雄排句的雅緻的緊身衣，和依里薩白時代的無韻詩的天然的繁茂成了對照；那無韻詩的小枝條幾乎掩藏了在那裏的抑揚節奏的骨格。

樸普完美地表現了在製造業時代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聯盟的資產階級的理想。

甚至於現在詩人本身並沒有化爲資產階級的生產者，注意到這一點是重要的。他還沒有替自由市場生產。在莎士比亞時代幾乎是朝廷或是貴族的一個官員的詩人，在繼來的時期中成爲一種牧師或學者的職業，而且甚至於在樸普那樣晚遲的時候，詩人也倚賴於贊助，那就是說，在樸普時代替牠作發言人的階級，詩人和這階級有着一種『族長式的』或『田園式的』關係。

這樣一種『田園式的』關係意思是說，詩人寫作非田園式的詩歌。他仍舊看自己爲一個扮演着社會角色的人。原始時代的詩人是這個樣子的；樸普也依然如此。這在他身上加上說他的雇傭者或是同類詩人的語言的義務——在原始部落中這等人構成整個部落，在奧古斯都時代的社會中這等人是形成他集體性的。牠所講的多少是通行的語言，詩人爲那些直接在他心中的聽衆寫作，他或許會立刻向他們讀自己的詩，因此能够看出牠們的效果來。詩歌在他看來還只是一首詩——一件自活自存的藝術作品——却是一種從作者到讀者去的運動，好像在一齣公演的戲劇裏的情緒的運動或是在人的心靈中的一个詩神的運動。因此他覺得自己在扮演着一個社會的角色：人道的激勵者或是人類奮鬥的重整者。他還沒有變成一個自覺的藝術家。

# 論社會思想

童止齋

## 一、社會思想的發展道路

人類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實際就是不斷改變自己生活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制度）的鬥爭過程。在長期的鬥爭活動中，人類不但經常變化自己的本性，而且還不絕發展自身對於客觀環境的認識能力。當社會鬥爭顯得特別緊張而繁複的時候，人們對於社會存在和歷史發展的認識，就表現得異常重要，並且這種認識也會不斷向前進展，日益顯得廣博而深刻。但是人們的認識社會存在與歷史發展，並非彼此一致的；生活在各種不同社會環境中屬於不同階級的人，對於社會與歷史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願望。大致說來，屬於支配者羣依靠榨取而生存的人們，總是企求維持現狀，或者幻想復古，而極力反對任何變革；在相反的一方面，站立着被榨取壓迫的人羣，他們或者對現存社會制度表示怨望，或者要求打破現狀，改善環境，而不斷對榨取制度與壓迫組織抗爭。因此階級利益決定了不同人羣的社會與歷史觀。

然而，人們對於社會與歷史的認識和態度，雖則主要是決定於階級利益，却並不是說，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們可以產生絕對一致的同一模型的社會觀與歷史觀；在另一方面，也並不是說，出身某一階級的人絕對不能表現和他自己原來所屬階級的利益相違反的社會觀與歷史觀。因為屬於各階級的一切人，都是在各種具體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的能動體，各人的生活圈子和教育條件在不斷變化中，使他和實際接觸的無數偶然因素在經常影響他，推動他；同時各人對於客觀環境的影響和推動所發生的反映與反應也並不一致，這就是說，人們一方面要受具體客觀存在的決定和限制，另一方面對客觀具體環境也會表現相當的能動性與反作用。因此在社會認識的發展過程中，屬於各個階級和同一階級的人，都可能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觀與歷史觀。同時各種有系統的社會觀與歷史觀，在起初總是通過少數人的學說與行動表現出來，影響社會，然後隨着這種影響的擴大，而轉變為一定的羣衆思想與羣衆運動。當它在客觀上代表一定人羣，或者更確切地說，代表一定階級或階層

而形成爲一種獨立的思想力量或意識形態的時候，當它在客觀上表現了一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與要求的時候，就成爲一種「社會思想」。一般地說，社會思想是受着特定的歷史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尤其是階級條件的決定的。

廣義地說，社會思想乃是各個時代各個階級在社會鬥爭中表現出來的一定意識形態，包括對於社會存在和歷史發展的認識和理想。不過，在這裏，我們所要重視的，是關於現代社會改造的思想，即是不滿意現存社會體制而要求用一種新社會來代替舊社會的理想。這類思想雖則有許多不同的傾向與流派，有的是科學的，有的是空想的，有的是改良主義的，有的是革命的，但它們在趨向於反對舊社會而企求爲人類生活找尋新的道路一點上，是共同的（反動的保守的『社會主義』如封建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等當然除外），因此它們已經不是一種尋常的社會意識形態，而是有關歷史改造的思想系統或社會理想，如果要給它們加上一個帶有歷史意味的概括名稱，便是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

不過，社會主義思想並非一開始就完成了的，也不是任何社會主義學說都能正確地代表歷史發展的真理。當社會經濟條件和社會階級矛盾，尚未發展到足夠顯示歷史變革之真實路向的時候，當社會革命的主動力尚未十分強大起來，足以成爲偉大歷史使命的擔當者與完成者的時候，一部分不滿意現存社會制度的思想家，只能矇矓地看出現存社會的不合理性，只能虛幻地思索出描寫出未來的『理性王國』，這類社會改造思想在羣衆鬥爭實踐中，經

尋求完美的社會組織。往後，在社會鬥爭的發展過程中，就逐漸泯除了初期社會主義的思想氣氛，社會主義思想日益與實際的社會鬥爭連結起來，發展成為社會革命學說。但是在過渡時期，這些學說仍然不會把握到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發展的真實法則，不能依據這種法則的認識去規定革命行動的方針與策略，不能確切了解近代新興革命集羣的歷史任務與歷史出路，所以它們雖然從初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跨進了一大步，可是還沒有擺脫烏托邦色彩，有時還流露了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傾向。直到空想的和半空想的社會主義在社會鬥爭的現實中，證明了它們不能作為新興革命集羣解放自己和變革歷史的有力理論，經過了社會鬥爭的千錘百鍊，一種代表進步人類的科學的歷史觀與社會觀才出現了，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它是空想社會主義和半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連續性中斷，是人類思想的一大飛躍。科學社會主義是繼承和吸收過去思想史上最有價值的思想傳統而建立的，但絕不是把過去有價值的思想單純地累積起來或綜合起來，而是根據歷史過程與現實社會的科學分析，根據社會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方面把過去的思想加以改造，他方面融化豐富的歷史材料，並且由其中發見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法則，找求社會鬥爭的正確道路，這樣才從豐富而生動的歷史經驗與革命實踐中抽出了社會變革的科學結論。而且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身也不是一次完成沒有發展的東西，它是隨着人類歷史和社會鬥爭的不斷推移，跟着社會革命運動革命經驗不斷豐富而在隨時向前發展的。因此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到了帝國主義時期與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就進展到更高階段，成為列寧主義。只要人類歷史是不斷在變化進步，只要社會革命鬥爭在不斷往前開展，科學社會主義無疑將還要豐富下去，發展下去，即是添加許多新的內容，反映未來新的現實。

## 二 社會思想的階級性、黨派性與

在有階級的社會中，一切思想和學說都是有階級性與黨派性的，反映階級矛盾最尖銳的社會主義思想自然更是如此。雖則社會主義在發展的總趨向上，是表現出近代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的，但並非任何時代任何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代表近代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古代和中世紀的社會主義思

一致。即是由同一學說出發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因為階級與黨派的分歧，而分化為許多不同的互相敵對的流派和觀點。馬克思與恩格斯曾把社會主義劃分為若干不同的營壘，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左右，英法代表貴族的偽善者，因為嫉妒資產階級的勝利，起來對資產階級的榨取制度與統治制度表示譏刺與控訴，並且極盡裝腔作勢之能事，彷彿他們是代表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說話似的，以冀引起勞苦大眾的同情。他們的『社會主義』完全是立足於反動立場上，因為他們攻擊資本主義及對勞工階級表示虛偽的同情，只是為的要造成一種反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以便恢復反動的封建專制局面。又如一部分教會的禁慾主義的僧侶們也提倡社會主義，熱烈反對私有財產，婚姻制度與國家組織，主張用慈善，布施，獨身主義，禁慾，寺院生活來代替它們；這樣的『社會主義』也是跟貴族的反動的社會主義合拍的。還有些文人完全以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來對資產階級社會實行批判，並且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同情於工人階級，但要求恢復小私有制度與小生產制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復古的社會主義。更有些人站在小市民的利益上替專制主義鼓吹反資產階級自由運動的論調。他們打起超階級無黨派的旗幟，玩弄一些哲學的詞句和仁愛的字眼，一方面反對自由資產階級，他方面打擊革命無產階級，其實完全是為反動的專制王朝張目，這種傾向的典型代表就是十九世紀德國的『真實社會主義』（以赫斯，格爾等為代表）。此外還有一些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希望矯正一部分社會弊端，以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繼續存在。他們要是為了勞動階級利益，實際上則是要延長和鞏固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並緩和勞工階級的反抗，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所有這一大堆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都是反動的，保守的，他們不是要回復到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社會或小生產制度，便是要維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安然存在。

在顛覆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伴隨着資產階級封建貴族鬥爭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力量的生長，曾經出現了革命的但同時又包含反動性的社會思想，如十七世紀在英國以李爾奔為代表的平均主義，和十八世紀末在法國以勒克雷爾和耶克·魯為首的瘋人派均富主義，都屬於這一類，此等思想正反映着無產階級自身的幼稚脆弱和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缺乏，所以當它

文等起來各自創立空想的社會主義學說，他們對資產階級社會作了尖銳的批判與攻擊，對被壓迫的勞動階級表示熱烈的同情。然而他們都不是直接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家，只是把後者當作貧窮而不幸的人羣看待。他們「固然看見了階級的對立以及現存社會內部解體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却沒有看到無產階級的歷史獨立及其固有的政治運動」（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只是一味對未來社會作幻想的描繪，而自認為超越於階級矛盾之上，拒絕階級矛盾與革命運動，把一切社會問題都還原為人性問題。這種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在客觀上雖然是與資產階級敵對而傾向於無產階級的地位改善，但却不能成為直接代表無產階級的社會學說，而與勞動大眾的革命運動聯結起來；這正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成熟，無產階級尚未成長為力量壯大的自爲階級。時代與社會條件、階級條件限制了啓蒙社會思想家的眼界，使他們無法看到社會發展的規律與真實的歷史遠景。

啓蒙階段的空想社會主義，往後為許多學者與社會運動者所繼承，其中一部分人是死守師說，企圖削弱和調和階級矛盾與社會鬥爭，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如布郎葵、威特靈等）却在革命實踐中對初期社會主義思想注入了革命內容，使之與實際社會運動聯繫起來，這些人不但相當發展了啓蒙的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在其思想上和行動上是傾向於革命無產階級，在某些地方接近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雖則如前所說，他們還沒有擺脫烏托邦主義的色彩。還有一部分人（如路易·卡貝等）儘量使過去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革命小資產階級的願望適合起來，反對武力鬥爭與革命行動，而企圖經由和平與民主的方法去改造社會。因此同是從空想社會主義的傳統出發，却分化為各種不同傾向，這主要是要用階級性和黨派性來說明的。

直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創立之後，革命無產階級才有了自己完全獨立的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和行動指針。科學社會主義不但同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勢力作決絕的鬥爭，而且打擊了一切改良主義與僞善主義，批判了一切空想主義和人性主義。它絕不將無產階級的希望引到虛無縹渺的烟雲中去，而是把客觀的歷史法則，特別是資本主義轉變為對立面——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揭露出來，證明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出路，是和人類歷史發展的要求和路向一致的。無產階級所走的歷史道路，也就是整個人類歷史向前進展的道路。無疑的，這個最高的人類思想成就，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壯大時期的產物；由於它從科學立場表明了社會發展的法則性與無產階

級解放的必然性，指證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廟宇是建在獨自歷史第一至

，所以它是百分之百代表自覺的無產階級的。

但是在本質上代表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在階級頑抗的劇烈發展過程中，除了為忠實於無產階級解放的堅貞戰士所繼承所發揚光大之外，還不斷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歪曲，所閹割，使之完全庸俗化。列寧就曾沉痛地指出過：『當偉大革命家還活着的時候，壓迫階級總是對他們加以殘酷的迫害，……可是等到他們死去之後，……就在他們的姓名上圍繞以光圈，以安慰被壓迫階級，而實際目的却在欺騙他們，同時閹割了俗化了他們的革命學說之實質，磨鈍了他們的革命之鋒芒。』就是原來自命為馬克思主義信徒者如伯恩斯坦，考次基，普列漢諾夫之流，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緊要頭，也會背叛和俗化科學社會主義，塗污了它的真實面目，歪曲了它的革命精神。這些變節者不過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

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因為被反動家和變節者所歪曲，所背叛，而萎縮下去；恰正相反，這一光輝的真理系統，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由始終堅定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所承續，所發揚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僅珍重科學社會主義的遺產，保留着它的革命精神，並且將這份遺產從理論上與實踐上予以充實和發展。經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證驗和試驗，科學社會主義是日益朝向統一的坦平的道路邁進，逐漸克服一切俗化和歪曲馬克斯學說的傾向與企圖。

不論將各種不同社會思想作一番歷史的考察，或者作一番比較的研究，都不難看出它們總是尖銳地代表和反映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從封建貴族，僧侶經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直到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的，它們或者是有意識地為某一階級或階層說教，或者是無意地為某一階級或階層辯護，總之在客觀上都是帶有一定的階級性和黨派性的。而由於各時代的社會條件與階級條件不同，屬於前後不同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在內容上當然也表現很大的差異性；從質地方面來說，愈到後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與革命性是愈加發展，愈加結實。因此，社會主義又是很明顯地具有時代性的，不過時代情形並不一樣。正確地把握住各種社會思想的階級性，黨派性與時代性，及其相互間的有機聯繫，這是為研究任何社會學說或社會主義必需的方法。如

果離開了階級的觀點，抽象了一切時代條件和政治經濟條件，來考察社會思想的發展與現狀，或者故意表示超階級，超黨派，超時代的『公正』態度，對社會思想作所謂『客觀研究』，那非但絕對無法了解社會主義的實質，而且有走上庸俗反動道路的危險。

### 三 社會思想與人類實踐

一切學說或理論都不能從實踐分裂而獨立。社會思想既是在長期的社會鬥爭中不斷產生出來，鍛鍊出來，又能給予社會鬥爭以重大影響，自然與實踐更分割不開。任何一種社會學說絕不是全靠個人頭腦冥想出來的，即使是純粹空想的社會主義，也是反映着當時的社會內部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之運動與發展。不過，並非同一時代的社會思想對於當時客觀社會情況的反映是完全一樣的，由於各國各地的社會經濟條件與階級敵對狀態不同，由於各階級各階層的利害與要求映照在各人的認識過程中並不一致，同時由於社會思想家各人所處的生活環境和所接觸的實踐與意識圈子彼此相異，所以在同一時代，也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流派。指出社會思想為一定時代的社會狀況之反映，只是就社會思想與社會現實的具體關聯來說，實際上，這種反饋過程是極曲折極複雜的。當我們研究某一種社會思想的時候，除了要從當時一般的社會經濟諸條件和階級矛盾狀態中找出它的根源外，更要溯究這種思想產生的特殊背景（社會思想家的生活環境與實踐活動的變化）與特殊泉源（過去與同時代的文化業績與學說思想對於社會思想家的影響）。

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以至全部的人類鬥爭實踐，在歷史內在發展過程中，是密切地相互關聯的契機。每一次革命運動和社會戰役，總是刺戟社會思想向前進步，或者是使過去的社會主義學說更加豐富，更加深化，或者是引起新的社會主義學說誕生。在另一方面，每一次社會思想的進步與深化又可以在社會鬥爭中，轉化為物質力量和羣衆運動，推動革命鬥爭的往前發展。例如法國大革命產生了巴貝夫，聖西門，傅利葉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歐洲勞工運動的發展哺育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而當空想社會主義為布郎葵、威特靈所繼承所發展之後，會使勞工革命運動受了相當的刺戟；當科學社會主義為廣大工人羣衆接受之後，歐洲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第一國際馬克思派和第二國際左派所領導的反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就逐漸成熟，而足起勞工革命運動的上升。以後由於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背叛，

科學社會主義一時給塗污，給歪曲了，但是經過了列寧對社會改良主義的情鬥爭，科學社會主義的光燄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始終是照耀不熄，終於促成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浪潮的一時高漲，這種無產階級的勝利和攻勢反轉來又加深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內容。這一事實完全說明社會思想斷不能把它從社會鬥爭的實踐過程切離開來，必須了解，在社會思想中凝結了社會鬥爭的因素，而社會鬥爭又包含了社會思想的培基。

不過單是懂得社會思想和社會鬥爭的相互關聯是不夠的，我們還得進一步認識，革命實踐對於社會主義理論始終是占着主導地位，不但一切社會思想都是從社會鬥爭中生長出來，而且社會思想一經與廣大羣衆接觸，就會轉化為實踐力量和社會運動。我們要衡量各種社會學說的價值，主要地要看它是否符合於革命人羣的利益和要求，還是充當革命的武器，抑或成為反革命的工具。

### 社 建 的 秘 密

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範圍內所遇到的敵，不僅和它在其他範圍內所遇到的相同。經濟學研究的材料，含有一種特殊的性質，那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成為自由的研究之敵。例如對英國國教會。你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了他三十八條倒不要緊，他也許還會原諒你，但若你在他的收入中，奪去了他的三十九分之一，他一定恨你入骨。在今日，與批判舊財產關係的批判論比較，無神論還是比較輕的罪。

（摘錄資本論序言）

# 東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對農村經濟研究會演講詞——

今天我要說的，是關於東西文化問題。

這是一個老問題，而且時常引起辯論的。諸位雖然專門研究農村經濟，對於中國一般思想的動態，我想，也是常常注意。那麼，諸位自己一定也考慮過這個問題，或者參加了這個問題的討論。

我先拿這個問題的歷史說一說。以前中國人看不起一切非中國人，連西洋人在內。我們的祖宗視西洋人爲夷狄，同四周那些較野蠻的民族一般。他們當然沒有什麼文化同我們天朝大邦的文化並論的。這種態度，舉一個例，可以從鏡花緣小說看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吃了幾個敗仗，知道西洋底堅甲利兵的確比中國好，於是那些中興名臣，左宗棠，李鴻章等，便要開辦船政局，兵工廠，鐵路之類。此時我們不過承認工業交通軍械方面，西洋人比中國強而已，至於政治社會制度，以及道德宗教文學思想之類，則我們仍是高出西洋之上的。甲午戰敗，中國人又進一步覺悟，連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西洋也高出我們，因爲日本除了工業製造以外還學了西洋的政治社會制度，以此能戰勝我們。康有爲，梁啟超便根據這個理由主張變法。此時嚴復翻譯了西洋社會學，林琴南翻譯了西洋文學，中國人才知道西洋人并不以前所想像的那麼野蠻。但是康梁一輩人仍舊認爲，在精神文化方面，即道德，宗教，以及很精微的東西，西洋總不如中國。後來，由維新到了革命，革命黨比康梁進步多了，不但要變法，而且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可是革命黨仍舊認爲在精神方面，中國究竟勝過西洋。張之洞葉德輝一班人曾提出一個有名口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個口號可以適用從李鴻章起直至五四運動時代以前中國人的中西文化觀。因爲「體」「用」二者的界限，本是很確定的。到了五四運動，中國前進的思想才把張之洞這個名言打破了。無論從精神方面來說，或從物質方面來說，西洋人都比中國更高些。

不過舊的思想，五四以後還繼續存在，而且趁運動衰落時候抬起來。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以後一二年鬧的是反封建問題，白話文問題，社會主義問題，一二年後就是東西文化問題了。提出這問題的是梁啟超和梁漱溟。這是對於五四運動的反動，同時也迎合了世界反動潮流，因爲第一次大戰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感覺沒有出路，都望着東方援救他們，他們也讚美起東方文化來了。東西文化問題成來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的題材。所謂科學與人生觀辯論可說也是這個問題的變相。除了五卅運動以後二三年，中國論壇上不斷地有此問題討論。抗戰以前不久，我們還在熱烈討論甚麼『中國本位文化』哩。

以上，我說的是歷史的事實，我想這些事實，諸位都已知道了。

諸位一定也知道，中國除了主張『全盤西化』一部份人以外（例如胡適之）凡討論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問題的人，無論主張如何不同，都認爲東方文化畢竟有一種精微的原素，爲西洋文化所沒有，而且所不及的，而且永遠不能及的。

我不屬於這個意見。我不承認東方文化高於西方文化，而且本質地永遠地高於西方文化。但我不否認東西文化，確有不同之點。不過這個不同之點是可以解釋的。以前有許多人解釋過。今天我也來解釋一下。諸位以後可以看出，我的解釋是與諸位研究的農村經濟有關。

東西文化之不同，是由於東方和西方歷史發展之不同。我們看近代統治世界的民族，無論此次戰勝的英美俄法，或戰敗的德意等，都是屬於西方文化系統的，至於不屬此系統的人，則大多是東方民族，阿拉伯，印度，中國。這些國家本身無論如何差異，的確有個共同的文化精神，如那些東方文化家所指出的。譬如保守，安命，服從，重視精神，輕視物質等等。那麼這些

唐虞世

東方民族歷史發展上究竟有甚麼共同點，才會造成這種文化共同點呢？別人的解釋暫且不管，我的解釋是說：西方歷史發展上有個城市和市民階級因素，東方歷史發展上則沒有這個因素。

這話需要詳細說明。我說中國古時沒有城市，因之沒有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大家一定要反駁我，因為中國古時歷史和文學不是常常提起城市麼？不是常常提起富商巨賈麼？他們不是市民階級是甚麼？

但是學過西方社會發展史的人，都可以明白，從中古以來，在歷史上佔很重要地位的『城市』，法文所謂 Commune，中國歷史並沒有。西方，與地主和農民合成三角鬥爭的市民階級，中國也沒有。試舉一個例。現在上海最高的行政長官，是『市長』。但是中國何時有市長呢？這是北伐成功以後才有的。以前中國官制中並沒有『市長』一級，不僅沒有其名，且沒有其實。不錯，北伐前不久，孫傳芳會任命丁文江在上海做着像現在市長做的職務，但那時是稱為淞滬督辦，不稱為『市長』。可是西洋『市長』有了多少世紀的歷史！在以前和現在，市長又是何等重要！中國以前沒有市長，這就是最明白的證據，證明中國以前沒有西洋式的城市。中國舊式城市乃是一種行政和軍事的中心，并非西方意義的城市。

諸位關於西洋社會史知識一定是很不足，無需我解說，但爲了把問題弄得更加清楚起見，我想說一說西洋的城市。

封建社會初期，西洋也沒有城市，後來一些自由農民或解放的農奴，在地主宮堡週圍定居下來，離開農業，專營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漸漸發展，這些人底力量漸漸大起來，漸漸能够團結，在當時鬥爭的兩大階級：地主和農民以外形成一個第三種勢力。牠同農民衝突比較小，因爲牠的基礎是建立在工商業上，而非在土地上，但同地主，尤其本城地主衝突更大。地主起初視他們如自己的農奴一般，可以隨意剝削和壓迫，但是他們的經濟力和團結力使得地主感覺難於對付。漸漸地，他們迫使地主讓步，求得自治，能够自己選舉『市長』來治理本城。有些城市，甚至趕走本城地主（公爵或伯爵），而建立共和國，如佛羅倫斯，威尼斯之類。中古後期以及近世初期，歐洲歷史充滿這類鬥爭。農民戰爭是有一定的時間距離，市民階級鬥爭則幾乎沒有停止過。城市愈來愈勝利，市長權力愈來愈大，市民愈有團結，財富積累愈多，科學發明愈日新月異，結果諸位知道，就是英法德諸國的資產階級革

我們試看中國歷史上有這種城市麼？有這種市民鬥爭麼？沒有！即使有人能在念五史之中考證出中國也有這一回事，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同沒有是一樣。

不僅中國而已，其他東方諸國也是沒有這種城市，最近我讀了威爾基的『天下一家』，我想諸位都已讀過這本書罷？其中說起他到中東諸國考察，得到了一個結論，說是：中東各國沒有中層階級，非極少數異常富裕的地主，便是全無財產的人民。『創造的鼓勵和力量，向來不會從資產太多的人們或一貧如洗的人們發生出來的，而在中東是沒有中間階級的。』現在還是如此，以前更可知了。

爲甚麼西方有城市，而東方沒有城市呢？原因是複雜的，但有一原因是重要，必須指出，即是：西方有一種幸運，自從抵擋了阿刺伯回教徒南來的攻擊和成吉思汗東來的攻擊之後，歐洲內部就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了，即使戰爭激烈，破壞性大，也限制於局部並不普遍於全洲。我們知道全歐洲那時也不過像中國一般大，在我們中國，則每次大亂都是普遍全國的，至少全國各部都受致命的影響。戰爭小，鞏固了城市底基礎，城市力量大也限制了戰爭或其破壊性。

但無論如何解釋，東方發展上和西方發展上有這個因素不同，則是歷史的事實。這個事實對於兩種文化往後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西方歷史，是地主，市民，農民，三階級鬥爭的錯綜混合。市民底經濟基礎不是土地，而是工商業，貨幣。當時財富分爲土地和貨幣兩種，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階級。界限分明，地主不屑經營工商業，而非貴族的市民，則依封建法律不能領有土地。禁止土地自由賣買的法律，維持很長久，須待法蘭西大革命來廢止牠。因爲市民積累的資本可以投資於工商業，於海外市場，不很迫切需要土地，他們與地主的衝突則是在於其他的方面，即要求廢止封建法律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所以在西方，土地問題可以說是地主和農民的問題。農民要求土地常常是動起來，但失敗的多，如果勝利，那必須得到城市階級，即市民階級的援助，市民階級援助農民求得土地，主要是爲了打擊地主階級，迫使讓步，廢除或修改那些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和習慣。到了最後，就把整個地主階級推翻了，而繼承牠的政權和遺產，連土地在內。

東方則不然。我們就中國歷史來說罷。中國祇有兩個階級：地主和農民

的鬥爭。中國有行政的和軍事的大城市，現在留下的大城市，除上海，天津，青島等，係通商以後開放之外，都是舊時行政和軍事中心，如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等，沒有一個是爲了經營工商業而建立和繁榮起來的。大帝國中央政府派來的總督支配一切，不容許其中工商業家反抗。中國舊時有工商業家，但沒有西方意義的市民階級，即是說，那些工商業家祇是自在的階級，而非自爲的階級，即不能團結一致，又無完成的階級自覺以對抗封建貴族，因此資本主義發展條件沒有保障，這反過來又減低了工商業家底地位。他們即使積蓄了資本，也要拿很大部分投放在土地去，認爲土地比較工商業更加安全些。於是城市富人也成了地主，他們向貴族地主委屈求全，貴族地主也對他們相當讓步，漸漸容許土地自由賣買。所以中國沒有第三個階級參加鬥爭。如西歐那般有組織的市民階級。

兩個階級鬥爭和三個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發展有完全不同的影響。即是三個階級鬥爭的社會能進步，有出路；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地主，把封建的生產關係改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此後就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歷史又是進步的，又有了出路。可是東方，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鬥爭的社會就不同了。這個社會沒有出路。鬥爭結果兩敗俱傷。以中國爲例：中國每過幾百年，矛盾積蓄得不能忍受下去，於是爆發農民革命和戰爭，殺了無量數的人，然後天下太平了，即是說人口稀少了，土地足夠了，於是從出發點再開步走，再積累矛盾，以至再爆發的時候。每次矛盾如此之烈，爆發力如此之大，中國農民雖然沒有城市階級之領導和援助，也是能够勝利的，可是勝利之後怎樣呢？得到勝利果實的，不是農民自身，而是另一種地主，或者由農民中間少數人變成的地主！陳勝吳廣，赤眉，黃巢，韓林兒，闖獻，以至洪秀全！中國歷史好像走馬燈般，週而復始的，雖然並非完全一樣。但沒有出路是一樣。所以，給人的精神的影響，是世界，歷史，沒有進步。三國演義第一句是『天下分久必會合久必分』。某筆記小說想像一個故事，說是有個人做夢到世外一個地方去，看見一本大書，記載着他幾萬年前會來此一次，穿的衣服，說的話，行的事，同現在一樣。再幾萬萬年前，又曾來此一次，一切也是一樣。這個故事，印度也有，多半是從佛經或別的書抄來的。走馬燈般的歷史怎麼能算歷史呢？怎麼有進步呢？人類怎麼有前途呢？難怪有釋迦和老子。東方文化底根基就在這裏。

但是同我今天來這裏更有關係的，是另一個問題，即東方歷史發展下的

### 土地制度問題。

中國土地不僅是地主階級所有，而且是工商業家所有，工商業家除土地外又在鄉村放高利貸，因爲他們既無西方式的市民地位，既無城市爲其堡壘，祇好拿大部份資本投放於土地了。這一方面促成了土地商品化，他方面又使得土地問題比西方更難於解決。諸位學過土地問題解決史，總知道西方各國解決土地問題時，都是一個城市階級領導和援助農民，但在中國土地問題歷史上則不見有這個階級行動。這是很可注意的問題。

現在中國也有西方式的城市了，也有西方式的市民階級了，雖然不是自己歷史有機發展起來，而是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後才發生的。我們現在也有市長，雖然與西方的市長不很相同。這總是好的現象，可以打破走馬燈式的歷史。我們看見洪楊運動並不能推翻滿清政府，如同闖獻推翻明朝一般。論形勢，即論中國歷史類比，洪楊是綽有餘力來推翻滿清的。諸位知道，誰打敗了洪楊麼？不是滿清政府，也不是曾左彭李，而是上海及其帝國主義的力量，當李秀成佔據江南全境祇餘鎮江和上海二城未攻下時，李鴻章主張以上海爲基礎去恢復失地，但那些讀熟孫子兵法的人則反對他，因爲海濱是絕地，沒有退路。結果李鴻章勝利了。可見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孫子兵法有時也是不能適用的。

中國歷史走馬燈式的發展，到了洪楊就終止了。從此以後中國有了城市，有了市民階級，牠在國內戰爭中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到了緊急關頭就出來幫助地主階級打敗農民。

洪楊如此，現在更可知道了。原來，在西方歷史上，農民是沒有獨立的政治作用的，農民戰爭若是沒有城市某階級領導，便不會勝利，在法國革命中，領導的城市階級是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則是無產階級。這是西方社會科學獲得的金科玉律，是經過無量數犧牲而得到的寶貴教訓。這個金科玉律，在中國的現實看來，則仍是千真萬確的。

以前，中國及一般東方國家，歷史發展是與西方不同的，以後則漸趨於相同。歷史發展既然相同，就將沒有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區別了。所謂區別並非兩種文化互相調和之意，而是西方文化排除了東方文化，即積極的樂觀的進取的精神排除了消極的悲觀的後退的精神之意。

#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碧雲

瀰漫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已由原子炸彈的爆發而熄滅了。但這一燎原的火災，會焚毀了千百萬間的房舍，破壞了無數的生產機關；使地面大大改變了面貌；吞滅了無數少壯的男子，使千百萬的婦女和兒童變成了寡婦孤兒，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何等巨大的災難！

## 一大戰發生的原因及其性質

這種殘酷無比的專門從事屠殺和破壞的戰爭，究竟爲了什麼？它的根因究竟何在呢？這是我們即在事後也還不能不加以檢討的。假若我們不了解這次大戰發生的原因和性質，那我們就無法從中獲得教訓，替人類的未來找到一條正確的路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是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的戰爭。換句話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和擴大。顯然地，在上次大戰中，一方面是協約國，英帝國主義所領導的集團；而另一方面，是同盟國，德帝國主義所領導的集團。它們之間所爭的是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以及非洲等殖民地的獨佔權。戰爭的結果，戰敗的同盟國割讓了本國的和殖民地的土地給戰勝國。戰勝國中，尤其是英法完全達到了它們搶奪的目的，獲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大奏着勝利的凱旋。從此世界的市場重新分割了一次，但同時也就從這次分割中，埋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

戰敗的同盟國，尤其是德國，不僅剝奪了它的殖民地，解除它的武裝；還要迫使它付出鉅大的賠款，長期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但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究竟很高，因而很快的就恢復了起來。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後，重整軍備，企圖恢復殖民地，重新分割世界市場的野心日趨強烈。意大利在大戰中沒有得到多少東西；它在戰爭中雖站在協約國方面，但在要求殖民地這一點上，與德國是一致的。至於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次大戰中，會乘機攫取了鉅量的財富，霸佔了中國大部分市場，它的生產力獲得了大大的發展，因而它要求奪取殖民地的慾望也就隨着迫切起來，不斷地向中國進攻，企圖併吞

整個的中國。同時墨索里尼之進攻阿比西尼亞，希特勒之攫取捷克，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必然發生的根因和導火線。果然，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侵入了波蘭，而英國爲了保持自己的帝國主義特權，也於第三日對德宣戰。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從此展開於這個歷史舞台。

根據以上的各種因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製造這種戰爭，指導戰爭和鼓吹狹義愛國主義的人，都是有一定的目標的。這種人，不用說便是帝國主義者。自從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最末階段的垂死時期，它爲着苟延殘喘，只有拚命地強奪殖民地。但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殖民地是有限的，而帝國主義的野心是無止境的。於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爭奪戰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了。這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要避免戰爭的災禍，只有把資本主義送進歷史的博物院裏去。

## 二、二次大戰世界婦女所受之痛苦

在殘酷無比的這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國家，將絕大部分的物質力量，消耗於製造軍用飛機，兵艦，坦克，大砲以及一切殺人的利器上面。將爲人類服務的科學，拿來作爲製造摧毀人類文明，毀滅生命的工具，這是何等矛盾的現象！據這次大戰後所發表的統計，死傷的人數，在五千萬人以上，這又是一個何等驚人的數字！至於耗費在戰爭中的軍費以及其他因戰爭直接或間接所受的損失，其數目之鉅大，是無法統計的。由這種情形所獲得的結果，首先就是社會的一般生產力和文化的破壞。其次就是減低人民生活的標準。歐洲參戰的幾個國家，如德，法，意，蘇及中歐南歐許多小國，糧食的恐慌以及營養物的缺乏，是令人不能想像的。尤其是德國，爲着充實軍備，早在大戰尚未爆發的幾年前，就限制人民的糧食，減少肉食和牛奶的分量了。戰爭開始則完全取消牛油，僅以白麵包洋山芋等物來充飢。而在戰爭後期中，人民生活之痛苦，更是難以形容。至於亞洲的日本和中國，其痛苦程度

度，也不會減於德國。據各方面零星的記載：日本在幾年的戰爭中，除了一般軍閥官僚坐在統治中國的交椅上，盡量的享受和盡情的放縱外，一般在本國內的人民大眾，生活的痛苦，食物的缺乏，以及不斷遭受飛機轟炸的恐怖——等，都達到絕難忍受的地步了。至於中國，更不用說，在日帝八年來的侵略踐踏之下，人民的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吃樹皮，草根，甚至有的地方還發現有人吃人的事實。這是一幅怎樣悲慘的景象呵！

參戰國的婦女，雖絕大多數沒有參加前線，可是她們留在後方各城鄉，食物的恐慌，更直接影響她們，使她們經常陷於飢餓，營養不足的深淵中。因為比較好一點的，富有營養的食物，都被徵集到前線供給作戰的士兵去了。留下來的當然是一些粗糧和缺少營養的食物。肉和牛奶當然根本說不上。因此，婦女和兒童們，都不免患了各種營養不良的惡劣病症，使婦女感受加倍的痛苦！可是，在另一方面，因為自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除極少數留在後方擔任必要的工作外，絕大多數都被迫趕到前線。因而，一切工業的，農業的乃至交通等工作，全都加在婦女們身上。她們除了在飢寒交迫中，在極端困苦的境地中，擔負繁重的工作外，還要遭受飛機轟炸的恐怖，受斷電斷水的種種威脅。但戰爭的結果，送給她們的酬報是什麼？除了忍受一般的貧窮和戰費的負擔外，就是無數的婦女，失掉了丈夫，變成了寡婦；千萬的兒童們失掉了父親，變成了孤兒；老年的婦女失去了愛子；少年的婦女失掉了愛人；而絕大多數的少女，因戰火吞滅了無數少壯的男子，使她們找不着對象，將長期忍受生理上和精神極端單調的苦刑。至於剩下一條腿或一隻手一隻眼的殘廢丈夫的婦女，還算很僥倖哩！但在這種僥倖之中，我們可以體驗得到，其中不知隱藏着多少酸辛的苦淚哩！

以上不過是敘述參戰各國婦女生活的一般痛苦狀況。至於在被敵人侵佔過的國家，如波蘭，法國，荷蘭，比利時，以及東歐中歐和巴爾幹——等許多國家，以至蘇聯的倫陷區的婦女們，除了忍受上述一切物質上與精神上無

可忍受的痛苦外，還要直接遭受鞭打，監禁，強姦和殺戮！這真不啻一幅血肉模糊的悽慘畫面。但從這個殘酷的畫圖裏面，也盡量的暴露了，而且認識了帝國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發展到了最瘋狂的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至於中國的婦女，八年來在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幾乎三分之二的地方被它瘋狂地蹂躪過。在這些地方的婦女，由於『日本武士道』特有的野蠻殘暴，而更遭受到了無比的虐待，姦污和慘殺的厄運。這是中國婦女在歷史上從來未有

過的大浩劫，這是不能忘記，永遠不能忘記的耻辱和仇恨；是痛苦的回憶，是血肉的深仇！

### 三 戰後各國婦女的新動態

戰爭的結果，將健壯的男子都驅上了前線，留在後方的婦女，因客觀的需要，從家庭跑到社會上來，擔任社會一切生產和其他各機關中的工作。她們之中甚至有的直接參加前線作戰，或擔任後方其他軍事工作，或任看護慰勞等工作。於是無形中提高了她們的重要性及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參戰各國，如英，美，法……，差不多都是如此。在戰後表現最明顯的，是法國的婦女。據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名報所載（美國新聞處巴黎廿二日電）：『法國婦女卅一名昨日當選法國國會議員，此次全國大選，婦女獲得選舉權。彼等踴躍參加選舉，尤以農村為甚。此種情況，實為法蘭西共和國歷史上創舉，合格之男女選人參加投票者達百分之八十五。此次膺選女議員，幾全部為法國抗戰運動傑出人物』。從這段消息看來，法蘭西的婦女，是第一次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換句話說，就是獲得了參政權，這確是法蘭西歷史的創舉。一方面，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德的婦女獲得選舉權和參政權，是由於她們在戰爭中，代替了男子的工作，參加社會各種生產及各種職業部門，甚至參加軍事工作的結果。另一方面，但這個選舉權和參政權，也不是白白地送給她們的，由於她們在戰爭中形成了一種團結的力量，那就是一九四三年成立的『法國婦女聯盟』。它團結了全國各地最為活動的婦女，會員達一百萬人。它的力量，已經滲透到整個法蘭西的婦女羣衆中。由於團結的經驗，她們同時也就有一種要求參加政治的覺悟，於是進而要求參政。因此，法國的婦女，才真正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這是由於她們參加戰時工作和努力鬥爭所得來的成果。

其次，是日本婦女也因同樣的原因，在戰後表現出一種新的姿態。我們知道：在戰前，日本雖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殘存的封建傳統思想和習慣，還是異常之濃厚，尤其反映在婦女方面，比中國還要厲害。因此，日本的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要低落得多。她們在男子面前之卑躬屈膝，柔順與服從的程度，是無以復加的。一句話，她們不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是丈夫的羔羊，家庭的奴隸。可是，經過這次戰爭以後，也同其他參戰國的婦女一樣，因參加社會的生產和其他工作，

因而提高了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因此而發現了女權的自覺。由於這種自覺而逐漸要求自由和解放，要求選舉權和參政權，這是日本婦女戰後的一個新的動向。據四月十一日大公報載東京十一日電：『日本十日選舉，婦女投票者之衆出乎意外，東京市婦女百分之五十以上，均參加投票，人數幾與男子相等。婦女候選人之成功，殊出意料之外，目前確悉已獲被選者，有社會黨山口靜枝，進步黨木內京，自由黨竹內茂代表八九人，得票之多，不讓鬚眉，頗為日本的婦女揚眉吐氣。』從這一消息裏面，就顯示着日本的婦女，也差不多同法國的婦女一樣，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空前創舉，是日本婦女在歷史上劃時代的轉變；也就是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

其他參戰國如英、德、意……等國的婦女，除了在戰時會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工作外，戰後雖然在表面上沒有表現具體的新的動向，但我們相信，她們經過這樣一個痛苦的戰爭，一定會獲得不少的經驗與教訓的。尤其是德，意的婦女，在法西斯長期的統治和壓榨之下，經過幾年殘酷的戰爭，在極艱難與痛苦的生活中，在內心裏一定裝滿了憤怒之火，鍛鍊了堅強的意志，獲得了為自身和人類解放的經驗與教訓。一旦時機到來，她們將必然是人類解放運動中一個力量。

戰後的中國，一方面是政治的極端無能和腐化；另一方面則是民主運動的興起。婦女因受整個民主浪潮的激蕩而開始活躍起來，開始注意自身和民族的問題。如各地女學生熱烈地參加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一般知識婦女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組織婦女團體。尤其是今年的『三八』節，上海的婦女參加集會遊行者達數萬人，行人道上，滿貼了標語和口號，這是多年來所未會有的現象。這些事實，都是戰後中國婦女的一般新的趨向。

無論從國際或國內的婦女在戰後所表現的新動態看來，都預示着整個的世界，將有一個新的憧憬，新的時代將要到來。世界的婦女，也正在準備着迎接這個將到來的新時代！

## 四 未來世界的前途與婦女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整個人類，尤其對於一般勞苦大眾所造成的災禍，對於人類幸福與文明的破壞，是無法計算的。它將現代的文明，又拉進了中世紀的黑暗狀態，這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賜予。由於原子炸彈的效力，這個殘酷的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其根本的矛盾，不但沒有消除；而且還逐漸

地表露出它的嚴重性。面對着客觀的事實，尚是不容許我們有過分樂觀。舊金山會議，倫敦五外長會議，以及最近在紐約所開之安全理事會會議上，都表現蘇聯與英美間的對立，它們之間矛盾與衝突，尤其在伊朗問題與東北問題上表現得更為尖銳。這一連串的事實，都證實着整個的世界充滿着矛盾，人類的和平，遠沒有獲得確實的保障。

顯然地，現時各國所注意的，是整軍；是爭相研究原子能的秘密，而不是復員。英國前外相艾登說：『世界仍在極大危險中』。前任駐華大使赫爾利也會提出三次大戰的警告。這就足以證明連帝國的統治者層，也不能不承認三次大戰之可能到來。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還只能聞到火藥的氣息，而看不出和平的象徵，這是我們整個人類不能不關心，而感到焦急和恐怖的。人類是再也經不起一次大戰了，因為原子能的巨大威力的發現，我們可以預言：未來的大戰，將是一個巨魔，它將吞滅整個人類，毀滅整個的星球！

然而，我們也不可過分的悲觀！如將三次大戰宿命地認為絕對不可避免，那也是不對的。未來世界的前途，是存在着兩條路向：一條是走向毀滅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另一條便是永久的和平。

但怎樣才能避免戰爭，獲得真正的和平呢？這是關係整個人類命運的問題，是這個地球上每一個人都需要澈底了解的問題。和平的鎖鑰，是握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手上，而不是握在那些上層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一切統治者的手裏的。他們手裏所握着的只是毀滅人類的各種可怕的武器，乃至原子炸彈，而不是和平的鑰匙。因此，要保障和平，決不能靠那些上層的『外交政策』，或什麼『國際和平機構』來担负的。殘酷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第一次大戰後所產生之凡爾賽和約，以及繼之而起的國際聯盟，其結果如何呢？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個痛苦的歷史教訓，將和平寄託在什麼上層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和平機構』上面，那不但是幻想，而且也是罪惡。這樣，人類流血的慘劇將不可免的要在這個地球上重演起來。

我們如果認識，和平的鎖鑰是握在全世界人民大眾的手上，那麼，唯一保障和平的，便是人民的力量了。只有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一致覺悟過來，團結起來，組成堅強的陣線，從根搥毀資本主義的制度，建立真正人民的和平政制，這才是阻止未來三次大戰，根本消滅它的唯一有效辦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存在，使世界充滿着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資本主義內在的階級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國

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這些矛盾，如果不根本消除，戰爭決無法避免，世界的和平就沒有任何保障。這並不是我們故意強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規律，決不是用人爲的詭辯與歪曲所能改變的。因此，只有從根改變資本主義的制度，世界才有走同和平道路的可能。

全世界的人民大衆，尤其是農和婦女羣衆，要跨過這樣一條艱難而又崎嶇的路程，雖然不能長驅直入，但只要有正確的指針，堅強的團結，不斷地掃除途中的障礙，一定可能達到目的地的。看吧！整個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已經開始覺醒起來，活動起來，在那裏要求解放，並且開始以行動來表現他們的決心了。如戰後英國政治的動亂，以及接連不斷的大罷工，人民大衆的左傾；尤其是戰後半年餘來是美國連續不斷地大規模罷工運動；都象徵着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不能安定地支持下去了。法國和意大利戰後政治的特別動盪不安，更足以象徵歐洲的現存秩序，已陷入了歧途。至於戰敗國的德日意國內，正陷于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大衆，好像行將決堤的決流，一旦堤防衝破，就將自由的奔放，因爲他們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

至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已經在各方面開展。如印度，埃及，荷屬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火焰，正在開始燃燒，而且還在向其他殖民地蔓延。中國在這一整個國際局勢的影響和推動之下，民主運動也正抬頭起來，逐漸開展和擴大。凡此一切，都象徵着全世界的人民大衆，已經開始準備用自己的力量來阻止未來可怕的三次大戰，而向着建立永久和諧的社會方而走了。占全人類半數的婦女，爲了自身的解放和全人類的幸福，必然地會滲透於這一潮流之中。法國婦女之獲得參政權；日本婦女運動的生長，以及中國婦女運動之抬頭，都是整個世界潮流的反映。世界的婦女，要想避免戰爭的悲劇，醫治在這次戰爭中所受的一切創傷，解除自身的鎖鍊，只有積極起來，緊跟着世界民衆運動的洪流，邁步前進，踏上澈底解放的大道，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

一九四六·四·十二。

## 徵求各地通訊

關於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本誌亟盼各

# 利通行 LEE TONG & COMPANY

專營手工業製成品出口  
代理歐美名廠產品入口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廿七號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 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二 SHANGHAI 二 PHONE 96546

#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 一 原子能的解放

我們在敘述原子能解放的歷史之先，應該先把原子的大概情形說明一下。原子好像是一個小型的太陽系。每一個原子，就是由於一個位居於中心的原子核和一羣環繞在周圍的電子，組合而成的。原子核是原子中間最關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原子的質量和性質，就全由於原子核的質量和電荷來決定。原子核也不是一個實心的固體，而包括着帶正電的質子和沒有電荷的中子。質子和中子的數目，因為原子的種類而不同。化學書上所說的原子量，就相當於質子和中子的總數，原子序數就相當於質子的個數。假使有兩個原子，所含質子的數目相同，這兩個原子就屬於同一的元素，但是同一元素的各個原子，中子個數，並不是一律相同的。凡是中子個數有不同的原子，其化學的性質，固然是完全相同，但是質量不同。這種原子，就是一種元素的各種同位素。

原子的物理學，在現代物理學的各部門之中，還是一個新興的支派。雖然在公元前四百年間，希臘哲學家的腦筋中，早已發生了原子的理想，但是原子的存在，一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方纔得到實驗科學的證明。至於科學家真正能够注意到原子內容的研究，實際還始於十九世紀末葉，電子的發明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之間，科學家對於電子的行為已經漸漸熟悉，於是就轉移目光，進一步從事於原子核內部的探討。在這一個時期之中，在原子物理學上最有偉大貢獻的人物，要算是路透福得。路透福得曾經採用鑄的亞耳發質點，來轟擊物質，第一步發明了原子的結構，第二步又證明了人工轉變物質的可能性，而同時發見了原子核的成分質子。

開發原子能的寶鑰——中子，在這一次大戰爆發以前，是早經發見的。遠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哈金斯（W.D. Harkins）曾經提倡氫氦構成說。

他以為原子序數為偶數的輕元素，原子量的數目，一定為原子序數的兩倍，這就是因為這一種原子，是由幾個亞耳發質點結合而成的緣故。哈金斯的學

說，對於一般的輕元素，大都可以應用，只有鉛的情形却不同。鉛的原子序數為四，但是原子量為四的兩倍多一。所以哈金斯以為鉛的原子核，除含有兩個亞耳發質點以外，一定還有一個不帶電荷而具有一個單位質量的質點，這就是中子發見的第一個暗示。此後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哈金斯於四月十二日，路透福得於六月三日，先後承認中子為原子中間一種基本的結構。後來格拉生（Glasson）和羅伯次（Roberts），曾經在氣氛中間通電，要想產生中子，他們結果雖一無所得，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博德（W. Bothe）和貝客（H. Becker）兩人，用鉅的亞耳發質點來轟擊鉛，果然得到一種中性而強烈的射線。這一種射線，起初被大家當做加馬射線，直到一九三二年，查得威克（J. Chadwick）方證實其為中子。

中子所以不同於其他的質點，是在於沒有電荷。因為沒有電荷，所以和其他質點有各種不同的行為。普通的質點，不論是質子，重氮核，或者亞耳發質點，都是帶有正電荷的顆粒體，當其射入其他物質的原子時，常要被原子核的同性電荷所排斥，以致沒有方法，可以迫近原子核。但是中子却絕對不受這一種力量所影響。所以中子不但可以一直達到原子核，並且可以穿入重原子的核內。中子撞着一種物質的原子核，一定要失去一部分的能量。不過損失能的大小，因為原子核的質量而不同。原子核的質量越是相近於原子核，中子撞擊時損失的能就越大。不帶電荷的特性，不但使中子不易於發見，並且使中子不易於控制。無論那一種帶電的質點，都可以用磁場或電場來增減速率，或是改變方向，但是這一種力量，對於中子却絕對沒有控制的能力。中子唯一的控制法，就是用質量和中子較近的物質，當做緩衝物（moderator），使中子在通過這種物質的時候，和靜止的原子核相撞，而失去大量的能。在這一類的物質中，除了鋰和硼能够吸收中子，氮則沒有化合物以外，剩下來的，只有氫，重氫，鉀和碳等幾種而已。

關於原子的來歷和結構，大略已如上述，現在就進一步來討論原子能。能是使物質結合，分解和易位的要素，既不能由我們創造，又不能被我們破壞。

滅，只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而作互相的轉變。例如燃煤生熱，是轉化學能爲熱能，用煤的熱煮水而發動蒸汽機，就是把熱能又轉變爲機械能。假使再利用蒸汽的力量，以轉動一隻發電機，就又把機械能，一變而爲電能了。在二十世紀以前，這樣可以互相轉變的能，我們只知道有化學能，熱能，機械能和電磁能。後來到一八九六年，貝克葵累耳首先發見某一種含鈾的礦物，能够經常而自動的放射少量的能，但是據居里夫婦的研究，這一種放射動能的物質，並不是鈾的本身，却是礦物中一種定名爲錯的稀有元素。假使把鑄從礦中提出，每一克物質所生的能，可以使其本身的溫度經常比周圍高出數度，這就是原子能第一次發見的經過。

照路透福得和索第的研究，放射性物質，蛻變時所放射的能，和物質作他種變化時所放射的能比較，真是異常巨大的。例如分子運動時所帶的能，每絕對溫度一萬度，只得一個電子伏。煤在氧氣中燃燒，每一個碳原子，只能够放四個電子伏，其他原子因發光而發生的能，也不過幾個電子伏而已。但是物質在蛻變的時候，每一個原子竟可以放出數百萬電子伏的能。但是這一種巨量的能，究竟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問題，直到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的特殊理論以後，方纔爲我們所明瞭，在早期相對論的研究中，曾有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任何動體的質量，是隨運動速率的增加而增加的。愛因斯坦由於這一種研究，計算得一克的質量，就相當於以光速平方乘三個厄格的能。依據這一個公式，如果有一克的物質轉變爲能，所放的能就可以相當燃燒三千噸。一公斤或一·二磅的物質，全部轉變爲能，竟可以產生二十五萬萬度的電力，在美國一九三九年的情形之下，儘可以供全國兩個月之用。這一種原理，後來就在放射性的物質中得到證明。

放射性物質在自動蛻變的時候，總是分解爲一種或幾種質量較小的物質。所減輕的質量，就轉變爲放射的動能。這一種事實，使我們相信，由於原子核結構的改動，就可以發生大量的能。可是在放射性的物質中，只有極小一部分的質量，能够發生變化。所生的動能，當然很有限。至於用人工的方法來轟破原子，自從一九一九年路透福得用鑄的亞耳發質點來轟擊氮氣，到一九三一年可克繞夫特（J.D. Cockcroft）和瓦耳頓（E.T.S. Walton）用加速的質子去轟擊鋰的靶子，都只能獲得極少量的能，還不足以抵償試驗的消耗。在一九三一到三九的幾年之間，大量原子能的解放，在實際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在理論上，却已經有很大的成就。例如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貝特

（H. Bethe）教授以爲太陽上巨量的能，就由於太陽內部的氫原子和碳的原子結合，在輕氮，重碳，輕氧和重氮等階段的蛻變過程中發生的。最足以促進原子能解放的成功的，乃是中子的發見。中子自被查得威利發見以後，首先被費透（Feather）採作轟擊原子的彈丸。到了一九三四年，斐密（E. Fermi）和他的同事，由於這一種試驗，首先發見在白蠟中通過的中子，可以使鈾核發生蛻變。一九三九年哈痕（Otto Hahn）斯特刺斯曼（F. Strassmann）和美特納（L. Meitner）等，又用化學的方法，仔細分析蛻變的產物，於是發見了鈾的分裂（fission）現象。

在一個原子之中，電子乃是一種彼此分離的質點，假使被外界帶電的質點所撞擊就可以單獨的興奮，或者單獨的脫離原子。但是原子核的情形就不同了。原子核是許多質點的集合體，假使有一個外來的質點，把能授與原子核，原子核中每一個質點，就都可以分配到一部分的能。因爲原子核中的質點，各有一定的數目，所以要使原子核起或大或小的興奮作用，必須有一定大小的能，當中子使原子核發生較小的興奮時，中子的能如果在某一定範圍的量值中，比在這一個範圍以外，更多被捕的可能性，這一個範圍，就稱爲共振水準（resonance level）。假使中子被捕的能量低，或是中子的能量大，捕捉的可能性往往和能的增減，沒有直接的關係，反而能隨能的減小而增加。

鈾因中子激勵而發生的變化，可以用上面的原理來說明。自然界的鈾，含有三種不同的同位素，其中尤其重要的，乃是具有二百三十八單位質量的重鈾和具有二百三十五單位質量的中鈾，重鈾不能夠捕捉力量微弱的中子，除非中子所帶的能，剛剛在三十八電子伏上下，才能使重鈾興奮，而發生變化。重鈾的原子核假使捕捉了一個這樣的中子，放出一條加馬射線，就變成質量爲二百三十九單位的同位素超鈾。超鈾是一種不安定的同位素，半化期只有二十三分鐘，每一個原子，放出一個電子，就變成九十三號新元素鎔（Neptunium, Np）。這鎔也是一種不安定的物質，半化期爲二·三日，每一個原子，放射一個電子和一條加馬射線，就變成九十四號新元素鎔（Plutonium, Pu）鎔的半化期有數千年，我們可以視之爲安定的物質。在這一種變化之中，固然沒巨量的能發生，但如重鈾的原子，捕捉了一個含能一百萬電子伏的快中子，這原子核就馬上不能够安定，終於分裂爲大小不等的兩另，以一萬八千萬電子伏的動能分開。至於這兩另分裂產物的比較質量，

常因情形而不同。但以大體而論，總之為二與三之比。中鈾所以和重鈾不同，即在於不限於快或慢的中子，都能够發生分裂。並且慢的中子比快的中子，更容易引起中鈾的分裂。

其實原子核較大的元素，除鈾以外，不論是前鈄，鈦或鎳，都能够因為中子的激勵，發生分裂作用，而放出大量的能的。但是前鈄在自然界中只有極小的含量，當然不能夠採作解放原子能的材料。鈦質只能因為快中子的激勵而分裂，含量雖然遠較前鈄為豐富，但也沒有可以超越鈾質的地方。鎳的行為和中鈾一樣，可以用任何能量的中子，使之分裂。因為鎳的原料是重鈾，在天然鈾中所占的分量，為中鈾的一百四十倍，並且鎳是化學性質和鈾不同的物質，變化完成之後，可以用化學的方法，使二者分開。所以在上述各種解放原子能的材料中，鎳可說是最合理想的一種。

重原子在分裂的時候，不但要發生新的輕元素和巨量的能，並且平均有兩個以上的中子，以略小於一百萬電子伏的動能，由原子中放射而出。這樣看起來，只要在開頭有一個原子分裂，其間所產生的中子，還可以激勵周圍的原子，使發起分裂的作用。如此輾轉相生，終至於全部的原子，完全分裂而後已。所以重原子的分裂，實在是一種連鎖的反應（chain reaction）。但是要使反應，能夠繼續不斷的進行，在一定時間之內，被鈾核所捕捉的中子，一定要多於散失的中子，否則反應就隨時可以停止。中子散失而不能為鈾核所捕捉的情形很多，最明顯的一種，就是表面的散失。因為中子是質量和鈾核的質量相差很遠的質點，其和鈾核相撞，只能減去極微小的能。但是中子是一種長射程的質點，假使通過一片體積很小的鈾，在未被捕獲以前，就早已散失於空中，不過這一種散失，可以用體積的增加來避免。因為當鈾的體積增加時，捕捉中子的增加，要比散失中子的增加快，所以到了後來，一定可以達到一個臨界的大小，二者剛好相抵。假使鈾的體積大於臨界的限度，就有發生連鎖反應的可能。

分裂性物質的體積，固然已經超過臨界的限度，但如物質的中間，混雜鈾礦的時候，這一種雜質，必須完全除去，假使所用的分裂性物質是鈾，那末當這一種雜質除去以後，還留有一種吸收中子的物質，這就是重鈾。因為重鈾只能够由於快中子的轟擊而分裂，但是從鈾核分裂而生的中子，速率都較微小，只能使重鈾變化，而不能使重鈾分裂。重鈾固然能夠被這種中子所

分裂，但是在自然界的純鈾中，中鈾只占有千分之三的比例，被中子擊中的機會遠比重鈾為少。所以要保證連鎖反應能夠繼續的進行，或是用重水，石墨等緩衝物急速減低的速率，以減少重鈾共振吸收的機會，而使中鈾捕捉中子的機會增加，或是選把重鈾撤除，使分裂所生的中子，可以直接受中鈾分裂。連鎖反應機構的大小，因為反應的方式而不同，用慢中子促成反應的機構要比用快中子促成的機構大得多。

假使要利用慢中子來促成連鎖反應，必須把數十噸的鈾，按照固定的格子，穿插在數百噸的石墨中，造成所謂自給連鎖反應堆（self-sustaining chain reaction pile）或異性堆（heterogeneous pile）。這石墨是穿着許多溝道的立方體，中間藏著一組冷卻的機構，容納水，氮氣或溶解的鋁，以去除反應時所生的高熱。至於鈾的生礦，普通製成圓棒的樣子。因為鈾是一種化合力極強的物質，假使和空氣或水接觸，很容易發生氧化作用。所以在應用的時候，必須用金屬密封。一方面以防止氧化，一方面以防止生成的物質逃逸入周圍的空氣或水中，但是這一種金屬，一定要能够抵抗高熱，並且不能吸收中子，所以選擇起來，也至不容易。在尋常所用的金屬之中，只有鋁質還適合於上面這兩個條件。但是鋁在攝氏一百度以上的溫度下，能起腐蝕作用，所以鋁殼的溫度，非用冷卻的機構，保持在攝氏一百度以下不可。反應堆中由鈾棒發生的中子，和石墨的原子經過幾次的撞擊，動能就可以降到共振水準以下，所以當其重新透入鈾棒時，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被中鈾所吸收。石墨中除穿插有許多的鈾棒以外，還插有許多吸收中子的物質，如硼及鎳等所製的控制棒。反應的速率，就由於控制棒的推進和抽出來控制。控制的人用遼遠的控制法把棒徐徐抽出，使反應開始以後，假使反應的速度太快時，可以把棒插入，以便停止反應。這種控制棒，又可以用恒溫器等自動調整位置，使反應的進行，能够保持着一定的速率。為減小反應堆的臨界限度起見，所以在反應堆的四周，建造一組反射中子的牆壁，以便反射中子，而全部的機構，又包圍在隔絕放射的遮板（shield）中。

在鈾棒之中，因分裂而發生的中子，並不是完全不能夠進入重鈾的原子核的。所以在反應堆中，一方面繼續不斷有連鎖反應的進行，一方面又有鎳不斷的產生而出。鎳的濃度，起初逐漸增加，一直到所產的鎳，隨時被中子破壞為止。但是如用一種特別的格子，安放鈾礦，鎳的產量，就可以達到最

應完成之後，可以移入化學工場提煉，提煉的方法，係先使鋁蕊的內容物溶解，再用氧化的方法使鎳沈澱。經過多次的沈澱以後，鎳遂和二十多種中鈾的分裂產物分離。最後使氧化鎳還原，就可以得到純粹的金屬。

至於撇除重鈾，乃是技術上極感困難的一件事。因為同位素是電子層的結構和化學性質完全相同的原子，通常的化學提煉法，是絕對不能夠使其分離的。假使要分離同位素，必須要從原子核質量些微的差異上着手。和原子核質量有關的作用，說起來也不在少。我們都知道，一種氣體的分子，在尋常的狀態之下，要受到重力的影響，一旦游離之後，又要受到電場或磁場的影響。這一種力量對於分子所生的效果，就因為分子的質量而不同。又如氣體和液體的分子，通常總是作繼續不斷的運動的，運動的速率，要和質量的平方根成反比。原子間力和分子間力的大小，雖然常隨分子外部的電子狀態而不同，但是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也和原子核的質量，發生微小的關係。物理學家基於上述的各種原理，一共發明了十數種方法，可以分離同位素。在這一種方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力法，電磁力法，氣體擴散法，熱擴散法，分離法，電離法和化代法。但是可以應用於中鈾的提煉的，只有前面的四種方法。

地心對於分子所發生的吸力，因為分子的質量而不同，但是和重力有頗頗作用的分子間力，却和質量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一種氣體的混合物，在重力場中，一定有被重力所分離的傾向。但是在工業上，我們普通是用離心器，製造假的重力，以完成分離的作用的，所以在很久以前，就有人提議用離心器來分離同位素。早期的試驗，大都沒有結果，一直到皮姆斯（J. W. Beams）發明了一種高速旋轉的離心器以後，分離的工作，方纔達到第一步的成功。最近尤賴（H. C. Urey）設計的分離器，乃是一種以高速率旋轉的圓筒體。在筒的外面，用一注蒸汽向下流，在筒的中心，用一注蒸汽向上流。於是這兩流蒸汽的分子，就在接觸面上不斷發生擴散的作用。但是因為離心力對於質量較重的分子，所生的效果較大，所以擴散的結果，遂使外部的氣體中，集中較多的重分子，而在中心的氣體中，集中較多的輕分子。重力分離法的優點，是分離的效率，直接因為分子的質量來決定。只是製造高率率旋轉的圓筒，要牽涉到工程上許多困難的問題，以致這一種方法，不能够大規模的應用於工業。

安定的物質，和放射性的物質一樣，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同位素，最先

就因為電磁分離的方法而發見的。電磁分離法的特點，是分離完全，動作迅速。假使單單用以決定某一種物質同位素的比較量，直到目前，還沒有更令人滿意的方法。關於電磁分離法的原理，可以用一九一八年德姆普斯脫（A. J. Dempster）所製的質譜儀來說明。質譜儀是一種特別的真空管，一頭有個游子源，可以容納試驗的氣體。氣體先要通入游子源，然後因為電子的轟擊，而變成一羣游子。游子中的一部分，經過一道小隙，然後進入電場。這一種游子因為電場的加速，又經一道小隙，最後進入磁場。磁場使游子作弧形的路線而旋轉，半徑的大小，則因為質量的大小而不同。在中鈾軌道的終點，開有一個孔隙，可以使這一種同位素，進入一個收集器中，電磁分離法可以應用於鋰、鉀、鉻、硼和碳等多種物質，分離的效率雖高，只是產量很有限，每小時的所得，還不及一微克。一九四一年，美國科學家鑿於大量中鈦的需要，於是把電磁分離法的缺點，作一番仔細的分析。據他們分析的結果，電磁法的缺點，第一在於不能產生大量的氣體游子，第二在於用很細的游子流來分離，所以在產生的游子之中，只可以利用極小的一部分。第三在於游子流的密度太大，往往能產生空間電荷，結果影響分離的效率。在上述這三種缺點之中，空間的電荷是可以有方法減到最低的限度的。但是游子的產生率和利用率，却很不容易增加。因為這兩種效率，不但有關於游子源的設計，並且有關於許多經驗的問題。在改良的電磁分離器中，最重要的是加州大學的加大儀（cyclotron）。所謂加大儀，就是勞任士教授利用加州大學迴旋加速儀（California University cyclotron）的大磁石來分離同位素的新設計。加大儀所以不同於質譜儀，是有比較廣闊的游子隙，所以游子的流量和收集量，可以有相當的增加。游子的來源，比加大器還要廣闊的，是普令西頓大學威耳生（R. R. Wilson）教授設計的無名儀（isotron）。在無名儀中，一方面用一個固定不變的高電壓，使游子加速進行，而一束一束的分開。在游子分束的所在，橫着一個磁場，磁場的力量則隨游子束的接近而變化。當中鈦游子接近的時候，磁場的力量最小，而當重鈦的游子經過時，磁場的力量最大。所以重鈦的游子能够被磁場偏轉，而中鈦的游子可以一直衝入收集器。不過用無名器來分離同位素，只能夠得到半純粹的樣品，所以在一九四二年的秋天，美國放棄這一種方法以後，就沒有人再

用此法做大规模提煉的嘗試了。

氣體的分子，是作繼續不斷的運動的，而運動的速率，則和分子量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在一種氣體的混合物，因為擴散的作用，而通過一個小孔時，輕的分子一定擴散得快，而重的分子一定擴散得慢，結果在孔的遠端，一定集中有較濃的輕分子，一直到兩方面的擴散作用，達到平衡的狀態而後已。氣體擴散法的原理，固然是十二分的簡單，但是要應用於實際方面，却有不少的困難。譬如在單獨的小孔中，只能够通過極稀少的氣體分子，所以在分離器中，不得不用多孔的濾器，例如黏土製的管子，或是抗高壓的鏽蝕金屬板。再說一種元素的各種同位素，質量上的相差總很有限制，所以每過濾一次，只可以得到極少量的物質。赫芝（G. Hertz）為解決這一種困難起見，會用為多數的濾器排在一處，使氣體經過連續的過濾，以便獲得較濃的某一種同位素。在氣體擴散的分離器中，濾板的遠邊是抽成真空的，所以當氣體導入濾器的近邊時，就能經過濾器而集中於遠邊，這樣過濾一次，大約可以通過一半的物質。過濾以後，再把未經過濾的一半加高壓力，退入下一隻濾器。已經過濾的一半，也加高壓力，壓入上一隻濾器，各作繼續的過濾。在提煉中鈍的時候，最適用的氣體，普通是六氟化鈍。因為氟的原子，只有一種質量，所以每一種鈍的同位素，只有一種重量的氟化物。六氟化鈍的缺點，是易起反應，並且在平常的溫度和壓力以下，還是一種固體。但在目前的情形以下，還沒有良好的代替品。六氟化鈍每經過一次的過濾，中鈍化合物的濃度，不過增加千分之三，大約要經過四千次的過濾，方纔可以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六氟化鈍。在這一種繁冗的操作過程中，所用的氣體的體積，要有最終產物的十萬倍。濾板面積要有數英畝，唧筒要有數千隻。驅動許多唧筒，還要有碩大無朋的蒸汽機。

氣體混合物的分子，能夠因為氣體各部分溫度的差異而分離，乃是在一九二〇年，蓋斯科格（Enskog）和查普曼（Chapman）兩人，因為分子行為的研究而發見的。按照他們的結論，假使把一種氣體的混合物，充滿在溫度不勻的容器中，各部分氣體成分的比較量，能夠因為容器的溫度而變遷。重的分子就集中於冷的一部分，而輕的分子就集中於熱的一部分。到了一九年，克盧修斯（H. Clusius）和迪刻耳（G. Dicke），發明一種分離器，就利用這一種原理來分離同位素。克迪爾氏的分離器，係在一種豎直玻璃管的中軸，貫穿一根高熱的金屬絲而成。這金屬絲的用處，係使玻璃管的內

部和中軸，溫度的相差，達到攝氏六百度之鉅。溫度的差異，不但能使管中的氣體，發生熱擴散作用，並且使氣體發生對流的作用。氣體中較輕的分子，本來要集中於熱的一部分，但是因為對流的結果，最後就上升於氣柱的頂端。重的分子，本來要集中於寒冷的外壁，最後也因為對流的作用而下沈於氣體的底層。所以分離的結果，這兩種分子就可以在分離器的頂和底間分開。熱擴散分離法的效果，可以隨管的長度而增高。假使我們能集合多數管子在一處，效果一定還可以增大。熱擴散分離法以前只可以應用於氣體為限，但現在已可以應用於液體。分離的原料改用液體以後，氣柱的長度可以減小，加入的物質可以增多，並且有大批的唧筒，可以省去，只是分離的速率，沒有氣體的迅速罷了。熱擴散法可以應用於氯、氖、氫、氧、碳、氮和硫等各種物質。但是在煉鈍的工業中，普通只應用於初步的提煉，以提煉初樣，而供給電磁分離器。

假使我們能够用部分分離的方法，增加中鈍的比例，或是在中鈍之中加鎳等其他分裂性的物質，臨界的體積，就可以大大的減小，並且可以直接用快中子發生連鎖反應。因為快中子穿過全部質量的時間，只要 $10^{-8}$ 秒，所以在一兩微秒之內，炸藥的溫度，就可以驟然昇到數千萬度，壓力則昇到數十萬個氣壓，而發生猛烈的爆炸，這就是原子炸彈所以能够爆發的原理。原子炸彈的內容，現在還是美國政府所保守的秘密，但是其結構上最基本的條件，已經該國的當局宣布。我們都知道，一切炸彈在使用之前，是必須儘量保持安定，以便自由搬運的，但是原子炸藥的體積，在超過臨界的大小以後，就很容易受空間宇宙射線或原子蛻變時所生的中子所激勵，因而發生爆炸。體積或因為形狀不超過臨界的限度，因此保持安定。原子炸藥在施用以前，固然要彼此分離，但是在施用的時候，必須在極短的時間以內，完全密合為一，以免在未經完全密接以前，發生「早熟」的爆炸。使原子炸藥急速接合的方法，是把一塊炸藥作為槍彈，其餘的作為靶子，用槍機射入靶子，使在數微秒之內，完全接合為一。在炸彈的外面，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名稱叫做實殼（tamper）。實殼用密度很高的物質所製，一方面用以反射中子，以減低臨界體積的限度，一方面以限制炸藥，使其延遲分散，以便炸藥在飛散以前，可以全部分裂。

用原子能來代替燃料，其最大的優點，是在於原子的消耗率低，伸縮性

大，放能的速率，可以自由控制，並且完全沒有烟臭。因為有低的消耗率，所以有低的價格，這就是原子燃料最大的特色。譬如一磅鈾分裂所生的熱量，可以相當於燃煤一千噸。以戰前的價格而論，氧化鈾的價格為美金三元一磅，而煤的價格大約為美金三元一噸，可見以鈾充作燃料，在價格上要比燃煤低廉一千多倍。由原子分裂而產生的熱能，是用空氣，水或其他的物質所傳導的，假使用原子能發電，可以利用一個換熱器（heat exchanger），吸收水或空氣所傳達的熱，把水熱為蒸汽，然後轉動渦輪。這一種發電機可以和尋常的發電機相同，只是要多造一隻換熱器。不過換熱器和導熱管的材料，自然要用能攜抗中子和放射性的物質。

原子能目前不能夠立即應用於工業，最顯著的原因，恐怕還是價格的問題。因為原子能所以能引起目前大多工業家的興趣，實在還在於低廉的價格。但是要把原子能應用於工業，在提煉和發電機的設計上面，都要花費鉅大資本。在兩方面相抵之後，所得的動力，恐怕比燃煤所得的還要貴了。其次在技術方面，還有許多冶金和工程的問題，必須先行解決，譬如為防止鈾礦的鋁殼，發生腐蝕起見，必須把溫度保持在攝氏一百度以下，但蒸汽在攝氏一百度以下，便不能發動渦輪了。最後還有一點是危險的問題。一隻原子鍋爐，固然不像一般所想像，隨時有爆炸的危險，只要有熟練的工程師來設計和管理，就可以和蒸汽鍋爐一樣的容易就範，但是中子以及由鈾等其他分裂產物所生的放射，却大足以危害工人和居民的健康。假使要避免原子能傷人起見，一切的設備，都要用笨重的遮板來隔離，但是在原子的發動機之外，再加上一重遮板，全部的重量，至少要在五十噸以上，所以要用原子能來駕駛機車或飛機，目前至少還沒有成功的希望。

最後，再把連鎖反應堆的附帶用處順便提出來討論一下。連鎖反應堆滿了，解放原子能以外，還有一種用處，就是供給中子。在連鎖反應堆，還沒有發明以前，最大的中子源，要算是迴旋加速器，但是加速器的效率，遠不及反應堆。例如一仟瓦的電力，如果應用於反應堆時，所得的中子，可以相當於同樣電力在加速器中產生中子的一萬倍。所以我們不難製造一種反應堆，所發生的力量，達到加速器所耗能力的一百倍。反應堆的中子，現在還不過用以製鐵為限，將來一定還可以用以製造其他放射性的同位素，以供給醫藥工業及其他各門科學上的應用。

(本節完)

## 材料來源：

(1) Smyth, H.D.,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 1945.(2) Harkins, W.D., *The New Kind of Matter: Element Zero or Neutron*, Sc. Mon., XXXVI: 6. 1933.(3) Funk, D.G., *The Technical Basis of Atomic Explosives*, Elect., Oct., 1945.(4) Oliphant, M.L., *The Release of Atomic Energy*, Nat., 3935, pp. 5—7. 1946.(5) Lister, B. A., *Isotopes*, Disc. VII: 2, pp. 39—46. 1946.(6) Compton, A.H., *Atomic Energy as A Asset*, Nat., 3930, pp. 5—7. 1946.

##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英國唯物論以及整個的實驗科學之生父，乃是培根。他認為自然科學是一唯一真實的科學；建立在感官經驗上的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部分。安那薩哥拉斯及其種子，德謨克里特及其原子，是他所敬重的權威。在他的學說中，感官是完全可靠的；感官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就是實驗的科學，科學的作用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官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就是理性的方法之主要形式。物質固有的本質中，其最初和主要的本質，就是動——不僅是機械上的和數學上的動，而且特別是衝動及反應堆。例如一仟瓦的電力，如果應用於反應堆時，所得的中子，可以相當於同樣電力在加速器中產生中子的一萬倍。所以我們不難製造一種反應堆，在倍根——唯物論的第一個創始者——的學說中，唯物論而且質樸的包孕着各方面發展的萌芽。物質以其感覺的和詩意的光輝對人微笑。但培根的格言式學說却仍充滿了神學上的矛盾。

(摘錄自恩格斯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 悲憤的

# 歡笑

謝少翁

長聲的警戒警報在天空狂吼，全市的氛圍，立刻變成刺人心肺的恐怖的窒息；人們不再敢仰頭等待銀色飛機的到來，亂紛紛地匆匆地趕路，有些人簡直在踉蹌着；路邊的小孩子也停止了玩耍，各自奔回家去。

不滿五分鐘，空襲警報響了！

嗚！……嗚！……嗚！……

電馬達停止了；一切機器停止了，工場裏僅僅存留一霎那的寂靜，跟着來的就是工人們的怪叫和紛紛逃出去的驟然聲。每個工人都離開了工作的位置，擠着推着兜罵着前面的人，推推跌跌地衝出這最危險的工場間。

大鐵門緊緊地鎖着，一個日本班在發瘋似的：『不准出去！不准出去！你們一出去就是目標！快點躲起來！躲起來！不准出去！……』

小鈴子在人後面躊躇不前，又聽不清楚那鬼子在說些什麼。工人們不肯散開，高聲地罵着叫着：『赤老！烏龜！狗養的！豬猡！閉門！不開門打死你！閉門！……』可是那鬼子還是不肯去拿鑰匙。

轟！轟！……一排炸彈下來了，大家覺得膝骨節軟了一陣子，日本人急忙地鑽進日本專用的防空洞裏去了，驚慌的男女工人們向四處無目的地散開，每個人不約而同地喊着：『來了！來了！』

工人們擾攘驚呼聲未消，一種尖厲的怪聲在天空響了！『許！……』大家抬頭窺視天空的當兒，幾條黑線向下直墜，尖厲的怪聲更可怕，『許！……』一個大火球跟着在廠房上爆發了。

『嘭！……』巨大的炸彈一連響了幾次，每個人都想像自己已經死了。

烟，火舌，灰塵，向四處蔓延開去。

小鈴子給一陣劇痛打倒了，斜躺在牆邊，她隱約地聽到旁邊有別人在呻吟，雙眼看不見什麼，剛掙扎着側過身想爬起來，一陣劇痛又刺得她昏厥過去。第二次醒來，她還是看不見什麼，只聽見四週的人聲擾雜，她想提高嗓子大叫『救命！』但是，她聽不見自己的呼聲，只聽得一下微弱的呻吟。人們在她身旁奔來奔去，從不睬她。沒奈何，只得低低地喊着：『媽唉！媽唉！小鈴子……在這裏……要死了！媽唉！……』

× × ×

這時，她的媽正在家裏，默然和丈夫對坐着，五歲的小龍一聲不響地在一旁，兩顆心都掛念着他們所寵愛的女兒，迷惘着，束手無策地等着，只希望廠裏能早些放工，然後，小鈴子不久就如仙女一般地回到家裏，一家四口又歡天喜地的，有說有笑的。

昨天鈴子媽夜班，今天給警報駁醒了，困頓的身子，加添上無限的憂懼與不安。疲倦的雙眼，帶着莫名的悲意，呆瞪住他的臉——一張和小鈴子一樣的臉。她想得出神了。

老二不時看看錶，心裏計算工廠與家的路程距離，估計女兒回家的時候，又担心着路上有什麼地方要封鎖。

他已經這樣的渴望了兩點鐘，失望的恐怖，逐漸地擴大起來，最後一次看那只錶時，他的手發抖了！

老婆看見他的手一抖，突然伏在他的身上高聲地號哭了。小龍也跟着莫名其妙地悲號。

這時，小弄裏忽的起了一陣脚步聲，人們大驚才惶惶地往外奔，有的口裏喊着：『唔！那卡車上的血還往下流呢！』

一聽見這些，她神經質地慌人一般地衝出門去，老二在背後叫她：『蘭英！蘭英！』她頭也不回，向街上衝去。走到十字路口，拉住一個巡捕問：『先生，你知道剛才炸了什麼地方，公大紗廠有沒有出毛病？』

『不知道！他白了自濃眉下的雙眼。』她又快步子奔過三四條路，又問一個巡捕，回答還是『不知道！』再衝過幾條路，正想啓口問話的時候，一輛救護車從正面飛滾過來，發出尖銳的令人顫抖的叫聲，如一隻受創甚重的野牛那樣地吼着奔着。她的神志爲之一清，發覺前面封鎖着！

『不管三七二十一！』她從人堆裏鑽出去，走出界線二三步，給一個巡捕拖住了：『不能走過去！』『我要去看我的女兒！我要過去！』她掙扎，怒目回視他，她非常懷恨。

『不行！那裏給炸了！東洋兵不准中國人走近的！』『我要到公大紗廠去看我的女兒！』她用力掙扎着。

『不行！那裏給炸了！東洋兵不准中國人走近的！』

這句話如雷擊一般，打暈了她的腦袋，她呆住了，她的第一個思想就是『小鈴子死了！』她呆望着那巡捕，失望地，懊喪地；他鬆了手，有些滑稽地看看她。片刻的靜默之後，她以飛速的步伐衝向前去，待他回頭發覺時，她已經奔過一條路口了。

迎面駛來一輛駕裏的運貨車，他發紅地高舉雙臂去擋路，大聲呼喊：『細紗廠九百五十七號小姑娘怎麼樣了？』那輛車略略轉過去一點就飛走了，誰又沒有答應她。

復，已逝的車影子猶如一個謎。

再奔向前，幾個鬼子兵荷着刺刀的長鎗，攔住她的去路，一個鬼子把刺刀對準她的胸部，逼她站在牆邊。

她不甘心回去，又不能前進，只得呆站着。

滿載傷者的汽車，一輛又一輛地飛過，如此空前的情形，好像在告訴她：『小鈴子大概沒有希望了！』

但是她仍舊站住腳跟。

路燈亮了，天色漸漸黑暗了，救護也漸漸少了。過了不久，鬼子兵也撤離了。她立刻奔過去，如一匹揮脫繮繩的母馬，一口氣跑過四條街，到廠門口，已經有許多比她先來打聽消息的人，羣集在鐵門外，每走出一個中國人，就圍着他問長問短。但是，回答的話都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死的人不多，傷的很多！中了四五顆炸弹！』

『喂！細紗間九百五十七號小姑娘怎麼樣了！』蘭英衝上前去一把拉住她。

『我不是廠裏人！』

廠門口亂了一陣子，一隊巡捕來干涉了：『回家去！回家去！受傷的在醫院裏，死的明天下午來認屍首！回來回去！……』一個隊長模樣的領着他們在驅散羣衆！

臉部的表情，恐怖之中有些同情，語氣是溫和的。人們遲疑了一會，知道不能進廠去看個究竟，各自惘然若失地俯首散開，蘭英一路走，一路自吟自語：『完了，完了，……路上，每一滴血，在灰暗的燈光下，射出紫色的星光，她不知打了多少次寒顫，忘記了哭泣，一心想趕回家去，或者小鈴子已比她先到家了。這是最後的希望。她一面吟着：『完了，完了，……』一面還奢望女兒並未遭殃。一幅往日是平常的今晚是非常可貴的圖畫，在她的眼前隱約地展開了：女兒在後門口，看見她回家了，帶着微笑叫一聲：『媽！』她自己也同

答一聲『愛！乖乖！』

這樣想，她的脚步加速了，滿身流着大汗，手指掠一掠額角的汗珠，又拚命地奔跑，

奔進小弄，瞧不見女兒的影子，胆寒地推開房門，

家裏坐着老二和小龍。老二見她獨自回來，睜大了眼問她：『怎麼樣？』

『不准進廠去看！傷的都送醫院了，死的明天下午才能去認屍首！嗚……』她倒在牀上抽噎，老二想叫她，

吃晚飯，看看情形，她准不會要吃的。收拾一下，先抱多，兩條腿沒有壞，還好！』她又走到別處去了。

小龍上牀，然後看看空着的小鈴子每天睡的兩塊木板牀，悽然地睡了。不住的說：『不要哭，明天再去看吧！或者小鈴子受傷不重呢！……』

一夜沒有好睡。次晨，他倆急急地去找細紗間拿摩溫劉大媽，她住在隔三四條路的地方，一進門，劉大爺哭喪着臉說，他老婆昨晚也沒有回家，他想九點多鐘打

一個電話到廠裏去問問情形。十點鐘，老二又去跑一次，劉大爺這麼說：『剛才一個細紗間裏的小姑娘來過，她說，劉大媽和小鈴子都受了傷！還活着！給送到醫院去了。廠裏電話打不通，旁的消息也沒有什麼。』

活着！活着！心愛的女兒還活着！老二沒有說聲再微減輕一些，憤痛地嘆一聲：『還活着！』

活着！活着！心愛的女兒還活着！老二沒有說聲再微減輕一些，憤痛地嘆一聲：『還活着！』

『公大紗廠。』

『姓什麼？』

『姓高，名字叫小鈴。』蘭英以為他們是捕房裏的包打聽，很尊敬地回答他們。

『我們是新聞記者，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你們懂不懂？』

『你們恨不恨丟炸彈的美國人？』

『！』兩對驚懼的眼睛互相看看，又窺探另兩對危險的眼珠，半響，夫妻倆不知如何回答。

『你們很喜歡他們來炸的嗎？』顯然略帶審判官的口吻。

『不！先生，我們只恨自己窮，因為別的廠都停了，才到公大去做工的。先生，我們實在不恨別人！』蘭英慌張地回答。

『那末你們恨東洋人了，是嗎！』

『不是的，先生！』老二也慌了。

『那你們為什麼不恨美國人？他們殺中國人！炸中國人，他們要滅亡我們中國的呀！我們虧得有東洋人害我們。你看！你住的醫院不是東洋人辦的嗎？』

務的右手。

『不要緊的，乖乖！有一隻右手也可以做工的。』他安慰她，自己的喉管却哽住了。

『沒有人進廠去看！傷的都送醫院了，死的明天下午不會好起來？』

『沒有危險的！不過……左手沒有了，身上小傷很

多，兩條腿沒有壞，還好！』她又走到別處去了。

有兩個穿西裝的人手裏拿着筆和紙，跑來問他們：『炸傷的是你們的什麼人？』

『女兒。』

『幾歲？』

『十七歲。』

『在那兒做工的？』

『公大紗廠。』

『姓什麼？』

『姓高，名字叫小鈴。』蘭英以為他們是捕房裏的包打聽，很尊敬地回答他們。

『我們是新聞記者，是報館裏的新聞記者，你們懂不懂？』

『你們恨不恨丟炸彈的美國人？』

『！』兩對驚懼的眼睛互相看看，又窺探另兩對危險的眼珠，半響，夫妻倆不知如何回答。

『你們很喜歡他們來炸的嗎？』顯然略帶審判官的口吻。

『不！先生，我們只恨自己窮，因為別的廠都停了，才到公大去做工的。先生，我們實在不恨別人！』蘭英慌張地回答。

『那末你們恨東洋人了，是嗎！』

『不是的，先生！』老二也慌了。

『那你們為什麼不恨美國人？他們殺中國人！炸中國人，他們要滅亡我們中國的呀！我們虧得有東洋人害我們。你看！你住的醫院不是東洋人辦的嗎？』



！』

這是可能的嗎？如果真的投降了，這廠歸誰管呢？廠裏還許多貨物，工人可以分一點嗎？以後工人還是照樣的給這些東洋鬼子欺侮嗎？會不會停工關廠？儲備票還用不用呢？……無數的問題在工人們之間討論着，各人的見解不同，議論紛紛，得不出一致的結論。日本人的驚慌不安，很快地傳染給中國工人，雖則慌懼的原因因不一，同樣地慌張則是事實。這一天大家沒有做什麼工，下午五點鐘，廠裏已沒有一個人在做工了。

蘭英一到家，看不見老二，檻上有三小袋米，她想一定是丈夫買回來的，問女兒：『爸爸說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外面大家在說，東洋人投降了！真的嗎？』

『二十四萬呢！爸爸說，外面現在都不用儲備票了嗎？多少錢一斗？』

胡亂地和女兒瞎扯一陣，老二氣喘地回家了，手裏捏着一卷鈔票，買不到東西。

日本人投降了！

天亮了！

多麼興奮，街頭巷尾，人在談這件大事。滿街飄揚着國旗，爆竹聲從四週傳來。小龍一忽兒上街頭去看，一忽兒回家呆着傾聽雙親的交談。

一夜在多夢的驚擾中逝去。次日是禮拜天，老二照樣上碼頭做工。蘭英換夜班，這次是「小禮拜」今晚就要上工，白天非睡不可。

碼頭上，和昨天一般無二，貨物上的上，下的下，

汽車大板車照樣地滾來滾去。工人們仍舊流着汗，高高地呼喊出合乎工作節拍的杭唷聲，費力地搬運着笨重的貨物，忙碌一整天，經過幾重剝削，拿到幾升米錢。這

一天工人的「生意」特別好，老二搬了一整天，人家還叫他打夜工，他沒有肯，因為家裏兩個孩子要人照顧。

蘭英進了廠，聽得工人們在大聲喧譁着這樣那樣的

，日本人表面上比昨天鎮靜了一些，照常開工。什麼都沒有變，那些馬達，皮帶，大輪子，長鐵軸，精細的紡織機，高高的廠房，結實的水泥地，樸實的工人羣，滿廠的飛花塵埃……這些，和往常一樣。可是，人們的思想變了，人們的情緒變了，人們的心都變了；自恃的變成自卑的，懦弱的變成傲慢的，平靜的變成悲哀的，絕望的變成自信的，什麼都變了，雖然表面上什麼也沒有變。

一個小飯桶，平時人們只知道他是日本人，今天有意在工人中間鬼混，第一次聲明他自己是台灣人，拍拍工人的肩膀：『我們中國人勝利了！』工人笑笑，他也笑笑。被拍的人忘了從前他拿藤鞭抽打工人的往事嗎？沒有！可是，他只有笑笑的份兒。

高麗人，比從前更客氣了，走進工場瞧瞧就出去，不再盯住任何人，更不敢罵人了。日本人集中在寫字間裏，難得到工場裏來。馬達開着，機器和往常一樣地轉動，工人的手腳比平日慢了不少，有的公然閒坐着「揩油」，沒有人敢干涉。胆小的人，裝着做工的樣子，大家交談的時候比做工的多。這一晚就糊裡塗地過去了。

第三天，老二的工作非常忙，搬上搬下都是日本人

的東西。這一晚蘭英也照常上工，關於「和平」的話，議論紛紛，有的說是謠言，有的說是真的，並且說中央

軍明天就要來了。膽小的人勤力地照常做工，膽大的仍舊馬馬虎虎。日本人又到工場裏來了，裝着「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大搖大擺地在工場閒踱，神氣活現的姿態，掩不住內心的懊惱。這一晚的「秩序」比昨晚『好』的多了。

第四天，老二的「生意」加倍地忙，工錢也加了，晚上回家一數，有四十萬呢！今天有鬼子的軍用車到碼

頭上來僱搬夫，一天給二升米，工錢另外再算，五千元一標。老二沒有去，他怕鬼子臨走再下毒手。從前，吳淞，台灣和虹口楊樹浦常常「出毛病」。

『這時候去送死是犯不着的！』他這樣想。

街上，人人都知道日本人的確投降了。

蘭英一路上看見好些日本人，個個垂頭喪氣。她提快步子趕到廠門口，看見三四輛大貨車裝着紗布往外開。灰暗的電燈光下，辨不出到底是紗是布，更數不清多少件。一進門，不聞馬達聲，只聽見工人的呼喊爭吵聲，情形很明白：日本人投降是『一定』的了。

日本領班在工場裏，面對着工人們，哭喪着臉：

『廠裏鈔票嘛味格！廠裏鈔票……』

『都給你們偷去了！』一聲怒吼打斷了他的哀求似的聲明。

『真格，廠裏鈔票嘛味格！』

『我們不要鈔票，要拿布！』

『噓！拿布哦！拿布哦！……』一陣騷動的吶喊，

但是，他們沒有行動。

『每人拿一匹！一匹！一匹！』日本人把手指高高地舉起，脹紅了脖子。

『三四！』

『噓！三四哦！……』工人們爭先衝出工場，管貨倉的日本人呆若木雞，儘工人們拿布，管門的高麗人把工資摺收下來，讓工人搬了布出門，不許再進去。

蘭英在人潮裏面滾來滾去，失却了自己的意志，莫名其妙地肩了三匹粗布出廠。顯然的，這就是明天不要做工的意思了！惜別似的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在想：『沒有工做了，怎麼辦？三匹粗布值不得幾多，怎麼辦？老二一個人的工錢不夠開銷，怎麼辦？小鈴子的創傷沒有全好，不能再上醫生間換藥了，怎麼辦？……』

整個工廠區騷動了！各廠門口聚滿了人頭，白布和棉紗從各廠流散到街頭，再由街頭流散到工人們的家中。

媒，棉花，小機叫，紗，布，……從各廠（漏）出來。無數物資從虹口和楊樹浦搬出去，好像來源永無個竭一般地向各處搬送。卡車一輛又一輛地滿載着貨物飛馳，不知到何處去，也不知從何處來。工人們拿着一點可憐的東西，在路上茫然地彳亍着。

蘭英回頭看看黑黝黝的工廠，再看一眼一手裏的白布，悵然地又望望在路燈下迷惘的大貨車，嘆一口大氣，悶下頭，急切地走回家。她很懊惱，沒有像別人那樣，讓彪形大漢在中途搶了布去。

第五天，碼頭上沒有工做，蘭英也不能再上工了，一家四口很難得地生活在一起，可是，他們現在沒有一「天倫之樂」，他們生活在陰霾之中。

「天亮了」，他們却看不見光明。

有好幾次，工頭來叫老二去搬鬼子的軍用品，他不肯去，於是，老二全家就這樣地「坐吃」下去。

× × ×

小弄裏接連熱鬧了不少天。年青的失業工人，湊些錢租一副鑼鼓上街頭鬧鬧，小孩子東奔西跑地看熱鬧，大人有時也跟着小孩子到處逛，一度被迫收下的國旗，又到處飄揚。爆竹聲稀稀朗朗的，斷斷續續的，晝夜都有所見，人們傳着美國式的中央軍就要開來了，傳了一個多星期，還只是『就要來了』。

弄底，有一家人，本來是當汪派漢奸的，『和平』之後，起初幾天，鬼影子見不到一個，前門後門，給弄裏的小孩子寫滿了各種各樣的標語：『打死漢奸！漢奸狗頭！漢奸要殺頭了！滿門抄斬！……』有的還畫上些簡單的圖畫。一星期以後，一輛汽車停在弄口，走出來的就是那個平時專門欺侮鄰居的漢奸，他大模大樣地領着一家人重新回家了！

成年的人們以驚奇的目光。注視他的行動，以及他手裏搖幌着的手鎗。有人在一旁低低地說：『好大的胆哪！』

他一見門上的粉筆字和漫畫，以怒目向四週掃射一

會，然後開門領了家人進去。

次日，他的兒子出來玩耍，全弄的孩子們圍住他，拉他的耳朵，打他的腦袋，捏他的臉皮，罵他小漢奸，他却聲勢洶洶地還手，且說他爸爸是愛國份子。

『哈哈……』一陣哄笑，『你爸爸是愛國份子，難道是我們老百姓做的漢奸嗎？見鬼呢！』一個頑童把他鼻子重重地一揪。

『我爸爸是做地下工作的！』小漢奸仍舊非常頑強。

『哈哈……』又是一陣哄笑，『你爸爸是幫日本鬼子挖地洞的是不是！』又有人在取笑他。

『媽的把子！你們這些沒教養的小雜種！』那個漢奸從後門衝出來，罵聲未止，一個小孩子已經打倒了，接着不分青紅兒自抓着小孩子就亂打亂踢。有的給打痛了腰，有的給打紅了臉，有的給踢痛了腿，有的及時地逃脫了。小龍逃不快，給他猛力一脚踢倒在弄裏，高聲號哭，蘭英趕來抱了回去。

『這是什麼玩意兒？』全弄的人都在談論他，人們不敢做結論。這件事，是小弄裏『和平』以來第一件新聞。一傳十，十傳百，週圍一帶的人都知道了。

從此，他們知道『地下』就是這樣的意思，可是，心裏頭總有些不服氣。

又隔了好多天，有人來叫老去大場，三萬元一天，自己吃飯，不要做工，來去有汽車趁，只要舉着旗子喊喊，因為老二識字的，所以才有人叫他。老二正閒得發愁，去玩玩也好，就這樣地一連去四五天，以後又閒着沒事做。

小鎗子的傷處全愈了。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大喜事，不管物價如何又漲了，不管大家沒有工做，老二仍舊爲了女兒的全愈而快樂了好多天。她缺了一隻手，臉上有幾處疤痕，身上的傷處潰爛了好久也收口了。

白布賣光了，家裏的米吃完，蘭英從箱底挖出唯一

有。聽說，工廠給政府機關接收去了，工人們推代表去見過新廠長，他不給救濟費，又不說明何日開工，只說：『就要開工了！就要開工了！』

老二找到一個機會，去政府接收機關做鐵夫，多少

總有些收入。不久，蘭英領到一百五十萬救濟費，七八張老鈔票，抵儲票幾百張，難怪大家在嘆氣了！領到救濟費，她就買幾斗米，備些油鹽。常常去劉大媽那裏探探消息，一個月又很快地溜得無影無蹤。

有一天，『小姊妹』們叫蘭英去結隊請願，她在家裏閒着沒事，就跟着大家走過去。不料這一『請願』從上午一直站到傍晚，代表們進去了就不見出來，整天下着毛毛雨，路上有些地方積水很深，雖是秋天，她們在傍晚已受不住飢寒的熬煎，只得如敗兵一般地三五成羣，分排回家；她們覺得很慚愧，因爲那幾個代表沒有一同回去。來的時候，心裏充滿了希望，去的時候，滿肚子的牢騷和悲憤。有一個老工人這樣說：『現在民國世界，不作興叩頭。可是，儘管你對官老爺跪一年，他也不會給你一個銅板，如果大家今天跪一天，恐怕情形就不同了！』

『你跪十年也是白跪的！這邊洋房裏的官老爺，那兒肯管咱們虹口工人們的事情呢！』另一個反對她。

『重慶的官怎麼又管上海的事情呢？』第三個不同意她。

『不要瞎七瞎八的！我是說這邊的老爺不肯管我們工人的事呀！』她有些生氣。

『那末，怎麼又不讓代表回來呢？』

『我想，是他們跪着不肯回家的！』第一個開口的老工人說。

她一眼，大家的臉上浮出一陣苦笑。可是她還在

嘮叨：『求人不如求己，老古話說的不錯，下次我再也不來請願的了！我十五歲做洋廠到現在，三十幾年了！』

此後，蘭英又參加過好幾次請願，每次都沒有結果。

開了二三個月，真的開工了！說是因為電力不夠，

棉花少，掛個名『開工了』，用進三三百人，開當日班

，工錢並不打，還得出一點小費。蘭英鬧脾氣，不願去

。老二勸她也無用。一家人的扭子全壓在他的身上。

再過了一個多月，劉大媽叫她上工去，這才讓老二

的肩膀輕一輕。小鈴子慢慢地習慣了一隻手料理家務，

小龍很聽話，每天幫助姊姊做事。晚上老二回家，教她

識幾個字，準備下學期進夜校。

接收機關那邊的工錢少，不夠開銷，去做工的人存

心揩油零碎物件。老二是個老實人，不會做『花手心』

，只好知趣些不做。剛好碼頭上和車站裏都缺人，他兩

面都去做，工作相當忙。三扣四扣的，晚上回家，總有一

二斗米錢。貨物上下一忙，那些穿裝的吃工會飯的人

又來了，還是那幾個人，他們是『老工會』的人，以後

是『新工會』的人，現在又是『老工會』的人了！時局

變了，他們的名義也變了。幾年來，他們僅僅做過一樁

好事：在日本人拉夫最厲害的時候，他們出賣幾千只圓

形銅徽章給碼頭工人，據說，這個徽章掛在衣襟上，日

本人就不拉他了。他們那次賺了不少錢，工人們至少獲得

心理上的催眠。此外，工人們很少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把戲。

這次他們很失望，會費收不到，會員證賣不出，在各處盤旋了幾天，就不見了。看見他們，人們就想起『工會』，他們走了，什麼都想不起來。

年關近了。說句良心話，今年過年，比去年寬裕些

，別的不談，米比去年『便宜』，米就是窮人的性命，

有了米，什麼都可以馬虎。今年除了米，什麼都比去年

貴，去年年底肉每斤儲備票二百元，今年老法幣三四百

元一斤；魚和雞也比去年貴。

許多工廠在『搖班』，蘭英那裏也搖了三四天，拿到一些年貨；買十幾斤鹹肉，一隻雞，一條大鱸魚，幾

斤花生，半斤瓜子，……老二沒處要年貨，年底每天多做幾點鐘，聚起來，比蘭英的質錢還多些。

蘭英常勸他：『鈴子爸爸，不要太貪錢，壓傷了

過年不是好玩的！我們現在又不怕挨餓了！慢慢來，：

『他老是不響，沉默的臉，掛上一絲微笑；粗大的手

，摸摸千補萬補的衣衫，又瞧瞧她的消瘦的黃臉，強勉

地點點頭。

年底，他在家裏幫女兒收拾收拾。幾年來，他沒有

添一件新衣服，沒有買一雙新襪子，更沒有添一條新褲

被。至於新傢具，則從來就沒有想到這個。把家裏的舊

東西洗的洗，擦的擦，該理的整理一下，該丟的就丟了

。買幾張白紙頭把牆壁一糊，把一架鏡框擦一擦乾淨，

他矇住這對十幾年前的新婚夫婦，好久好久，把它再掛

在壁上。

這唯一的鏡框，掛過好幾處住所，跟着他們在砲火

底下逃過難，現在，它還跟着這一對夫婦。相片上的笑

容依然是年輕而活潑的，可愛的，但是，鏡框褪色了，

人老了，與它同時在新房裏放爛過光芒的傢具破舊了，

結婚的被褥變成既硬又薄的舊棉絮了，安適享樂的夢從

腦袋裏跑掉了。他和她僅僅保存着一個共同的求生的意

志，與在任何情形之下求生的決心。

『喂！老二！你們還是四個人嗎？』以前日本『海

軍保甲』的甲長又來了。

『是的，怎麼樣？又要自警團站崗了嗎？』很記得

甲長爲了這件事和他搗蛋過好幾次，有一次還要拉老二

到區裏去，給二房東講情面講下來的。

『又要調查戶口了！』他狡滑地笑笑。

『還是你們辦的嗎？』沒有下文，甲長走了，老二

不意識地搖搖頭。

大除夕，把舊的『戶口查訖證』撕下，貼上一張新的。

一家四口一年一次吃一頓豐富的晚飯，有酒，魚，

雞，青菜，筍乾片，黃豆芽。

『我也喝一罷！』蘭英搶過他的酒杯，啜了一大口

，小龍笑了，小鈴子也笑了，夫妻倆互相看看也笑了。

蘭英的臉，給木柴爐薰出兩朵紅雲，老二臉上的青

筋給酒精灌粗了，孩子比最瘦的時候肥胖一些，天真的

笑，引得父母也笑了；但是，老二的笑聲是短促而輕微

的，他的笑聲裏面，包含着一個勞苦的中年人應有的悲

憤與歡樂。

環顧他們一下，他又想起一家幾口不斷在生與死的

分界線上搖擺與掙扎的過程，又想起那些已逝的忠實而

可愛的同伴，以及正在受難的勞苦工農和犧牲在砲火與

虐殺之下的同胞。滿滿地乾一杯，嘆一口大氣：『啐！

嘿！和平了，我們還活着，蘭英，你也乾一杯！』倒

酒的大手有些顫抖，等她喝完這一杯時，自己又斟上一

杯，看滿滿的紅色的酒，他又嘿嘿地笑了，引得小

龍格外天真地笑個不停。

一九四六，二，十六，

## 編輯室談話

本誌原定今年元旦出版。祇因各方面的復員，一般的受到了困難條件所限制，致使本誌的出版日期，也同樣受到了影響。因爲本來可以爲本誌寫文章的朋友，多還散處各地，彼此一時不能獲得聯繫，這是本誌遲至今日纔能與讀者相見的主要原因。我們雖然對於讀者感覺非常的抱歉，但在出版條件極端困難的今日，本誌終於誕生了！這也不能不引爲欣幸的一回事。本誌爲一公開研究學術的園地，這在『創辦宗旨』內已詳細地白說明了的。至於本期的價值，自有作品的內容對讀者作事實上的介紹，請讀者自己批評，並且我們正是歡迎讀者多賜予督促與批評的。使在荒蕪的文化園地上開出鮮艷的桂花，則更有待於大家的培植與灌溉。在這裏，謹向爲本誌執筆的作家以及各方面協助本誌出版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總製造廠

延平路南姚橋浜23號

電話三二一七八號



安適無比  
大方非凡  
襯領考究  
衫料新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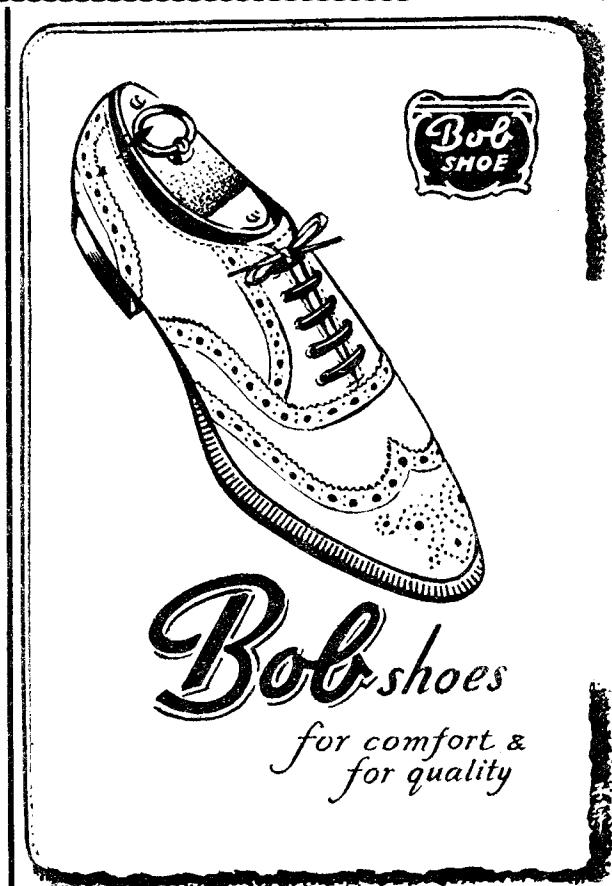
大安襯衫

總管理處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九一〇六四號

博大鞋廠出品

經售處  
南京路五六二號  
中國內衣公司  
南京西路七五三號  
第五街公司



# 投稿簡章

## 求真雜誌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本誌園地絕對公開，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

，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並指明出處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註明。

六、來稿經本誌揭載後版權即為本誌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

，請預先聲明，但本誌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七、稿未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 廣告價目表

本期定價一千二百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求真雜誌社

印 刷 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不許轉載▽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等級	地 位	全 面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十二萬元	七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	十萬元	五千元	
優等	首篇之前			
上等	不指定地位	五萬元	三萬元	一万元
	（正文前後）	六萬元	五千元	二萬元
		五萬元	三千元	一万元
		八千元		
		萬元		

廣告費請先惠付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A.B.C.

標 準 工 裝

質 料 上 等 式 樣 美 觀  
稱 體 舒 適 一 致 公 認

中國內衣紡織染廠出品

康定路一〇九九號  
電話：三二九二〇

南京路五六二號

電話：九一〇六四一五

商 場